

民建聯區選慘敗與 民主派大勝



長毛/梁國雄區選特輯

特區執政無能證明必須政改普選

中共一黨專政下向資本主義開放

關於復辟資本主義的聲明

英國：面對左派的挑戰

日本政治進一步右傾保守

民建聯區選慘敗與民主派大勝

本刊評論員

區選的結果

香港回歸後第二次區議會選舉，打破了香港歷史上兩項紀錄：一是投票率達44.06%，比以前高出兩成，約多10個百分點；二是投票人數上升到106.5萬多人（其中有一部分是7.1後新登記的年青選民）。選舉結果更是絕少人能夠預料到：民建聯派出的候選人遭到慘敗，民主派則得到意外的大勝。這是7.1效應的延續：市民再一次用投票表達他們對政府及其保皇黨的不滿和抗議，要爭取民主和推進由人民當家作主的訴求！

民建聯儘管得到京港官方和資本家支持，財雄勢大，選前又有多份報章鋪天蓋地的宣傳吹捧，更派出206人參選；但結果，除了得到16人自動當選外，只有62人勝出，當選率只得30%（上屆得47%）；一些重要人物都告落選，連上屆的不少席位也保不住。與此相反的，民主派則得到了許多席位：民主黨120人參選，當選95人，當選率79.2%；民協37人參選，有25人當選，當選率67.7%；陳偉業聯盟，23人中9人當選；前線派出14人，7人當選；街工派出5人，有4人當選（其中的梁耀忠更是全港的「票王」）；公民起動和職工盟分別有5和3人參選，3和2人當選。其中最矚目的是公民起動的何秀蘭「空降」觀龍選區，挑戰民建聯副主席兼立法會議員葉國謙，後者在該選區連任區議員10多年至今，那是他的「老根據地」，但最後仍然失守。

本刊同人陳昌在其選區當選為區議員10多年，這次競選連任，也戰勝了民建聯派出的對手和另一競選者。至於四五行動的梁國雄空降錦屏選區挑戰蔡素玉，主要因為給另一競選者分散了票源，致使盤據該區多年的蔡素玉仍然得以連任（儘管她在選前已承認曾濫報津貼開支1萬元而退還給當局）。

民建聯自食其果

大多數選民之用選票支持民主派，摒棄民建聯，顯示出他們非常反感民建聯之長期充當中港保皇黨角色，完全支持政府的一切倒行逆施，出賣市民的基本權益。其中最新的令市民反感的，是在立法會內死硬支撐葉劉淑儀強迫通過23條惡法，而被這次區選趕下台的葉國謙，正是當時得令的立法會國安法委員會主席。由這許多不光彩的歷史

事實再一次看來，人民的眼睛確是雪亮的，不會健忘的，民建聯理應自食其惡果。

民建聯主席曾鈺成自認該黨受到了「重大挫敗」，在記者會上宣佈已提出辭黨主席職時，企圖把責任歸在港府頭上，說：「民建聯是支持政府的黨，當政府的民望不夠高、怨氣深時，民建聯會受影響。」其實，民建聯一直以來都亦步亦趨地緊跟著北京走，自己標榜得到北京中央的信任和支持，京官不久前也吹捧民建聯是香港最大並得港人擁護的政黨，而一般港人都深知道他們的這種親密關係。因此，北京的政策只是全力挺董護董，而避開在港推行政治改革這項市民重大訴求（兩年前要葉劉淑儀在港那樣地推行23條立法，也出於當時京官的主意），這應該是這次大多數選民投民主派而不投民建聯票的基本原因；也可以說，這是多數選民對北京中央表示不滿和抗議的反映。這次區選結果表明是市民繼7.1大遊行之後的又一次勝利，標誌人民的政治水平提高，顯示出他們要追求政制民主改革，以達到還政於民的目標，而且要爭取明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有更大的成果，幫助民主派要得到30席以上，以打破保皇黨派的壟斷局面；更加要進一步爭取07年普選特首，08年直選全部立法會議員。

當局要阻遏升溫

統治者們對這些政治發展是特別敏感、深為警惕的。他們極不願見到市民的政治熱忱和行動一步步地升級，而必須設法加以阻遏，把群眾的熱忱降溫、變冷。因此，選舉委員會便作出了一連串的措施或動作：

它首先是宣佈改變已往慣行的投票時間，從晚上10時半縮減至7時半。這將使大量勞動群眾不能在放工之後趕去投票，被行政手段剝奪去選舉權，而這部分選民又大都是支持民主派候選人的，但支持親京保皇黨的選民，大多數都可在7時半前去投票，故這樣改變只對保皇黨有利。結果，在遭到社會嘩然、各方強烈反對之下，選委會主席被迫收回決定。這次選舉過程證明：從7時半起的三個鐘頭內，投票率由34.33%上升到44.06%，即升了28.34%，使得有30多萬人能夠在這個時段去投票。但他在選後仍然強辯，且說明年立法會選舉會再考慮縮減時間。

陳昌競選連任宣言

各位平田邨街坊：大家好！

再次衷心感謝大家多年的信任支持！

1985年，本人提出「爭取民主、保障民生」政綱，先後四度當選出任藍田區民選區議員，至今已有18年！

任內本人設立區議員辦事處，直接聽取坊眾意見投訴，致力維護勞工權益、爭取藍田重建原區配房安置，成功擱置藍田公園改建居屋，切實解決各項社區問題！

透過區內社團坊眾共同努力，成功爭取房署凍租減租，積極聲援高院司法覆核，繼續跟進上訴庭官司，開辦兩條聯合醫院新小巴專線，轉介近500個廁渠維修個案，協助坊眾申辦租金援助，群策群力取得突破成果！

環顧今日，藍田高廈林立，舊邨重建順利完成，社區設施日趨完善，舊貌展新姿，一派新氣象！

近年香港經濟低迷，特區政府施政無方，「保皇黨」藉委任制控制議會，中年失業問題嚴重，基層打工仔及婦女均承受沉重壓力！

「七·一」大遊行顯示港人的團結、勇氣和智慧，要真正當家作主，要將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就要珍惜公民的投票權利，選出真正代表您心意的民意代表！

時代在召喚，我欣然接受挑戰，承諾繼續貫徹「保障民生、爭取民主」工作方針，致力維護勞工權益，堅定推進香港的民主進步，踏實服務藍田社區！

懇請各位平田邨街坊好友，集中民主派票源，全力支持我就選連任！

11月23日投票日，請大家踴躍到聖言中學，投陳昌信任一票！衷心多謝大家支持。



選委會又泡制了許多新的不必要規定，嚴格限制參選人的競選活動和做法，例如不能像以前那樣舉行歌星、明星助興的集會，以增加選舉的熱烈氣氛，等等。選委會主席又在選舉前夕公開表示，政府沒有責任號召選民去踴躍投票，這個責任應由各候選人去負起。

此外，許多選區的投票站都改在較遠和地勢高的地方，令無數選民感到很不方便，可能使其中不少人（尤其是年邁、走動不便的人）不願去投票。這與儘量為選民提供方便以幫助他們去投票的應有主旨背道而馳！儘管如此，廣大市民依然用行動去創造新的區選一頁，同心協力衝破了選委會所設或擬設的人為障礙和阻力！

區選結果證明選民一般是能夠善用他們的選舉權的。

可是，香港在回歸後，與人民當家作主的官方宣傳相反，政府卻恢復了委任制，在第一屆區議會議員組成中，市民直選的議員有400人，特首一手委任的便有102人，當然議員27名。這表明特首一個人擁有的特權，相當於全港25萬選民所總共享有的選舉權，是非常不民主、不公平、不平等的！這樣子制造無上特權、扭曲多數選民意願的委任制和當然議員制，必須立即加以廢除，以落實民主的原則！同時，政制改革的檢討必須立即開始，否則，如果當局仍不從7.1和此次區選中吸取到教訓，反而依然逆市民大眾意願而倒行，實行「拖」字訣，那就勢將激起更大的民憤，會觸發大規模的群眾行動！

2003年11月25日

陳昌競選連任

政綱略要



政制事務 我爭取

- 爭取兩岸和平統一，結束一黨專政，由全中國人民當家作主；
- 推動中台政制民主改革，放寬民間旅遊探親限制；
- 香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由港人普選產生，向全港市民負責；
- 還政於民，一人一票選特首；
- 立法會議席全部由直選產生；
- 取消區議會委任／當然議席；
- 全民投票「廿三條」立法議案。

全港事務 我主張

- 推行「小班教學」，正視超額教師問題，反對削減大學經費；
- 修訂法例，簡化追討「贍養費」程序，保障婦女及單親家庭權益；
- 放寬申領高齡津貼離港期限限制，反對削減長者綜援；
- 制定「反壟斷法」，增加大財團累進利得稅率，反對開徵銷售稅；
- 增加家務助理工作隊，及日間托管名額，反對削減社會福利開支；
- 倡議房署「公屋一邨一社工計劃」，探訪獨居長者，提供外展服務。

勞工權益

- 鼓勵投資設廠，創造就業機會；
- 爭取本地工人優先就業，反對「一拖三」輸入外勞方案；
- 正視中年失業問題，反對年齡歧視；嚴懲黑工僱主；
- 工人有組織工會、集體談判及罷工權利；爭取最低工資保障；
- 反對政府部門私營化和外判制。

維護公屋居民權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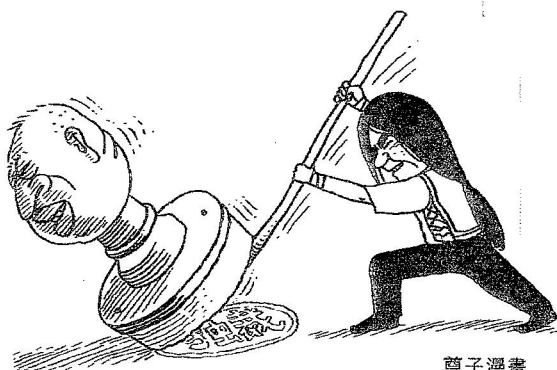
- 2001年中發起簽名運動，成功爭取房署12月份免租及凍結租金；
- 聲援高院司法覆核勝訴，繼續跟進上訴官司，要求房委會依法減租三成；
- 爭取房署恢復「出售公屋計劃」，維護公屋住戶自置居所平等權利；
- 積極協助困難戶申請租援減租一半；
- 爭取藍田重建六期兩幢住宅改作出租公屋，供區內坊眾申請調遷。

爭取民主 保障民生

為街坊服務 為勞工弱勢社群爭取權益 為民主奮鬥

爭民主普選！ 反失業貧窮！ 踢爆保皇黨！

過去，你想支持我，不知怎麼辦！
現在可以了，請投我一票。謝謝！



尊子漫畫

**大眾沈默，社會沉淪，
毋忘七一，再接再勵！**



錦屏區候選人



各位朋友：

你好！我長毛梁國雄的言行光明磊落，本就眾所周知。今次參選目標之一，就是為嚮往民主自由、爭取普選特首及立法會的民眾，提供一個表態機會。七一大遊行之後，反對強立惡法廿三條，要求董建華下台，以及盡早實行全面普選制度的呼聲，已經響徹香港、人所共見。我一貫為反對小圈子選舉所形成的富豪治港而薄盡綿力，極之痛恨小撮巨賈權貴假公濟私，為一己私利而禍港殃民，六年來令普羅大眾陷於失業、貧窮之中；更不值大小保皇黨，憑小圈子選舉謀得議席，為董家班行苛政、立惡法保駕護航，塗脂抹粉。因此，眼見錦屏區議席竟將因無人向保皇派挑戰，而淪為其囊中物。更且，自動當選者又是屢屢在立法會內背棄民意、首鼠兩端，變相為董建華政府效犬馬之勞的民建聯現任議員蔡素玉，實在不能不挺身而出參選，彰顯公義民意，讓街坊得以投下反對票，雖自知人力物力薄弱，亦不計較勝負得失，盡力為大眾福祉、民主自由一拼！

請大家投票支持我，多謝！

長毛 梁國雄

二零零三年十月三十日



縱令我手無燭光

梁國雄

●有人叫我忘記
但人血不是胭脂
用它寫的歷史
怎抹掉也會記起
十一年前開的飯桌
六四過後不團圓
密密麻麻的名字
百家姓氏民主碑
萬點燭光耀天辰

●有人叫我匍匐
但心臟不僅是器官
拿它載的是熱血
要冷凍就做奴僕
救市不救人可恥
喊出來就是個禍
偷偷摸摸的選舉
明明白白把民害
縱令我手無燭光
難禁眾心悼國哀

二〇〇〇年五月三十一日 於荔枝角監獄

梁國雄

東區區議會錦屏區候選人

1

十大理由支持長毛

1. 因為香港需要不同的聲音

香港需要有不同的聲音，讓弱者不致窒息，使社會更健康地成長及發展。

2. 因為香港的制度不民主

特區政府成立至今，由於不民主的制度，市民的民主權利被受剝奪，是時候作出「自下而上」的改革。

3. 因為商人治港、金權政治

特區政府的施政往往偏幫大商家、大財團的利益，置普羅大眾利益於不顧，向不同階層人士「開刀」，是時候扭轉這「畸形」現象。

4. 因為香港「貧者愈貧、富者愈富」

過去香港被視為努力工作者的天堂，如今少數人的利益，竟建立在多數人的貧困上。要突破這不公平現象，是時候作制度上的改革。

5. 因為「長毛」代表草根階層

「長毛」出身自基層，深深體會低下階層市民生活的困苦，了解他們的需要，代表他們的心聲。

6. 因為「長毛」始終如一、貫徹始終

過去二十多年的奮鬥顯示，「長毛」從來一如既往，為中國、為民主、為基層，以言、以行落實信念。

7. 因為「長毛」敢說、敢做、敢拼

「長毛」不單言行合一，更從不依附權貴，從不「轉軟」，從不「左右逢源」，只依據自己固有的信念行事。

8. 因為「長毛」願意為信念付出代價

「長毛」多年來為理想打拚，前後四次因政治原因（非法集會及擾亂立法會）被判入獄，可見其身先士卒的精神。

9. 因為「長毛」的綱領合乎我們的需要

「長毛」提出的綱領，如全面社會保障、全民普選特首及立法會，以至結束一黨專政，合乎解決當前中國及香港的問題及需要。

10. 因為是時候作出改變.....

過去，投票成為我們的慣性動作，成為履行公民責任的例行公事，

我們有否考慮改變慣性投票行為？選擇不同的聲音？

選擇反映我們心底訴求的代表？



政綱略要

全國施政

1. 實現言論、集會、結社、出版、示威、遊行、罷工的權利。
2. 全國人大經普選產生；代表可由選民罷免和撤換。
3. 結束一黨專政，實現黨派自由。
4. 獨立工會合法化：工人、農民有權組織自治機關。
5. 學術、思想自由：學生、教師有權組織自治會參與及管理校政。
6. 職工有權選出代表機構，以決定工廠企業的生產及經營方針，並有權監察、罷免公職人員。

政治民主

1. 撤銷基本法廿三，董建華引咎下台。
2. 一年內舉行全民公決，決定何時舉行全面普選政府和全權的立法會。
3. 由一人一票選舉的民意代表組成的制憲大會修改基本法。
4. 廢除基本法及現行法例中壓制市民權利的條文。
5. 廢除間接選舉及委任制。
6. 各級議會及由選舉產生的權力機構成員，可由原選民罷免。
7. 金管局、醫管局及房委會等重大決策機關由各級民選議會監督，議會並有權罷免各級決策機關要員。

經濟民生

1. 反對削減綜援、反對開徵銷售稅。
2. 開徵累進利得稅及資產增值稅，用以設立全面性社會保障制度；開發基層就業機會。
3. 由幼稚園至中學學費全免；凍結大專院校學費。
4. 反對政府將公共服務私營化，擴充社會服務和公共建設，如學校、醫院、社區中心、長者中心、託兒所、道路和環境保育，創造就業機會。
5. 所有公用服務如水電等均由政府經營，由民選機構監察，防止財團壟斷牟取暴利。
6. 立法限制金融、貨幣、股票炒賣，增加印花稅，設立中央銀行。
7. 加速興建公共屋村，改善建屋質素，讓每個有需求的市民均有機會入住。
8. 立即停止削減新公務員入職條件，堅決制止向低薪公務員裁員減薪。

勞工權利

1. 設立失業援助金、最低工資和工時上限。
2. 恢復集體談判權、諮詢權及參加工會不受歧視和無理解僱等權利。
3. 工會有權參與制訂工業安全標準、設備和勞動條件。
4. 立法保障罷工權、訂立「不公平解僱」法。
5. 擴充職業培訓，在職受訓者可按原薪三分二支薪；失業人士可申請津貼再培訓。
6. 反對任何形式的歧視，爭取通過平等機會法（包括年齡、種族、性傾向、職業等），所有人同工同酬。
7. 重罰剋扣工人工資，將強積金供款轉嫁工人的僱主；強積金應由政府參與供款經營，保障工人權益。

長毛



含血噴人 自暴其醜

電話：9410 6036 梁國雄

傳真：2796 1856

網址：<http://go.to/april.5.action>

<<東周刊>>炮製的所謂踢爆「四五行動」派錢示威特輯，指我用錢收買閒雜人員參加示威，列出四名人士所謂的證供，繪形繪聲，不過由於選舉期近，藉污衊我來抹黑民主派，死撐保皇黨，插贓嫁禍，天理不容！我已到廉政公署報案，控訴它涉嫌舞弊，影響選情，打擊異己。

其實，我早就在宣傳單張中揭露保皇黨背後亂 誣蔑本人的勾當，豈料蔡素玉竟變本加厲，在選舉傳單中影射打擊我，所言全無理據，有若文革時期的紅衛兵小報。早前我偶遇蔡素玉，就曾當面勸之放棄此類四人幫文風，顧全一己尊嚴。可惜並未湊效。大家可能會說，你長毛不是也指名道姓大罵蔡素玉嗎？為何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我請大家注意，我批評譴責她的言論，一切均指名道姓及有事實為根據，蔡素玉可逐點反駁，甚至予以批判，豈是謾罵抹黑？相反，蔡素玉現時起勁派發的《理性務實還是誇張偏激》傳單上所強加於人的八宗罪，何曾擺過事實、講過道理？舉個例說，若我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至少我會解釋一下人家如何「借勢亂港、混水摸魚」，我會說道，民建聯是借著憑小圈子選舉上台的董家班財團治港、禍害百姓之勢亂港；原屬港進聯的蔡素玉憑臨時立法會躋身委任議員行列，僭稱民意代表，登上政壇，再憑投靠民建聯而借勢參加直選，憑此出任立法會議員，而更齷齪的，乃是民建聯曾經自稱支持二零零七年普選特首，後來又修改黨綱轉軌，七一大遊行後再次變臉，自稱贊成二零零七年普選，最近又再在立法會一再食言。大家看過雙方傳單，誰在謾罵，一目了然，何須再說？

回頭再說東周刊抹黑，看過者都會明白，所謂挺身作證者均須打格仔掩面，不敢以真姓實名示人，何來公信？而其中三名「證人」都是只能說由一個叫阿炳的人付錢，而這名「阿炳」並無露面，此等證供何用之有？造謠者說我一味派錢，卻說不出窮困纏身的長毛，何來巨款派錢，唯有乞靈於炒冷飯，用劉山青獲得索羅斯基金贊助，設立網站《民主之聲》一事，影射我「可能」接受美國錢財，造謠者急於抹黑影響選情，又毫無真憑實據，唯有拼拼湊湊，生安白造了事，故事自然左支右絀、破綻百出，舉個例說，文中說到有人在七一大遊行當日十二時到場支持四五行動，碰見曾健成（阿牛），但查實當時他正在教堂做禮拜，然後逕自攜帶其示威模型，到維園出發遊行，何以踏足現場？再說，該人自稱參加四五行動隊伍遊行，言之鑿鑿，但大話穿崩之處在於，當日四五行動在波斯富街附近設置攤位，由下午三時起，一直帶領行經該處的群眾呼喊「董建華下台」……等口號，直至下午七時許，才跟隨遊行隊尾到中環，此事在場傳媒可以作證，這位仁兄又怎能於七時左右，已隨四五行動抵達政府總部，收錢走人？至於附刊圖片佐證此捏造，顯示他於光天化日下高舉標語遊行，不過是一錯再錯，自暴其醜而已。

紙包不住火，大話越吹越大，堆砌羅織，又怎能經得起事實掂量？只是我勢孤力弱，不能像人家那樣，得到一份由全國政協委員擁有的周刊之助，無由全面還擊上述含血噴人之勾當。不過，為著捍衛民主派的尊嚴，為著秉持公義，更為免辜負支持我的坊眾的期望，我自然要憑一枝禿筆求取公道，特區政府及其後台的拘控判監，尚且不能令我屈服，更何況上述的暗箭冷槍！謠言止於智者，真理愈辯愈明！今個星期日，就讓大家都用選票去回答這些逼迫污衊吧！

「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爭民主普選，反失業貧窮，踢走保皇黨，大家努力！

執政無能証明必須政改和普選

振言

董建華出任特首六年多，不斷表現出其施政無方，執政無能，一次又一次的陷入管治困境以至危機；在他領導下造成的失誤，一個又一個發生：8萬5產生大批負資產人士，強硬推行23條立法引起市民憂慮和憤怒大遊行，沙士事件及委出的調查委員會報告連立法會也不能接受，而要再組獨立委員會調查……。這些都使廣大市民受到損害不淺。

最近的「維港巨星匯」鬧劇，原本是可以避免的，但卻演成為當局領導無方、官員不負責的典型事例。官方宣傳可藉此提高香港的國際聲譽、吸引外商來港投資、重建經濟力量，結果反而鬧成國際大笑話，令香港出醜蒙羞，而且要花掉一億港元公帑。

幾年之前，政府企圖大幅度在海港多填得土地，主要是想出售謀利，而不顧保持環境的優美景觀。最近，這個錯誤經過環保團體和人士的極力反對和爭取，結果迫使政府一再縮小填海面積，最後不能不減去約達一半。這件事又一次表現出政府的決策失誤，不得民心。

最新爆發的王見秋事件，更一再暴露特首的處事無能，和委任制的嚴重缺點。特首不滿平等機會委員會前主席胡紅玉不肯聽話與當局合作，於是不與她續約，而一手委任王見秋接任主席。但可能因政見不同，他不說明理由就解僱了余仲賢的職位，由此引發了社會輿論的注意，報導出不少王的個人操守與問題。雖然他得到那個庸醫的公開支持、鼓勵，結果反為越攆越引起反感。最後，王在立法會討論這場風波前夕，就公開宣佈請辭，並拒絕出席立法會解釋。他幾個月來表現出的，是強蠻不肯講理，一切都推在「已交律師處理」，便算是對別人質疑的答覆。

而他在電視上宣佈辭職時，更顯出年老力衰，只能照唸講稿的頹態。但特首卻偏偏委任這樣的人去擔任重職，確是「物以類聚」這句成語的效應表現。從這個風波又一次證明：董的委任做法連番嚴重出錯，委任制必須由民主選舉制所取替。

特首寧願慷慨地耗費一億元公帑去搞這樣的「巨星匯」，尤其是一直對很高收入者不肯徵收逐級累進稅，另一方面卻在節省開支、減少財赤的指令下，連年削減對各部門的撥款，迫使各部門各機構要一再裁員減薪，降低服務質素。公共醫療收費增加，許多藥物要病者自買，不少病患市民被迫減少看病和醫治，使病情會惡化。高等教育經費自回歸6年多及未來4年內，比95至98年度的撥款將減少

約一半。這勢將要增加學生學費，減少教職員人數及薪酬，因而已激起各高校師生非常不滿，醞釀罷課抗議，其中四千師生首先聯署聲明刊登報章表示反對如此的削減。對社會福利及機構經費的削減，使得像社會服務聯會那樣要公開訴苦：連同它本身要削減的餘額，在未來五年須減少經營開支高達25%，將大大影響對社會的服務。而向低下貧困社群開刀，削減他們的綜援金，使赤貧戶增加，普羅大眾要節衣縮食（據一社團調查，有3/4貧苦家庭入不敷支）。與此同時，財政司又表示正在檢討凍結了幾年的三千項政府收費，即準備解凍。……這許多的劫貧濟富政策措施不斷推出，已立即引起三個界別21個團體的聯合上街遊行集會抗議。而一些領綜援者與社署人員爭論時，甚至襲擊社署人員，可見他們的不滿和怨憤之強烈。

這樣一個接一個發生的重大失誤，都經由社會人士和輿論等及時指責，市民大眾看在眼里，不滿在心頭，而且，更發展到行動上：71大遊行是最清晰、最廣闊的表現；其後「民主倒董」力量發起的「聲討董建華大會」，公開號召市民參與，前線劉慧卿在立法會內提出「倒董辯論」，要求董建華引咎辭職（它只因保皇黨派議員的反對而被否決）。中大學生會發起全民投票，以促特首下台；港大師生舉行公開論壇，出席的200多名師生，超過九成認為，07年普選特首對本港有利。政治團體「民主動力」則不滿港府對政制檢討的拖慢態度。

在民意調查方面，七月中得到的結果是：對董評分只38.1分，出任特首的支持率是12%，反對率是72%，對政府整體滿意率是11%；維持經濟繁榮滿意率是9%，而澳門特首何厚鏞則分別得到77.3分、80%、3%、73%和67%（詳見03年10月10日《蘋果日報》引自香港大學民意網站），兩者相差很大。這是董特首許多倒行逆施、無能、不得民心的結果和證明（雖然何厚鏞也不是多多為市民謀利益，實質上仍是資產階級的代表）。

面對著如此低劣的民意調查結果，如果略有自知之明和自尊心的，都不會再繼續撐多四年下去，而應該知難引退！

在各方面的不滿、要求下台的強大壓力下，董特首被迫只是部分地、避重就輕地承認特區過去六年在施政上有四大失誤，令民怨上升。他指政府在管治方面溝通不足，無法做到想市民所想、急市民所急；第二是推銷政策「成日有一個理所當然態度，以為政府制訂政策係正確，大家

就要接受」；第三是因財赤問題，推出改革過多過急，漠視市民大眾承受痛苦；最後是經濟調整，令失業率上升，薪金下跌，令市民對政府更加不滿。

但董建華在認錯之餘，對議員張文光要他取消區議會委任議席，以及余若薇要他立即就政改諮詢市民，他均拒絕作承諾。議員劉慧卿要求他回應市民要求下台，給香港人一個新機會，董建華則堅持會「依法律辦事」，當特首至07年6月30日任期屆滿為止。

他之厚著臉皮不肯引咎辭職，而要強撐下去，原因是背後大靠山（北京中央）堅定支持，又得到立法會內保皇議員的保護；他聲稱要「依法律辦事」，就是藉著以前制定的不民主法例，由800人的小圈子推「選」出，使他有藉口「依法」做下去。

也正因為他要依靠以前制定的規定和法例，他要拖延政制等改革的檢討、諮商。香港民主發展網絡在10月13日與政制事務局局長林瑞麟會面，強烈要求政府儘快展開政制改革的研究及諮詢工作，卻失望而回。

民主發展網絡主席朱耀明會後表示，已經向政府作出建議，為免出現延誤而令市民無法在2007年行使普選權，應該儘快展開政制改革的諮詢工作。至於諮詢的內容應包括兩方面，分別是與民主管治相關的議題，以及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產生方法。不過，政府並未就有關建議作出具體回應。林瑞麟只是強調政府會在年底前，就公眾諮詢的時間表做決定，作出決定後便會向立法會和公眾交代。（俱見10月14日《蘋果日報》報道）他所採取的仍是拖延的戰略。

因此，全港市民必須有一次又一次的有力集體行動，立即展開香港政治體制改革（包括行政長官的選舉辦法改革）的討論，促成這些改革的早日實現，儘快由全港選民一人一票普選全部立法會議員和行政長官。可以相信，在7.1的政治效應和市民的認識水平及熱情繼續發展之下，是能夠爭取得到上述目標儘快實現的。

（2003年11月9日）

給董建華的公開信（轉載）

民主倒董力量

董建華先生：

你放假前曾與各界頻頻會面，親口說出您會聆聽人民的聲音，盡量依照港人的意願去做，我們既是歡喜，又是失落，歡喜的是您說您會聆聽，失落的是您沒有去做市民最急切、最響亮的渴求——就是要求您辭職！辭職！辭職！

中國人或香港人是最與人為善的，您要改過，一定給您機會，可惜察您言、觀您行，您並非痛改前非，而是意圖蒙混過關。

舉例，梁錦松和葉劉淑儀因激起民憤而辭職，您卻指他們是犧牲品，不肯承認他們是因為犯了錯誤而被追究責任，這絕對不是面對現實的行為。您提及三P：政策（policy）、公共關係（public relation）和政治（politics），承認政治和公關做得不好，卻自認政策強項。簡直是自我陶醉！有爭議性的不說，容許一問，您主張和推行的政策，到底如何強——八萬五、母語教學、99年公務員改革、高科技計劃，全部災難收場！

廢話無謂說，隨便舉一例，就知道您領導的政府的效率。98年，香港經濟開始衰退，為了希望減低當時的失業率，您大張旗鼓地建議在大嶼山興建登山纜車，創造職位。現在已是下一個世紀又三年，這項工程竟還未動工！偉大的英法隧道，真正施工時間不過七年，特區政府說足五年，寸步未行，當年等候這工程來就業的人，已全部燒炭、跳樓多年了！

您經常把「愛國」放在口頭，現在「自由行」令祖國每年在港多花二、三百億，對香港人來說，這是久旱逢甘露，喜出望外，對祖國恩情感激涕零。但回心一想，這些錢是祖國人民千辛萬苦儲來的珍貴外匯，本來可以用來蓋多少學校、醫院，令祖國多少人民受惠，現在施於香港，我們實在受之有愧，更使到一國

兩制為陳水扁不停嘲笑，台獨份子振振有辭，令親者痛、仇者快，而這肇因於您把香港經濟搞到一塌胡塗，祖國被迫為香港緊急捐血，試問您如何對得住祖國？這亦令我們想起古代孝子訃文常用的套語，改寫便成：「愛國董某，罪孽深重，不自殞滅，禍延祖國。」置諸您身，可謂貼切之極矣。

您現在仍能苟延殘喘，是因為中央為了特區的穩定，無奈繼續支持您，其實這點絕對值得商榷。特區的實際管治行為由專業政務官所掌握，只要這群人仍在位，架構不被打散，香港一定能保持穩定。昔日回歸祖國，尚且點塵不驚，何況換區區一個特首，豈會對香港穩定構成衝擊？反之，將不得人心、魯莽愚蠢的您留在此位，才是香港政局的最大不穩定癥結！有您在一天，港人信心難以恢復，經濟局面無從改善！此點我們相信中央領導人很快便會看穿，而且中央尊重香港民意，撤換特首，正好凸顯中央的寬容大度和對一國兩制的尊重，反而令台獨份子喪失攻擊的藉口。與其等到到時被棄如蔽屣，倒不如現在自動請辭，還可保留多少體面！

（下轉第20頁）

中國人民的怨憤和抗爭呼聲

軍行

矛盾和危機

中共多年來時常誇耀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成就及其領導正確。但實際上卻是困難重重，危機四伏，惡果日增。

有些專家對中國經濟及官方政策的評論指出：未來經濟運行中面對的主要風險不是通貨膨脹，而是新的生產過剩。由於當前行政主導型的資源配置活動仍然廣泛存在，生產過剩的財產責任在很多領域還不明確，不負責任的擴張活動時有顯現，例如城市建設中的形象工程、政績工程；紛紛上馬汽車生產項目等。這就加大了擴張期產生的過剩，特別會造成無法明確財產責任的不良資產，加大政府承擔的財政和金融風險。

當前經濟工作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問題和困難主要是：非典對近期消費和部分行業的衝擊比較嚴重；就業矛盾更加突出；農民增收遇到新的困難；產業結構不合理的矛盾沒有緩解；信貸投放增長偏快；在經濟快速增長過程中，資源約束矛盾日益突出。〈1〉

而且，據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簡稱發改委）的研究，有十三項潛在危機將影響中國的經濟發展，它們是：中美關係、台灣問題、周邊安全、高層人事更迭、全球化帶來的負面影響、對外貿易依存度高、金融風險、三農問題、貧富差距、失業問題、社會秩序（社會治安）、公共安全和生態環境。而腐敗問題則一直是社會關心的首選，這是多次基層民意調查所發現的。〈2〉

腐敗問題今天仍然是社會最關心的問題，表明了中共長期來聲稱的大力反腐敗不但無效，而且確實是「越反越腐敗」。這使得中共中央黨校機關刊物《學習時報》日前刊發「秋石」（「求是」的諧音）署名文章，坦言腐敗仍是中共的最大危險，黨內腐敗不除，中共就會不打自倒。文章從近年來查處的腐敗案件列舉黨內各種腐敗現象：個人腐敗發展到集團腐敗；一般幹部腐敗發展到中高級幹部腐敗；涉案金額愈來愈巨大；作案手段從使用傳統手段向使用高科技手段發展，作案方式更詭秘、更隱蔽；腐敗與國際腐朽勢力聯繫愈來愈緊密。〈3〉

造成上述「潛在」危機的原因，基本上是由於中共的路線、政策的錯誤。上引的發改委研究報告對部分錯誤的分析也認為，過去以經濟發展唯上的宏觀政策導致形成社會不穩定因素。專家指出，現在已經到了需要改變過去「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以經濟發展犧牲一部分社會發展政策的時候了。〈4〉

中共大力實行市場經濟，推使中國走向資本主義全面復

辟，從而帶來失業率高企，貧富懸殊加大，貧窮戶增加，社會矛盾衝突加劇；連帶使治安惡化，盜竊搶劫傷人案件激增（在廣州、深圳等地尤甚）。

再因廢止收容遣送制度，使公安人員減少隱性收入因而半怠工，助長盜賊的猖獗。另一方面，由於失業、貧困等的打擊，引發許多人從極度不滿、失望中採取冒險和發洩的極端行動，例如炸彈爆炸，8月以來，單是西安市便在8天內接連發生了故意的人為爆炸3宗。〈5〉

自殺者特別多

從自殺人數和比率高踞世界第一位看，也足以反映出中國社會問題、尤其是農民困苦問題的嚴重。

據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的調查分析，我國每年約有28.7萬人自殺死亡（佔全世界每年81.5萬人死於自殺總數的28.4%，遠高於中國佔全世界人口的比率），除此之外還有約200萬自殺未遂者。也就是說，平均每兩分鐘就有1人死於自殺，並有8人自殺未遂。〈6〉

以農村和城市分開計，農村自殺行為佔了9成。根據零星的報道，不少農民自殺與近年來農民的貧困化有密切關係。〈7〉

中國政府每年向農民徵收3千多億元稅費（包括700多億元農業稅和2千多億元各種苛雜稅費）。有內地學者指出：中國農民的人均稅額是146元，是城鎮居民的4倍。〈8〉這個重擔長期壓在農民肩上，使他們生活艱苦，難以合理改善。中國加入世貿，對農民打擊最大，國家補貼減少，外國農產品卻廉價傾銷進來，加劇了農民的貧困化。總理溫家寶主張逐步減免農業稅負，達到2010年前後實現取消農業稅目標。但為甚麼要推到7年以後呢？而且，屆時能否做到，仍是未知之數。而農民今天卻已急不及待，必須立即大減重負了。

今天，黨政官員的專橫無禮地壓榨農民，則是農民自殺率高的原因之一。比如在7月中旬，一個鄉鎮調查小組藉口查核政策，任意強徵農民巨額罰款，迫使陝西省一小村的3個農民接連自殺，就是顯例之一。〈9〉

強逼拆遷

特別是在房地產業大為興旺之後，地方官員與地產商勾結，由後者出面以低價收購城鄉人民的屋地農田，強逼拆遷；城市的舊區改造，也出自同一手法。有些地方甚至用斷絕水電等手段來逼遷，引致民怨沸騰，結果之一是使廣州當局被迫修例，禁止斷水斷電進行逼遷。

許多城鎮當局，在拆舊區改造中「說拆就拆」；國務院和地方當局制定施行的《拆遷條例》，也只重拆遷，忽視被拆遷戶的利益，以致引發許多糾紛。例如，杭州市116名居民，因不堪被逼遷，於7月底聯名上書人大常委會，「建議」人大審查這些《拆遷條例》有否違憲，更顯示民間對國務院等機構的不滿和挑戰。

據國家信訪局研究室專家朱穎透露，近幾年來該局接到關於拆遷問題的信件逐年遞增，今年至8月底為止，拆遷糾紛投訴信件共計11,641封，比去年同期上升50%，上訪人數5,360人次，上升47%。被拆遷人總是相對為弱者，往往是沒有商量的餘地。〈10〉

被拆遷者的應有權益並未得到法律保障，而且，協助其中一些居民上訴的律師反而被控告：號稱「上海首富」的周正毅得到有關當局的偏幫，廉價得到靜安區舊區重建的權利，逼令居民拆遷。代表2千多被拆遷戶的上海律師鄭恩寵，在入稟控告周正毅和靜安區房管部而獲得法院開庭受理後，鄭本人卻被當局拘留審查，並被上海法院控以「向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罪名，接受秘密審判。鄭通過其辯護律師郭國汀向外界表示，自己是因為舉證揭發周正毅和靜安區政府「非法佔地」，得罪了權勢人物而遭報復，強調自己是無罪的。〈11〉

被逼拆遷者在反對和上訪請願等都無效、無助、無望後，便引發出許多人走上自殺的絕路。其中見諸報道的有：繼南京的翁彪等因被拆毀家園而攬官集體自焚，造成8人死亡之後，安徽農民朱正亮，9月中前去北京天安門廣場自焚抗議；北京一名舊區拆遷居民王寶光，也因不滿收屋價遠低於市價，並被強逼遷出，也自焚抗議。朱正亮事件給傳媒廣為報道了，北京高官才指示有關當局儘快加以「妥善解決」。

對公安執法的不滿和抗爭

中共自建國以來，對全國人民實行官僚專政，訂立無數的管制法規，嚴苛地剝奪人民應有的自由權利，人民的一舉一動，受法規和公安所限制、監視，特別是對農民的歧視苛待，更使農民苦上加苦。《經濟日報》7月16日報道，據熟悉內地警界情況人士指出，內地民間對於警方違犯法律程序濫權，隨意打罵、處罰民衆，致傷致死事件層出不窮，怨聲載道。如廣州市前不久發生湖北大學生孫志剛被非法收容並身亡事件，引起中央高層干預。

人民對公安執法人員的不滿達到沸騰點，一有導火線便爆發抗爭、騷亂，這樣的事件越來越多，其中，港報有報道的包括：

一、在9月4、5日連續兩天，西安東北80公里的華縣約有5000災民，因為不滿地方政府遲遲不發放救災物資，襲擊縣內

的民政事務局。村民除打破事務局的窗門玻璃之外，還把街上的汽車推翻，又搶奪救災物資。五日的示威更一度令西安至潼關高速公路被堵塞了約四小時。事件中有30村民被捕。〈12〉

二、湖南衡陽鬧市發生近年內地罕見的大規模騷亂事件，當地市民不滿交警處理一宗電單車違章事件，一呼百應下，數百名情緒激動的市民將攻擊目標發泄到警察身上，打砸警車，毆打警察，並縱火將一座警察崗亭燒毀。事發後警察已拘捕8人。〈13〉

三、福州白龍公路超限運輸檢測卸載點發生群體性暴力抗法事件，400名司機砸毀工作崗亭，掀翻4部執法車，造成福州市公路局直屬分局副局長陳邦劍當場死亡，並有6人受傷。據目擊者稱，事發時，有好幾輛車開向檢測卸載點，工作人員要求將車開進檢測卸載點內的停車場，但遭司機反對，工作人員便將司機強拉下車毆打。另外兩人下車也遭毆打，這時旁觀的司機圍了上去，要求路政執法人員交出兇手，隨後場面開始失控，司機對檢測卸載點進行了三次大的衝擊。〈14〉

在人民對執法人員非常不滿，要求解除各種無理法例束縛的壓力下，國家公安部陸續被迫宣布取消許多措施，例如，在8月推出新的《婚姻登記管理條例》，取消過去必須到單位和戶口所在街道辦理結婚或離婚手續、經審查批准開出證明，從而體現了個人婚姻自由（亦即不再橫加干涉個人的婚姻問題）；同時，推出30條「便民利民措施」，涉及戶籍遷居、交通、出入境等方面，解除了過去的諸多嚴苛管制。

國家公安部又發出文件，對一直備受詬病的公安執法過程作了統一的行為規範，根據新的規定，公安刑訊逼供取得的證據是無效的；公安機關辦理賣淫、嫖娼等案件時，也不能再當場處罰；訊問查證疑犯不得超過十二小時，等等。〈15〉

這些新規定反證出一直以來存在的公安執法胡作非為情況。

此外，監獄也進行改革，將刑罰與生產分離，要做到監獄企業的財政獨立，發給獄中工人所得的工資和工人養老保險等。

雖然有了上述的改變（如能真正實行的話），但人權狀況仍在倒退，對民運人權人士仍繼續打壓、拘捕和判以重刑，例如對遼寧的多名工人領袖、要求進行政治改革的趙長春、民運人士王炳章和楊建利，以及僅僅在網上議政、發表《姣女萬歲》的姓王少年和在網上與海外民運人士聊天的四川異見人士李志。除了監獄之外，中共從1957年起實施勞動教養制度，把無數沒有犯刑事罪而不能經由法院判刑的人民（特別是不同政見或對當局有異議的人士），僅僅由公安機

關拘留，並且認為有問題的，不經法院便可施以「勞動教養」，完全剝奪了他們的人身與自由權利。大量的不同政見者，例如托派份子，在牢獄中監禁許多年，期滿後還要送到勞改場中接受「勞動改造」，長達一、二十年之久。這是官僚專政野蠻人治、無法無天的表現之一。但國家公安部對勞教制度卻依然不加觸動。

各方提出改革的呼聲

在遼寧省葫蘆島市勞教所「犯人虐殺犯人」的事件曝光後，再度引發輿論對內地勞教制度的質疑。被虐殺的勞教犯人張斌家人對內地媒體展示的照片顯示，張斌身上傷痕累累，一道道黑色血疤幾乎遍佈他的頭部、前胸、後背、臀部，青一片紫一片的肌膚覆蓋全身，黃色的膿水從他的屍身上滲出來。

北京理工大學教授胡星斗日前上書全國人大常委會，呼籲審查現行的勞動教養制度是否有違憲、違法之處。胡星斗說，現行勞教制度既違法治，又背離公正，容易導致權力濫用，不利公民權利的保護，因此廢除勞教制度是中國法治建設的必然要求。〈16〉

即使是官方「御用」的學者，也公開承認這種勞動教養的確「缺乏法理依據」，國家應正視這問題，盡早解決。

〈17〉

在廣東省，由朱征夫發起得到多名政協委員附議，向省政協提交《關於廢除勞動教養制度的提案》，指出這個制度違反《憲法》，也與現行《行政處罰法》的各項規定背道而馳，後者規定，剝奪公民政治權利、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必須經由制定法律確立。勞教制度則是由公安機關執行的強制措施，而後者是無權設定這種措施的。〈18〉

這樣的批評、建議，正正是社會不滿、要求廢除和進行政治改革的壓力的反映及回應。

而且，內地民間以至官方刊物要求中共「政改」的呼聲繼續有傳至香港。以下是其中的四宗：

一、由中共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最新一期刊登署名「薄貴利」的文章指出，中國在計劃經濟時代形成和建立的中央高度集權的管理體制已經不適應時代要求，中國要從高度集權走向合理分權，必須加大體制改革，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力度，儘快建立和完善合理分權體制，要實行黨政分開、政企分開、政事分開、政社分開，依法維護公民的各項政治權利，等等。〈19〉

二、北京大學校園網「燕園評論」昨日貼出湖南學者張英紅的文章，公開批評中共政治工作委員會（政法委）妨礙司法獨立，指政法委的存在充分顯露了執政黨和國家在司法

制度安排上的不合理，有違執政黨的理念與憲法規定，更令各級法院淪為政法委的「俘虜」。他呼籲革除這種有違司法獨立的體制弊端。〈20〉

三、學者曹思源不久前提出《修憲「雙十建議」》，期望對憲法動大手術，例如「告別專政，擁抱法治」一項，要求將憲法第一條規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修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人民民主的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議還包括：憲法應確立「公民權利高於一切和政務公開」、應「全面實行差額選舉」、「無罪推定入憲」等。〈21〉

四、上引的《學習時報》對於中共黨內民主問題，也刊登一文，認為黨內民主化有四大內容：1.黨內一切成員，在政治上、人格上、權利上、義務上一律平等；依照黨章享有各項權利。2.黨內民主遵循少數服從多數及保護少數的原則。保護少數來維護所有黨員的權利。3.要實行權力的分解和制約。「只有實行黨的決策權、執行權和監督權的相對分離和制約，才能保證黨內權力的健康有序的運行，防止腐敗現象的發生」。4.掌握黨內權力的，是經過黨內民主程序產生出來的領導集體。〈22〉

中共中央的回應

在胡錦濤當上中共總書記和國家主席後，發表了一些漂亮的執政理念，提出「新三民主義」（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說「執政為民」，要堅持用人民是否擁護、贊成、高興、答應來衡量中共的一切決策，使「決策民主化」。但他在那篇「七一」講話中卻完全沒提到要進行民主的政治改革。

三個多月之後，胡錦濤在中共政治局一次集體學習會上，提到了政治體制改革問題。據新華社報道，「這是中共第四代接班後首次觸及敏感的政治體制改革問題。胡錦濤在講話中提出一系列改革內容，強調必須繼續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規範化和程序化。」這些話幾乎是在重複以前中共領導人說過的話，並無新意；「繼續」「推進」這種改革，意即在今天之前已經這樣「推進」了，但實際上卻是沒有見到的。

而且，他宣稱，「推進政治文明建設必須遵循的基本方針：最根本的是要堅持中共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這也是中國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區別於資本主義政治文明的本質特徵。」〈23〉這仍然是過去倡行的「四個堅持」（其中以「堅持中共的領導」為最根本）的翻版，只是加上它與人民當家作主等的「有機統一」作為點綴吧了。這表明他們今天仍然繼續堅持中共為唯一的執政黨，拒絕多

黨制的實施。

在胡錦濤提出了「貴民」「親民」的理念後，難免會引起許多人希望他和溫家寶的「胡溫體制」能實行政治民主化等改革，因而不少人發表意見和文章，其中有些已為上面所引述的。可是當局近來的表現卻已再一次使人們失望。這從傳媒的以下報道可以看到一斑：

一、內地的宣傳部門及學術機構高層日前傳達了被稱為「三不能提」的中央精神，明確規定在傳媒體學術討論中不能提包括修憲、政改和「六四」三方面問題。據指出，中共高層是擔心這些敏感話題會引起廣泛的公開討論，從而令老百姓對新領導層產生過高的期望，會破壞黨內團結和影響社會。〈24〉

二、上引的胡星斗教授上書呼籲審查勞教制度，不但未獲全國人大常委會正面回應，其本人還因此被有關部門「口頭警告」，當局告誡他不要接受海外媒體的相關採訪。胡星斗則在其個人網頁發表聲明稱，今後不參與現實政治討論，僅就經濟社會問題發表看法，謝絕大陸以外媒體採訪。〈25〉，這反映出胡星斗所受官方壓力的巨大。

三、1998年，時任總理的朱鎔基視察中央電視台時，在《焦點訪談》的演播室裏寫下了「輿論監督，群眾喉舌，改革尖兵，政府鏡鑑」16個字。央視國際網站後來發表了主持人敬一丹署名文章《敬一丹，我對溫總理說》。文章說，在座談會上「我對溫家寶總理說，《焦點訪談》1998年輿論監督的內容在全年節目中所佔比例是47%，到了2002年降為17%。輿論監督類節目現時幾乎無一不遭遇講情，而出面講情的人已從熟人老鄉發展為組織，令製片人、台長不得不用大量精力應付，有的節目就在這種環境下夭折。〈26〉連中央電視台幾乎只談社會性問題而不涉及敏感的政治性問題，也遭遇如此大的阻撓，可見「輿論監督」是如何的難以真正做到了！

上引《星島日報》所說的「中央高層」和「中央精神」，不會不包括胡、溫兩人在內，他們對民間現時所遭到的困苦和訴求，也不會不知道。但僅僅在媒體學術討論中也不能提出修憲、政改等方面的問題（中共自己卻在準備提出修憲的意見），學者胡星斗僅僅上書人大常委會請求審查勞教問題也遭到當局警告，迫使他以後不參與現實政治的討論（但人民是理應有這些基本權利的），而四川的異見份子歐陽懿撰寫《歡迎一個「與時俱進」推進民主政治的執政黨十六大的召開》一文，也遭到拘捕和不予公開的審訊。〈27〉

這些事實，還不足以證驗胡錦濤的「新三民主義」等漂亮理念是否坐言起行嗎？人民這樣行使起碼的公民權利都不許，還談甚麼「決策民主化」以至政治民主改革！

2003年10月5日

後記：

上文寫成交去後，10月18日又看到《文匯報》報道：北京警方已開始對赴京上訪請願者進行秋後算賬，逮捕了其中兩人，並拘留了16人，指他們在天安門「想通過自殺、自焚等極端行為，解決一些個人問題」，是製造社會混亂的事端。據北京市公安局長馬振川介紹，從10月1日至16日，天安門地區連續發生多起自殺、自焚未遂以及其它不法事件。今後警方將加強警力投入，確保天安門的安全和尊嚴。「違者必受到法律嚴懲。」當局企圖以此來阻遏以後的上京投訴者。（而在此之前，據報道，已有大批上訪者被押回原地交地方當局「處理」甚至懲罰了。）

實際上，由於地方上的官商勾結，狼狽為奸，欺壓平民，尤其是弱勢社群，使他們在當地無法得到法律公正保護，才被迫到省城以至北京投訴，期望能夠伸冤解難。特別是胡、溫新領導人都擺出親民、貴民的較開明形象，使許多人都會產生這種期望。但不料在胡、溫們最近距離的北京，竟然發生是非顛倒的壓制！這更加使被壓迫者走投無路，其中許多人會被「迫上梁山」，或者走向自殺的道路。

03年10月19日

註釋：

- <1> 8月12日《文匯報》轉載《瞭望新聞周刊》的報道。
- <2> 8月17日《明報》、《星島日報》轉載北京《財經時報》的報道。
- <3><4> 《文匯報》8月19日訊。
- <5> 7月15日《星島日報》。
- <6> 9月12日《文匯報》。
- <7> 引自9月17日《蘋果日報》論壇陸德泉教授的文章。
- <8> 8月4日《蘋果日報》。
- <9> 詳見8月14日《太陽報》。
- <10> 9月18日《文匯報》。
- <11> 引自8月27日《經濟日報》。
- <12> 9月15日《東方日報》引述法新社電。
- <13> 7月29日《明報》根據《瀟湘晨報》報道。
- <14> 9月13日《文匯報》。
- <15> 9月10日《星島日報》。
- <16> 7月14日《明報》。
- <17> 8月4日《明報》。
- <18> 8月30日《明報》。
- <19> 8月4日《明報》專訊。
- <20> 7月30日《明報》。
- <21> 7月15日《星島日報》紀曉華專欄文章。
- <22> 引自8月21日《蘋果日報》的轉載。
- <23> 10月1日《明報》。
- <24> 8月21日《星島日報》。
- <25> 7月14日《明報》。
- <26> 9月17日《明報》。
- <27> 10月4日《明報》。

中共《決定》要完善資本主義復辟 張開

經濟體制的倒退

以胡錦濤為首領導下的中共十六大三中全會，通過並公布了《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共在10年前的十四大三中全會上，也通過了幾乎同樣名稱的《決定》，所不同的是：當時是要「建立」，今天則是要「完善」，意味中共認為已經大體上建立起它了。（筆者當時曾撰文以《進一步推進資本主義復辟的綱領》為題刊在本刊，詳細批評了那個《決定》。10年後的今天證明它已大致上盡了推進復辟的作用。）

今天的《決定》（以下均指此）宣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已經確立」；現時的主要任務是完善這個基本經濟制度。這即是表示，這個制度還需要「完善」地發展。《決定》進一步解說，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就是要「大力發展國有資本、集體資本和非公有資本等參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

把股份制定性為公有制，就完全改變了中共過去對它的「非公有制」定性；僅僅在今年初，國家統計局副局長邱曉華仍然公開宣稱：股份制經濟是三種非公有制經濟力量之一。現在這種改變，也是修正了馬克思主義一向的理論：股份制企業是以生產資料的資本家私有制為基礎，是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派給股東的股息和所得的溢利，都是得自剝削工人的剩餘價值。內地以前出版的《簡明政治經濟學辭典》就是根據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這樣解說的。也正因為如此，《決定》自誇這是「經濟體制改革在理論和實踐上取得重大進展」的表現。國務院國資監督管委會副主任李毅中也稱讚，《決定》「提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在所有制和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認識上實現了又一次重大突破」。所謂「重大突破」，亦即是對傳統理論的「重大」修正。

而在實際上，由於推行集體資本中的集體私有資本和私人資本可以參股，使得國有企業中的國有資本比重越來越減少。這次的《決定》更規定，需要由國有資本控股的企業，又應該「區別不同情況實行絕對控股或相對控股。」「進一步推動國有資本更多地投向關係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增強國有經濟的控

制力。其他行業和領域的國有企業，通過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在市場公平競爭中優勝劣汰。」亦即等於讓「其他行業和領域的國有企業」（連國家過去曾把關係重大民生而必須控股的國有企業也包括在內）可以無助地被市場淘汰掉。

在這個《決定》指令推進之下，國有企業數量勢必日益減少。據報道，參與起草十六屆三中全會重要文件的著名經濟學家張卓元近日指出，國企改革仍是今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中心環節。國有資本佈局調整後，國有經濟在經濟總量中的比重估計將從目前1/3左右降到1/5左右。〈3〉

另一方面，《決定》又提升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促進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力量，清理和修訂限制它們發展的法律法規和政策，消除體制性障礙；放寬市場准入，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禁入的基礎設施、公用事業及其他行業和領域。非公有制企業在投融資、稅收、土地使用和對外貿易等方面，與其他企業享受同等待遇。支持非公有制中小企業的發展，鼓勵有條件的企業做強做大。

直到現在，中共還會繼續辯解：國有連同集體所有制構成的公有制，仍佔了經濟總量中的半數以上。但是，如果在不久將來，國有經濟降到1/5比重左右，則《決定》今天所強調的以「公有制為主體」（即主要部分）又怎能達到？豈不變成自相矛盾的假大空話？

對於另一支柱的對外貿易壟斷權方面，《決定》也在「全面提高對外開放水平」的目標下，逐步放棄國家舊有的壟斷權了：它要進一步按照市場經濟和世貿組織規則的要求，加快內外貿一體化進程。確保各類企業在對外經濟貿易活動中的自主權和平等地位，進一步提高貿易和投資的自由、便利程度。賦予企業更大的境外經營管理自主權。這樣的發展下去，則中國1949年革命勝利所得到的國有財產制和外貿壟斷權這兩大成果（兩者構成中國已非資本主義國家的重要因素），便會被中共的政策所徹底敗壞和喪失了。加上資本主義勢力和作用佔壓倒優勢，它的各種固有特徵（例如資本主義經濟的生產過剩、工人失業等週期現象，和資產階級等階級的強大存在，等等）齊齊出現，便會表明中共已完成它在中國的資本主義復辟；即

使中共仍稱那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其「社會主義」本質及特徵究竟表現在那裡？還不是同資本主義國家一樣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那時，不管中共每年支付財政巨款，投資在國有制經濟中，還是無法保持其「主體地位」的。

《決定》又認為，產權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內容，包括物權、債權、股權和知識產權等，要相應地建立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要依法保護各類產權，健全產權交易規則和監管制度，推動產權有序流轉，保障所有市場主體的平等法律地位和發展權利。

這是要進一步立法保護私有財產權的明確指示。也就是上述的李毅中同時指出的：它提出建立健全「現代產權制度，首次為民營（即私營）資產提供了保護，為資產的規範流動掃除了障礙。」

對農民的讓步

由於農民多年來「增產不增收」、各種負擔依然沉重、生活困苦，與城市部分居民生活改善形成鮮明對照，加上中國入世後外國價廉物美的農產品湧入中國市場等原因，造成「三農危機」難以紓緩、解決，以致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大降，許多人放棄農田耕作，更加使耕種面積連年遞減，連主產區的糧產量也連續下降；素稱「以農立國」、農民佔全國人口七成以上的中國，將在短期內出現糧食短缺，現時已導致農產品價格大漲的情勢。^{<4>}

上述使前任領導人朱鎔基視為「最頭痛」的問題，迫得接手的胡、溫們所提出的《決定》，要對「三農問題」的政策作出若干改變、讓步。這包括在如下的規定中：

（1）要長期穩定家庭承包經營制，依法保障農民對承包經營的各項權利。農戶在承包期內可依法、自願、有償流轉承包權。實行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保證國家糧食安全。按照保障農民權益、控制征地規模的原則，嚴格界定公益性和經營性建設用地，征地時必須符合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用途管制，及時給予農民合理補償。（這些規定，大概就是應對多年來農民的土產或屋地被地方政府串同發展商任意賤價收購、強迫拆遷問題，以減少農民怨憤和紛爭的。）

（2）完善農產品市場體系，放開糧食收購市場，把通過流通環節的間接補貼改為對農民的直接補貼，切實保護糧農的利益。加大國家對農業的支持保護，增加各級財政對農業和農村的投入。完善扶貧開發機制。國家新增教育、衛生、文化等公共事業支出主要用於農村。

（3）完善農村稅費改革試點的各項政策，取消農業特

產稅，在完成試點工作的基礎上，逐步降低農業稅率，切實減輕農民負擔。

（4）農村富餘勞動力在城鄉之間雙向流動就業，是增加農民收入和推進城鎮化的重要途徑。建立健全農村勞動力的培訓機制，推進鄉鎮企業改革和調整，取消對農民進城就業的限制性規定，為農民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上引的《決定》條文，有許多都是多年來重複提出過的，尤其是「要切實減輕農民的負擔」這句話，已經喊了幾十年，成為陳腔濫調的黨八股。其中涉及有關地方幹部的自身利益，真正實行時會影響他們的物質特權，因此，他們一向都採取「陽奉陰違」、「下有對策」的手法去敷衍塞責，以致政策難以落實，很少收到實效。

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部長韓俊指出，農業稅率征收8.4%已經偏高，且是按土地的常年總產量計徵，而不是按扣除生產消耗後的實際所得，這樣，農民種地虧損還要照章納稅。而農產品增值稅徵19%，比工業品增值稅一般稅率7%高，世界少有。調查表明，農村稅費改革後虛輕實重的農業稅，幾乎抽取了糧食生產的全部剩餘。他建議中央確定分期減徵幅度，在5年內實現取消農業稅的目標，從而保護好農民的種糧積極性。^{<5>}但《決定》雖然取消農業特產稅，逐步降低農業稅率，卻仍要維持農業稅。這表明它的讓步是有限的。

對工人階級的態度

對於工人階級，《決定》自稱「要全心全意依靠職工群眾，探索現代企業制度下職工民主管理的有效途徑，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繼續推進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深化勞動用工、人事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分流安置富餘人員。」

它連工人階級這個詞也不用，更不必說要再像20年前一直說的「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是「當家作主」的國家主人翁了。這種稱讚工人階級的話，自從改革推行以後，便逐漸不提，轉而向資產階級示好，後來更越來越多地吸收資本家入黨，漸漸改變中共的階級成分。它現在說要「依靠職工群眾」的，不是要工人階級民主管理生產，以至監管國家大事，而是要他們跟隨資本主義現代企業制度的工人如何替資本家服務，提供盡量多剩餘價值的最「有效途徑」，繼續推進企業的用工改革，精簡更多職工，辭退更多「富餘人員」。

市場經濟改革造成巨量的工人被視為「富餘人員」而強迫「下崗」、失業。這是違反聯合國《人權公約》「確認人人有工作之權利」、締約國將採取適當步驟保障等等規定的。《決定》對此並無表示，只對「就業」問題提出

了「勞動者自主擇業、市場調節就業和政府促進就業的方針。」也沒有同時提出具體的辦法。而照這「方針」解讀就是：失業者自己去找工作；由市場挑揀年輕力壯、肯接受低工資長工時的失業者，任由「優勝劣汰」規律作主宰；政府只抽象地負責「促進」，而不承諾增撥資源去製造更多就業機會等有效解決措施，它最多是說，要「加強職業教育和技能培訓，幫助特殊困難群體就業。」至於如何具體幫助，那就要看政府以後是否肯撥款落實了。

對於國企下崗失業工人，《決定》說要實現他們的「基本生活保障，向失業保險並軌」（現時規定前者每月可領取270元），意思是否要把這兩者合併計算，取消其中一項收入呢？但城鎮的生活費用高，270元只勉強夠一個人起碼的兩餐所需，而過去對家人的負擔卻不能再維持了。

對城鄉人民有何幫助？

新中國成立以後實行的社會福利、醫療、教育等方面的政策，對人民的幫助原是很大的。但隨著市場經濟的推行，資本主義所盛行的「一切向錢看」也伴隨而來，企業一向對職工所負擔的醫療與福利幾乎全取消了，公共醫療收費日趨昂貴，現在要由職工購買醫療保險，並須自己供部份保費。

現在的《決定》，只是說要「完善」或「加快建設」這些保險制度，「堅持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條件具備時實行基本養老金的基礎部分全國統籌。繼續完善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醫療衛生和藥品生產流通體制的同步改革，等等。而同時，又要強化社會保險基金的徵繳（即加緊徵收投保人、受益人及其所在企業等應繳的保險基金），擴大徵繳覆蓋面（即向更多的人徵收）。至於農村的「養老保障以家庭為主，同社區保障、國家救濟相結合。有條件的地方探索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這表明，農村至今還沒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還要在有條件的地方去探索，要由各家各戶自負主要的責任。這顯示，中共長期來的「城鄉有別」、歧視農民的路線，還在維持下去。

幾十年來，中共都宣稱要發展先進科技教育，提高教育質素，但國家卻投入不足。推進市場經濟後，學費、雜費更飛漲，尤其是讀專上學校的費用更高昂，又要由學生自付。（為此，社會上發生了許多悲劇，有些學生考上大專後因交不出學費而走向自殺。）對此，《決定》表示要「完善和規範以政府投入為主、多渠道籌措經費的教育投入體制，形成公辦學校和民辦學校共同發展的格局。完善國家和社會資助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制度。」可是，對部分學生要自付學費的問題卻避開不提。

市場經濟雖然使中國經濟有頗快的增長，國力大為加強，許多人生活質量提高，但也造成了社會向兩極嚴重分化，使貧者愈貧、富者愈富。《決定》對此有隱隱約約的部分透露，表示要「重視解決部分社會成員收入差距過分擴大問題。以共同富裕為目標，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但如何「提高」和「調節」，何以需要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是否意味中共因為要依賴中產階級以填補它所背離了的工人階級空位？）這又同幾乎全篇的說法一樣的含糊抽象。

它提出要「及時化解各種矛盾，確保社會穩定和工作有序進行」，正是中共這一政策已加劇社會各種矛盾、不穩定的真實反映。

綜觀《決定》所提出的做法，和中共政策所已造成的中國現實，都正在把中國推到資本主義完全復辟的死巷去，如果沒有出現重大事件或工人階級的有力鬥爭干預加以打擊、改變，則這種趨勢便會在不遠的將來變成現實，完全背離了社會主義的方向、目標，在實際上絲毫沒有社會主義的氣味。不過實際越是這樣，《決定》卻越要在臨近結尾時高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舊調。

要改變中國一黨專政及其錯誤政策造成的資本主義復辟危機和各種困難、民間怨憤，等等，便必須進行真正徹底的民主政治改革。《決定》只是簡單抽象地說「要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但它指的並非徹底的民主改革，中國從來都沒有存在社會主義民主，根本就不是「擴大」民主問題，而必須要由下而上地從頭去爭取這種民主。這證明它只是搬弄些漂亮的外交辭令作敷衍。

2003年11月12日

註釋：

- <1> 見本刊總212期《政府報告啟示的當前嚴重問題》所引2月22日《明報》報道。
- <2> 見許滌新主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簡明政治經濟學辭典》312頁。
- <3> 10月27日《文匯報》。
- <4> 詳見10月28日《文匯報》轉載《中國經濟時報》的報道。
- <5> 10月29日《文匯報》。

中國的動力：一黨統治支持下 向資本主義漸增的開放

兆立譯

〔譯者按：第四國際是個世界性的革命社會主義組織，1938年由托洛茨基等人建立，一貫堅持反對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和斯大林主義官僚專制的立場，主張工人民主的社會主義路線。今年（2003）二月在歐洲召開了第四國際的第十五次世界大會，通過了一系列文件和聲明，範圍涉及世界形勢、反全球化運動、資本主義復辟問題、生態運動和同性戀解放運動等。〕

以下兩文，一篇是這次世界大會所通過的文件《世界新局勢》中關於中國的部份；另一篇是該次大會對資本主義復辟問題的聲明。讀者如將前一文與《十月評論》上一期（總第213期）所刊出的決議草案加以比較，即可發現正式文件中已刪除「官僚化過渡政權」的字眼。讀者也可從後一文中看到大會鼓勵各方人士對資本主義復辟過程的問題繼續進行討論。〕

對列強而言，中國繼續代表一個不確定因素，這在地緣政治的平面（已知的有台灣、西藏、中亞細亞等問題）和社會經濟的平面上都是如此。美國、歐洲聯盟、特別是日本的統治集團都意識到，在任何局面下（除了分裂以外，不過很難設想這會發生，雖然有潛在的離心力量），中國將會努力地試圖在未來幾十年內扮演強國的角色，維護它在亞洲的支配權力。還有，它似乎也從科索沃戰爭中得到教訓，硬要將其軍事潛力進一步現代化。俄國及所有東歐國家都在1990年代頭幾年經歷了生產的降落，以致到了2000年，只有在極少數位於中歐的東歐國家中，其GDP（國內生產總值）才趕上十年前的水平。相反地，中國在過去廿年中卻經歷了每年幾乎10%的增長率，包括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的超過8%的增長。中國在過去20年中減低貧窮人數的統計數字，就是使世界統計機構能夠聲稱全球的貧富不均已有減少的根據——其實在過去廿年中，如果不把中國的統計數字包括在內，全球的貧富不均是一直在增大的。

在這同時，收入的差距已在中國擴大了。與之一起發生的，是對過去在衛生和教育方面所達到的社會進步的挑戰，及對就業保障的挑戰。資本主義私有化的邏輯正在大行其道，而且越來越多地被寫進法律。

由於這個情況，反對社會不平等的抗議活動就層出不窮，而且時常特別提及社會主義的「路線」與發展中的資本主義現實之間的差距。

按照新自由主義辭令的觀點是，似矛盾而正確的是，

對外國資本已證明是最有吸引力的，是對既具壓制性又在支持增長的國家和強大黨權的支持。在千禧年轉換的時候，外國直接投資的積累資本在中國是3000億美元，在俄國則是120億美元。但是，直到那時為止，中國的開放一直受到控制，而且是大量地「中國式的」〔大概指中外合資——譯者註〕。增長所需的資金只是局部依靠外國投資——這一點，再加上它的相當多的商業慣例，才給了中國力量來抵拒新自由主義的規則。外國直接投資的數字，與一國人口的多少相比，就更有意義。在2000年，中國的每人年均外國直接投資的數字是160美元，俄國是85美元，哈薩克是571美元，波蘭大約是1千美元，而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國則是2千美元。大體上說來，中國的增長依靠以干涉主義和國家保護主義為基礎的新商業主義。這種新商業主義，受南韓和日本在其強烈增長時期所採用的措施的啟示，多於受新自由主義規則的啟示。

如中國主要地免遭1997-1998年亞洲危機這個事實所證明，直至1990年代末期，中國對國際貿易的開放是在一個極端保護主義的基礎（例如它的貨幣的不可兌換性和對非居民的籌資所強加的嚴格限制）上進行的。

世界貿易組織會員國的資格是與改革的激進化一起發生的。改革激進化的目的是要越來越多地把重要的公司轉變為發行股份的公司，把金融系統向外國資本開放，而且把中共黨的大門向生意人打開。在這同時，舊時的各種社會保障措施——被摧毀了。

這個繼續不斷的過程正受到越來越大的反對社會不平等的抵抗運動和偶發事件的阻礙。

這些抵抗運動的形式，由於它們的起源追溯到天安門運動，所以可以動搖這個政權的表面上統一，導致這個黨——國機構骨架的破裂。運用社會主義詞藻來美化的做法顯然必須加以挑戰。這不但是就各種向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擴張的措施而言，連面對著任何「溫和派」或保守派時也應該如此，因為這些「溫和派」、保守派不會把引進人們的自我組織權利和對集體財產的管理權利放在必要的反資本主義的抵抗運動的中心。

（譯自《國際觀點》2003年夏季號351/2夏季號）

關於資本主義復辟的聲明

—第四國際第十五次世界大會通過

兆立譯

對於在由官僚層所領導、盜用了社會主義名義的政權中的資本主義復辟過程，第四國際世界大會重申一個共同採取的立場，不管國際內部在分析這個資本主義復辟過程時存在甚麼樣的分歧。

我們在過去始終支持工人和人民的反抗斯大林主義獨裁制的鬥爭；特別是在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前蘇聯和中國。

此外，我們支持這些國家的人民、工人和農民的抵抗運動，反對由進行中的資本主義復辟所造成的各種結果。

我們始終為著自我組織、工人的自我管理和民主的權利，與聲稱代表社會主義、但維持反人民、反工人的鎮壓機制的官僚政權作鬥爭。

正是為了這些同一要求和原則，我們才繼續提出要求，去抵抗伴隨著資本主義全球化向東歐、前蘇聯和中國擴張的那些主導政策和方針。我們拒絕接受，而且着重發言反對所謂社會主義的官僚政權的各種政策，這些政策的必然結果是社會福利的惡化，生產資料的商品化和普遍私有化，以及對工人剝削的劇烈增加。同樣地，我們不但拒絕接受對一黨獨裁制的懷舊回憶，也拒絕接受在權力層控制下對社會福利的假意保衛。這些權力層一方面提出反對全球化的路線，另一方面則以前者為幌子來隱藏它們自己的特權和壓迫關係。

我們在每個地方都反對對社會福利和人民權利的侵犯，同時無條件地支持各種形式的反對社會退步的抵抗運動，不管推行這些政策的政權、國家的稱號是甚麼，特別是在中國。

我們也拒絕接受這個政策所能採取的其他形式，特別是在中國，這個政策以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名義，以表面仿真的現代化為幌子，向世貿組織所定的規則打開門戶。這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事實上意味著對工人階級的超級剝削，「以最可能低的成本」，為世界市場實現生產，同時使中國的新資產階級致富。

第四國際認為，在與一切正在進行中的抵抗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各種形式鬥爭取得聯繫的同時，特別是在前蘇聯、東歐和中國，繼續而且更深入地進行以下工作是十分緊要的：

(1) 對直至現在仍以工人的名義執政、但實際上在自

稱是社會主義的同時犧牲他們利益的各個政權，進行徹底的、批判性的分析；

(2) 在從來未實際上實施過的個人和集體民主的基礎上，與一切反壓迫的鬥爭聯系在一起，使名符其實的社會主義計劃重新建立起來。經驗顯示，新自由主義政策已無法在各大洲帶來進步的民主的新世界秩序，它們反而導致了不受約束的資本主義及其一系列使社會退步的措施。這種資本主義以其不時發動的戰爭威脅著整個地球的人類。

第四國際將會鼓勵社會運動的所有組織與這些國家的人民和工人們建立團結一致的聯繫：

(1) 對於青年和婦女的協會，也對於工會會員們，當他們面對私有化、對工作條件的攻擊，以及由跨國公司、官僚和新資產階級所強加的裁員時，我們要求他們幫助組織新的工會和提出他們的需求；

(2) 對於進行另一個全球化的運動，我們要求他們協助促進共同了解，在行動上進行國際性的團結，反對全球化的資本主義。

此外，世界大會授權接任的國際執行委員會，對有關於這個世紀的革命、斯大林主義和資本主義復辟等的理論和綱領的問題（在內部及與其他組織，在國際的刊物和在各支部中），組織對上述問題的繼續討論。

〔譯自《國際觀點》2003年351/2夏季號，第15次世界大會特輯〕



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確立資本主義法律體制

高島義一

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三中全會於10月11日至14日在北京召開。此會議的最大特徵就是接受主導中國經濟發展的資產階級的強烈要求，維護資本家的私有財產權，撤消所有限制私有資本積累的經濟政策，從法制上確立已經變成資本主義體制的中國經濟體制，以便在明年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修改憲法，明確加入“私有財產不可侵犯”等條款。

在“關於經濟所有制的決定”中，股份制被規定為公有制的主要形式，非重要產業的國營企業將被私營化，由市場決定其命運，同時積極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在“關於金融改革的決定”中，除了確認正在全面進行的商業銀行的股份制外，將把中國人民銀行以外的所有國營銀行都民營化。在“關於對外開放的決定”中，以WTO規則為最高“憲法”，保證外國跨國公司在中國的地位，同時推動中國企業積極向跨國公司轉化，成為全球資本化的主角之一。

中國經濟已經全面完成向資本主義體制的轉化，在這個轉化過程中，中共官僚體制用“反革命”罪殘酷鎮壓勞動民衆的抵抗，為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提供最大的保障。中國已經變成資本主義國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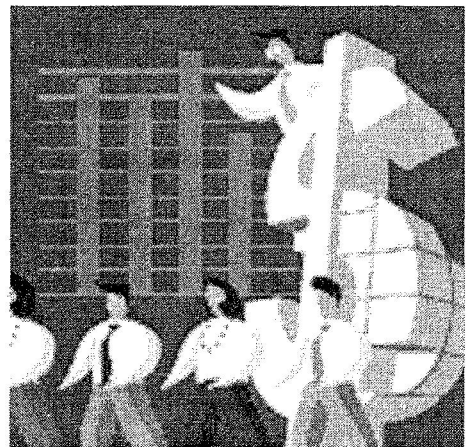
例如，四大國營銀行之一的中國銀行於2002年7月在香港上市，正準備在紐約上市。它與美國摩根士坦利合資成立的中國最大對外投資銀行中金公司最主要的業務就是金融投機。中國的國營銀行已經作為資本主義金融賭博的一個賭徒登場了。與日本的8百多萬個人投資者相比，開設10年的中國證券所已經有6千多萬“股民”了。實際上，在亞洲自由貿易協定FTA的形成過程中，中國政府已經越過日本，主導跨國資本的全球化了。

自從去年11月中共第十六次修改黨章，把中國共產黨由工人階級先鋒隊轉變為“全民政黨”以來，大量的資本家入黨，在“五·一勞動節”中也有許多資本家受到表彰。中央黨校的御用文人們登場解說資本家的貢獻大於工人，反映出資本家階級進一步影響、掌握中共和國家權力的現實。

從另一個層面上，在中國的統治階層完全與資本家階級結盟，納入世界資本主義全球化體系之後，中國民衆的鬥爭，將不僅僅停留在反抗本國統治集團的範圍內，而具

有更深遠的世界意義。這可以說是中國革命的繼續，需要日本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度裡的勞動階級的支援與幫助。

〔趙京節譯自新時代社《橋樑》周刊2003年11月17日第1805號〕



~~~~~

(上接第10頁)

民主派主流強烈要求政制檢討，尤其希望您接受2007年普選行政長官（因為十分不幸，一定要行政長官先接受，才可實行），請您不要再左閃右避，坦白回答，您願不願意答允？您根本連檢討時間表也不願確立！您說留下做行政長官，需要更大勇氣，恐怕勇氣之外，需要的是更厚的臉皮！我們清楚知道，有您一天，香港的民主進程無望推前！香港在這六年來，因經濟問題而自殺的有6000人，死於沙士的有299人，縱使您能使報告書對事不對人，但能夠問心無愧嗎！農曆7月14日剛過，中半山晚上陰風習習，有如冤鬼呼魂，新鬼煩冤舊鬼哭，不知您睡得安穩否？周處在殺了南山虎和長橋蛟後，痛自改過，名留青史，希望您能效法他，馬上辭職，以便在青史與他齊名！

(561人聯署)

## 第四國際大會關於國際政治形勢的意見

弗·奧利維埃

一開始，我們應當注意到：第14次世界代表大會召開以來國際形勢的顯著變化。那次代表大會是在1995年6月召開的，當時形勢的特點是：世界各地區「現存的社會主義」體制的崩潰以及資本主義的全面復辟；不少歐洲國家在政治上、社會上的受挫，以及拉美國家革命運動的失敗。但2003年世界代表大會召開時，形勢全然不同了，其特點是：反全球化運動和一系列國家內社會抵抗運動的不斷增長。這是嶄新的政治和觀念的內涵，有利於社會各部門及社會運動的政治化。拋開歷史性的斯大林主義的包袱不說，1995年，新自由化攻勢與東歐集團國家的土崩瓦解相結合，帶來了社會、政治和觀念的受挫。今天，在政治上和觀念上，形勢發生了以下的變化。

### I、戰爭、社會不穩定和多種矛盾

統治階級無能穩定新世界秩序，全球化資本主義正在產生多種新的矛盾：反伊拉克戰爭再次證實了世界形勢的無序性。

I、1 前東歐集團國家裏，新自由化攻勢和新市場開放，並沒有導致資本主義經濟持續增長的新時期。與此同時，還出現了資金積累過剩的危機——因為資本不斷產生利潤。此外，生產的容量過大和公司的倒閉，帶來了生產過剩的危機，這比20年前更加強烈，因此，給利潤率很大打擊。這種情況可以從根本上解釋了美國當前局勢的變化，這種變化是在股票市場在高新技術行業部門受到打擊以前便發生了。經濟增長期受到限制，而美國或歐洲經濟放慢的蕭條期卻拉長了。阿根廷、烏拉圭等國經濟正處於崩潰狀態。資本主義的現階段正在加劇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和世界其他各地的不平等、災難和貧窮化。

I、2 全球化也就是軍事全球化：最近10年中，美帝國主義策動了一系列戰爭——每次各有其自身特點，但其目的是為了鞏固美國霸權主義。這也表明了美國經濟機制的變化，即石油多國化，以及軍事工業綜合發展已取得了決定性地位，這必將導致軍備競賽的重新發動，軍事預算的爆炸性增長以及美帝國主義侵略性的方針導向。所有這些

國際性的目標在於美國要以政治—軍事戰略來統治全世界，包括支配其他的帝國主義列強和全球資源的控制——特別是石油。在此框架內，我們對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之間的衝突，應該是可以理解了。但新的質的因素——特別是1991年的海灣戰爭、巴爾幹戰爭或阿富汗戰爭，則是帝國主義相互之間新矛盾的出現，不論就美國統治階級內部來說是如此，就是歐洲資產階級與美國之間來說，更是如此。如果這些矛盾深化下去，這必將打開國際政治的新組合。

I、3 這些因素的相互結合（經濟危機，安然公司的破產，主要的財政和工業多國組織的整頓，股票市場受挫，以及類似阿根廷等國的崩潰），已經導致新自由主義在政治上和觀念上的危機，而且也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樣的體制打上一個問號。這種情況導致帝國主義反攻勢，以便保持新自由化政策的目標，而同時設法尋求與社會運動和工會領導層的一致性。這就是“達沃思（Davos）與阿雷格里港（Porto Alegre）間對話”的支持者的方針（可以說這是第三條道路——旨在克服達沃思與阿雷格里港間的對抗性），或者力圖找到在養老金問題上的一致性——如同今天法國的情況一樣。

### II、要求就業的強烈傾向和對全球化的反抗

II、1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和末期，階級力量對比關係起了變化。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國際矛盾，在相當範圍內引起了社會和政治的反響。這表現在工資勞動界的總動員上：如1995年冬天在法國、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總罷工，以及在一系列拉美國家中的鬥爭和反響（2001年12月在阿根廷、玻利維亞反私有化的總動員、委內瑞拉危機與盧拉的勝利）。反戰運動的強有力總動員，特別是在英、美也表現出這種變化。國際的任務之一，必須設法對這些鬥爭、這些新的社會運動以及這類社會和政治要求自我組織起來的中心地區的能動力進行分析和綜合說明。

II、2 反全球化運動是力量對比關係演化的部分體現。



運動的擴展，特別是在年輕人中的激烈化——這是60年代、70年代以來不可同日而語的激烈化——表明了反抗的潛在能量，這是重建和重新發動新工人運動的十分重要的出發點。

II、3 然而，這些變化並沒有改變了最近20年來的主要傾向。新自由化攻勢還在繼續下去：這表現在勞動力的流動性和傷亡人數增加、工人階級不斷地分散、擺脫了管理的約束、私有化、公然有利於富有階級的稅務政策、工資的壓力以及工人階級購買力的下降等等上面。所有這些一再得到證實了的社會性退化，企業破產和成千上萬多餘勞動力，使我們想到了真正的力量對比關係。

II、4 比之社會力量對比關係更重要的是，我們還必須估量一下資本與勞動之間，各國之間，換言之，受世界資本主義體制所支配的所有社會政治關係的一整套關係。我們應當注意到，統治階級在建設歐盟時所要建設的像美國自由貿易區（FTAA—ALCA）那樣的攻勢。我們切不可忘記，整體的工資勞動者正處於守勢。儘管在若干大國裏，例如美國、俄羅斯和中國存在著局部鬥爭，但工會化程度很低，工人階級的政治呼聲微弱，甚至全然聽不到。在其他阿拉伯地區和亞洲國家裏，斯大林主義、民族主義和改良主義相結合的危機，引起伊斯蘭思潮的發展，不管我們對這種特殊思潮作怎麼樣的分析，這是代表著這些國家廣大群眾政治覺悟性的後退。最後，我們當著重提到，在社會總動員與重建反資本主義階級自覺性之間存在著不同的節奏。當今，統治著一系列國家的社會現象，仍然是傳統工人運動的瓦解、非工會化以及傳統的左翼政黨成員數字的下降。整體工人運動，其中包括革命，仍然要為上世紀的受挫，特別是斯大林主義的災害付出巨大代價。要建設新的革命前景，仍然需要時間。

### III、工人運動的新歷史時期

III、1 今天，我們正處於工人運動的整個歷史性時期以及新週期消失的過渡時期——其特點是斯大林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社會自由轉化的結束，以及新的社會和政治力量的出現。這個過程正在開始。

III、2 社會民主主義融合在社會自由主義中去的基本理由是下列兩個因素的相結合：其一，是社會民主主義日益與國家以及經濟、財政的資本機制的上層成為

一體化；其二，還要與資本主義的新自由轉化相適應。私有化的不斷增加，不受社會關係管理規章的約束，公衆領域的減少，嚴格的工資政策在一國範圍內或者在歐洲框架內削弱了凱恩斯政策的基礎。參加政府的實驗，已大大增加了這些變化。我們可以在一系列國家中，看到一些平民階級從傳統的左派中分離出來。然而，這一質的轉化過程還沒有結束。對每一政黨的現實分析是必要的。一切與工人運動的歷史和現實的相關連接，並沒有一筆抹去。社會主義政黨不可能被右翼政黨所同化。

III、3 在一些國家的現實生活中，原本是群眾性的共產黨佔優勢的，現在，這些政黨的崩潰和迅速瓦解，畢竟是重大的政治事實。蘇聯的解體，已經失去了她過去的一切歷史作用。除了意大利的共產黨改建黨是個例外之外，各共產黨的危機，在蘇聯瓦解後10年多來，尚未產生過處於民主的統一的階級鬥爭前景的思潮和組織。在這些思潮中，有的是採取與社會民主黨結成戰略同盟的路線——如法國共產黨、西班牙共產黨以及德國的PDS（民主社會黨）等；而有的則是依附到斯大林主義或新斯大林主義的洋溢著鄉愁之情的老戀棧中去了，他們是拒絕民主和統一的概念的。我們切不可忘記，前東方集團的官僚層也融合到資產階級中去了。我們的方針是鼓勵對話和聯合行動，旨在把超越了雙重死胡同的新思潮迎接過來，並選擇一條統一的、民主的、反資本主義的道路。

III、4 主宰著國際工人運動的思潮（即社會民主主義和斯大林主義）危機，並沒有表明一切激進的改良主義、新改良主義或民族主義的結束。恰好相反，我們可以在一系列國家中（例如巴西和委內瑞拉），甚至在反全球化運動內部，都可看到激進的新改良主義的出現。成千上萬活動分子，正在反對新自由化攻勢，並且第一次把他們的政治經驗運用在以下局勢中，這種局勢的特徵是，仍然受到上世紀失敗、群眾自我行動受到限制，以及反資本主義傾向所削弱的影響。這也就為激進的新改良主義發展奠定了基礎。這些思潮還沒有在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或斯大林改良主義中紮下根來，而只是將它們體現在重組工人運動的過渡現象中。現在還存在一種戰鬥，即要詳細說明、區分並阻止右翼分子在國家或國家間的體制框架內鞏固下來。

## IV、我們的責任感和行動方針

IV、1 在運動中，歷史過渡期的這一新的局勢，為激進的或革命的思潮和組織打開了空間，而且呈現出能維持社會激進轉化的遠景，並能在階級鬥爭的現實運動中成為一體化的方向。換言之，這就不是宗派主義的了。對於革命馬克思主義者來說，這種歷史性過渡，要求有範圍更廣泛的政治和文化的轉變。多年來，我們歷來是斯大林主義的反對派。通常，這表明我們必須以代理人身份加以干預；我們要求其他的組織、黨派組成統一戰線。斯大林主義不再存在了，社會自由的轉化已給革命組織提供新的、直接的責任感。我們必須建立自己的組織，或更廣泛的反資本主義政黨，還要重建工會、協會，換言之，要充分參預各民族和社會運動的重建工作，這決非「培育他們自己的形象」，如同馬克思所說的宗派主義那樣，而是衛護這樣一個綱領，即革命者決不會「把自身利益與工人階級利益割裂開來」。

IV、2 這就要求把過渡綱領的方法應用起來——從迫切的鬥爭要求開始，但要把一系列戰略性和綱領性問題結合起來，這便形成了民主的、社會的反資本主義行動綱領的主要路線。這一戰略性和綱領性爭論的重新爆發，可體現在反全球化運動的討論中，就這層意義來說，戰略性標記就是：儘管我們還不能明確說明，在未來一個時期奪取政權的切實可行步驟，但我們可以根據反全球化運動的經驗和討論，旨在提出一系列問題，即戰略性問題和綱領性問題。

IV、3 這就是一些重新組合或聚集反資本主義勢力的政策方針的指示。當然，這一或那一綱領性問題，並不就是會合起來的條件。我們的目標亦不是在制訂出來的革命程式基礎上來聚集各種力量。但選擇必須是明確的：衛護反資本主義行動方針，獨立於資本主義國家體制，前景是要接受從斯大林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中得出的主要教訓。反資本主義國際代表大會的重心也同樣指出我們行動方針的要點，這就是：歐洲反資本主義國際代表大會，已經逐漸地從革命的或反資本主義組織，也就是說從傳統組織以外的思潮中發展起來。當前的起義或激變並不會損害到傳統的組織，我們僅僅要對它們施加影響，如果我們能從外部或強有力的中心大膽堅定地行動起來的話。

IV、4 在現階段，歐洲反資本主義國際代表大會，為我們在行動中交流經驗和可能團結起來的目標提供了空間。這裏有各種思潮，如我們自己的思潮、意大利的PRC（共產黨改建黨），英國的SWP（社會主義工人黨）都表明有可能匯合在一起。在目前的局勢下，可以作為參考因素的是要確立一種共同探討的途徑，這途徑說明了干預反全球化運動和建立廣泛的反戰運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其中包括總動員、反戰的直接行動、示威游行、象徵性佔領以及罷工等。當然，這些問題僅僅是一個起點，但它們對於總的途徑來說都是非常必要的。

革命者的團結一致，僅僅是在社會主義革命的簡單基礎上，在政治上說來是沒有用處的，但只當目標轉向社會運動的總動員和政治上重新組合的總任務時，才是有意義的。

這就是指導我們行動的一切原則了，但必須在現有經驗基礎上，必須在其他大陸或國際層面上建議反資本主義國際代表大會的基礎上。

（蕭明譯自《國際觀點》2003年5月號）



## 在反資本主義戰鬥的中心區： 讓我們再發動、再組合、再定位

維爾卡曼

今年（2003年）2月初，第四國際在比利時召開第十五次世界代表大會，來自40國家組織的代表和觀察員，參加了辯論，並通過有關世界形勢、第四國際的作用和任務等決議案，對第四國際章程進行了修改，並寫了新的序言，此外，還提出兩個綱領性文獻：「同性戀自由運動」以及「生態學與社會主義」。

代表大會選出新的領導（國際執行委員會），至少每年集會一次，執委會選出執行局全體理事。這兩個機構實質上已得到更新，而且年輕化了。

如果我們希望把這次世界代表大會總結一下，我們認為最恰當的是從以下這個主題開始，即在反資本主義戰鬥的中心，提出如何再發動、再組合、再定位的政策問題。

會議的氣氛，正如天氣一樣，溫暖如春，行動的表現是小心謹慎的；辯論是激情熱烈的；態度是認真負責的。自從上次代表大會（1995年7月）以來，時間已經過去近8年了，這次代表大會可說是老一代戰友們的重新團聚，他們在面對挫折和不斷上升的野蠻主義而自覺地「忠誠於自己的理念」。與此同時，新一代在國際總動員的上升期受到了考驗，他們準備繼承前輩的事業，也積極地參加進來了。對於新的遠景看法，在過去的爭論、傾向以及派別意見的相互滲透、相互比較之後而得到證實；提交討論和表決的政治文獻，是把焦點完全集中在未來的，現已在絕大多數人的支持下通過了。

### 在反資本主義的戰鬥中心

第四國際戰士及其各國組織，今天都正處在反資本主義戰鬥的中心。這不是新近才出現的事實，在1989-1991年這一關鍵時刻，第四國際各組織曾會同其他組織成員（這些成員人數很少）參與創辦國際性運動，當時這種運動雖曾被忽視了，但終於導致西雅圖和熱那亞總動員，舉辦了阿雷格里港（巴西）和佛羅倫薩（意大利）等地「社會論壇」，發動了各國人民反帝國主義戰爭的世界性興起。

正是由於這種種活動，才使我們第四國際的思潮擺脫

了局限性和教條主義化；才使第四國際的活動與示範性的解放運動聯繫起來，組成了抗逆時代潮流的群眾運動，為統一而奮鬥，並參加了最先進的思想觀念辯論，所有這一切也就是我們的傳統特點。

此外，還需要加上我們組織和國際內的內部開放，這就是說，在內部論辯中，任何種類的爭論都是容許的，甚至包括最極端的不同政見。正由於沒有外力的影響，舊世界還在展開運動，而用來動員人民群眾的、新的解放遠景尚未立即呈現出來，因為我們看不到更多的明顯的新事物，而存留下來的仍是那些教條式的信條。例如我們可以記得起的問題有：墨西哥的「薩巴達主義」，南斯拉夫的恐怖「民族問題」，相對於種族滅絕和無情大屠殺的國際體制的作用、依靠工資生活的階級及其組織在結構上的軟弱性、歷史末日到來等等。對於一個自稱為革命馬克思主義組織的選擇，變得更加簡單化了：對外是否開放？對內的論爭是否放鬆約束？（是否可容忍必不可避免的一批極端異見、懷疑和支離破碎的論點？），或者通過「教條主義式」的分析和學說，把所謂「正確的」政治路線強加於人，加強活動分子的紀律性以及把「一貫正確的領導」具體化，來達到對內部爭論的毀滅性打擊呢？目前，沒有一個革命組織不帶著新自由主義反革命時期的烙印而出現的。任何組織不得不應對挫折，不得不適應生存條件。誰也無法逃避自身內部危機——危機是不可避免的。我們堅信自己已經作出了正確選擇。擺在我們面前的是現實、是存在的問題。

### 群眾運動的興起，反資本主義勢力的再生

目前，主要的困難在於估量出，當今世界上實際發生了甚麼事？本屆第15次代表大會曾注意到：「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期，在世界政治形勢方面已形成一個轉折點。一個新時期打開了，要把徹底恢復勞工和社會運動的行動綱領、戰略和組織，提到議事日程上來」。我們國際在把這一點作為我們行動中心之前，早已小心地考慮過，為甚麼就在這一點上是躊躇不決地誕生出來的，而這一點後來就成為反資本主義全球化運動或稱作「不要全球化運動」，



或乾脆稱之是「一切運動中的運動。」在西雅圖總動員以前已經簽定的「對抗文本」，已為我們準備好了戰士，準備好了我們的各國組織，使我們的國際轉變成為「革命的主觀因素」。從一開始，在我們的隊伍中就有一種接近於全體一致的說法：我們必須參加到運動中去，幫助它建立起來，而且不帶教條式的或傲慢態度去尊重運動自身發展。從西雅圖總動員（1999年12月）到2003年2月15日這個富有歷史性的節日（各國人民反戰的世界性興起），其間還經過了阿雷格里港、熱那亞和佛羅倫薩等城市舉辦的「社會論壇」。國際社會運動的整個基礎重新奠定的原動力已經形成了，有了這種原動力，各種可能性和機遇都會由他們自身去發現、去說明、去組織了。

這一新的，強大的原動力或反彈力，由於以下三大矛盾而加強了。這三大矛盾是：(1)帝國主義和跨國大企業所推行的殘忍的軍事、經濟與反民主的進攻性，與在這一新社會運動中將顯現出來的，並成為這一進攻性的障礙的諸力量間的矛盾，新社會運動已經鞏固了自己，並有可能在三年內創立一個「單一的反戰世界陣線」，並將給所有資本家階級政府帶來壓力；(2)當這一新的社會運動興起時，工資勞動者運動缺乏同步的發展，這是長期來令人擔憂的事，這是一大矛盾，因為工資勞動者自從1985-95時期遭到挫折和失敗之後，由於力量對比關係處於不利條件，其鬥爭能量的恢復是十分緩慢的；(3)最後，從政治上來說，整個20世紀年代，有幾股政治勢力，如社會民主主義、後斯大林主義派、社會民粹主義等，在空前的歷史危機下，仍然支配著勞工和人民運動，因此，有組織的其他反資本主義政治勢力，便始終是十分脆弱了。這種脆弱性的突破，只有在兩種條件下才有可能：第一，爆發了無法克服的政治大變動，諸如後果無法控制的戰爭以及世界經濟大崩潰，第二，能實現我們的戰略任務去擊敗仍在工人運動和人民運動中擁有大多數勢力的新自由主義，並且我們能在反資本主義、國際主義、生態保護主義和女權主義基礎上去重建運動。這一鬥爭必定會圍繞在兩個問題上展開，即反帝和反新自由主義。

當前工人運動的危機，不可能由於簡單地加強革命馬克思主義組織而得到解決，因為正在我們面前展開的這個歷史時期的特點，不僅是革命左翼勢力十分微小，始終處於最少數的地位，而且社會主義自覺性、反僱主要求、英勇的戰鬥性以及各工會組織都在大規模地急劇後退。此外，革命主觀力量的不足，留下一個標記便是年輕人的狂熱的急進行為。這批年輕人，通過他們自己的社會經驗，

特別是由於歷史上空前的大動員，正在各個層面建立起一代代「政治接班人」的進程。

這股非同尋常的「組織」或「勢力」，在即將來到的社會運動的復興中，可以預見到必將佔據主要的甚至全部的力量，這就需要對這種「組織」提出一個恰當的建議，或確定一個恰當的主題。這主題只可能是集合一切反對派力量、一切激進的政治派別，並以新的政治編制形式出現（諸如政黨、運動、聯合陣線或結盟），不拘是多元論者或單一的反資本主義派別；不拘是戰鬥力量或僅供討論的場所；不拘是議會選舉的形成或議會外的活動；也不拘是社會運動的談判者與闡明者，或所有其他的一切政治思潮——改良主義與社會自由主義，都必須結合在一起。在這樣的形成過程中，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切不可採取「打進去主義」，也不可用保密的或公然承認的目標，去盡可能迅速地建立起一個革命綱領裝備起來的先鋒「革命黨」。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只不過是共同發起人、共同組織者，是一個廣泛政黨中的共同領袖，旨在分享現代鬥爭的經驗，並一起前進去創建一個能為社會主義而奮鬥的群眾性的反資產階級政黨。

### 創建一個新的群眾性國際

第四國際曾制定一些建議，這些建議能反映出活動和組織的三個層次，這不論在民族國家範圍內，或國際範圍內都有一定重要意義：

茲將這三個層次節要如下：

#### 1. 第一個層次

反全球化的國際運動，具有以下幾個特點：要講究自覺性、鬥爭方法、綱領性建議和國際結構。

這一層次能在年輕人中激發起應有的熱情，並能在老一代戰士們中引起歷史的回憶。

歷史上曾經存在過的幾個國際的建設，是同當時的社會和政治發展的新任務緊密聯繫在一起的。而現在這一新國際（即政治上重新組合），從一開始，便提出了新的群眾性革命反資本主義／反帝國主義國際的問題。

這一新國際是在當前運動和大動員中應運而生的。她不可能類似於她以前的幾個國際，當然也不可能類似於以革命馬克思主義政黨為基礎的國際。這一新國際將是大規模「自發性地」反映出當前歷史上空前的全球性資本主義的獨霸時期，而其歸宿必將是國際主義和直觀的反資本主義。不論從那一觀點來看，她將是迥然不同的性質，而與

其前身五個國際組織不同，這五個國際即國際共產主義同盟、第一國際、第二國際、共產國際（或第三國際）以及創建於1938年的第四國際。

創建新國際運動內部，存在著戰略和策略上的分歧意見，這不是工資勞動者階級自我行動中產生的，歷史上本來就有著「反政治的」互不信任，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才能去阻止資本主義全球化，並創建一個新的社會呢？這核心力量就在於世界規模的美、歐帝國主義內部廣大的被剝削、被壓迫群眾。此外，還要在兩條戰線上發動鬥爭：其一、反對社會自由主義左翼的霸權主義；其二、要在激進的革命左翼內部發起兄弟般的政治辯論去反對宗派主義和「革命先鋒主義」。

### 2. 第二個層次

十多年來，第四國際曾與其他非宗派性激進左翼共同建立了廣泛的、多元化反資本主義的組合，以便去擊敗社會自由主義左翼的霸權。這一新的反資本主義政治運動，很快就能在各地區、各大陸達成有關這一新運動的一致協議，聖保羅論壇便是一個實例。最近，在多個不同國家裡舉行會議來發動反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大匯合。自2000年3月以來，在歐洲，「歐洲反資本主義左翼」每兩年集會一次，赴會的有具有代表性的政黨和運動，其中有丹麥的紅—綠聯盟，葡萄牙的左翼集團，法國的共產主義革命同盟，蘇格蘭的社會黨，英格蘭的社會主義聯盟，英國的社會主義工人黨等等。最近，意大利的革命共產黨也參加進來了。在亞洲，由澳大利亞的民主社會主義黨發起，組成了亞太團結大會，每兩年舉行會議一次，這是一個廣泛的激進反帝政黨和社會運動的大聯合。

所有這些都是富有前途的，儘管目前發展的趨勢還是脆弱的、分散的，不可能直接通向全世界性的水平，但這並不能排除通過探索走向社會運動的大發展，並舉行世界性大會。

### 3. 第三個層次

考慮到我們支持全球性正義運動以及反資本主義重新組合的優先性，我們為一切不同政見辯論、各種倡議以及與各種革命左翼思潮的會議敞開了大門，以考驗我們代表大會提出的大匯合，沒有這樣的措施，就不可能在短期內形成新的結構。

以上我們所設想的三個層次，即政治上明朗化、多元化的反資本主義重新組合，以及與革命左翼的對話，可以形成我們一目了然的政綱，所有這一切都有助於創建一個新的群眾性反資本主義的國際。

### 第四國際——要再發動、再定位

自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到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時間已經過去了7年7個月，歷史規模的延續性在社會的各層次都已發生了斷層。

我們的組織曾遭到過困難，也取得過成就，最近，解放運動又再度興起了，因此，我們必須從思想上重新建設我們的領導機構、協調機制、公開參與以及我們的教育學校、辯論會和新聞工作。要解決這些問題，就不僅僅是一般地宣傳社會主義，而且要向公眾表明第四國際有其特殊的政治作用，即要完成日常活動、群眾工作和社會運動。這就要求要經常的、持久性的宣傳我們的理念，要有前後一貫性的鼓動工作，要舉行政治和戰略性的討論，並加強我們的組織體系。

第四國際的復興，不可導向宗派主義的自我肯定，但要走向開放、對話、合作和重新組合，要創建世界規模的勞工和社會運動，要具有新的、國際主義的、多元化的革命戰鬥力。我們只是托洛茨基主義思潮中的一支力量，我們要同許多其他思潮（包括其他的托洛茨基主義思潮在內）團結起來。我們深信，通過同其他激進的、非宗派主義的思潮的系統性合作，我們便可以吸收新的力量、黨派和社會運動。這就是我們所談的重新定位。

（蕭明節譯自《國際觀點》2003年5月號。作者係第四國際國際執行委員會成員，兼執行局理事）



# 評日本2003年度《防衛白皮書》

松本龍雄

8月5日，小泉內閣正式通過日本2003年度《防衛白皮書》。此書的最大特徵是無原則地追隨美帝國主義的戰爭政策：“美國作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在國際上確立起軍事、科技等方面的優勢，……與別國的差距越來越大。”“在這樣的壓倒性國力的背景下，以美國為中心的新的國際關係正在逐漸形成。反恐戰爭和對伊拉克作戰，加速了這個過程。”不僅如此，此書還高度評價踐踏聯合國憲章的侵略戰爭：“這一次對伊拉克作戰，表明美國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不能採取有效手段之際，排除放置威脅不管的妥協態度，為了美國與同盟、友好國利益而堅決果斷的意志和能力。”更進一步，此書把美日安保體制擴張到全球範圍，準備把自衛隊派遣到世界上每一個地方與美軍共同作戰。“今年五月的日美首腦會談中確定了強化世界範圍內的美日同盟，在今天的安全保障環境中，日美兩國在充實亞太地區的合作外，更應強化聯系對應全球性的課題”。

自從去年美國對阿富汗的戰爭以來，小泉政權趁機強行通過“反恐特別措施法”，派出海上自衛隊為美軍、德軍、法軍等提供補給。現在又強行通過伊拉克派兵法案要把自衛隊（陸軍）派往伊拉克，為國家戰爭體制的形成提供突破口。正如此白皮書所稱：“自衛隊應該準備出發參加國際和平合作，……今後要執行更加艱巨的任務”。

在此書的最後一章“今後防衛廳、自衛隊的形態”中，明確提示要在世界的任何角落都積極展開軍事活動的政策方向，強調“更積極、能動地在亞太地區及國際社會的和平與安定中發揮作用。”這一章乾脆連歷代自民黨政權不得不承認的“海外派兵違反憲法”的“專守防衛”政策也拋棄掉，“對我國的伴隨著大規模準備的登陸侵略的可能性不高，所以專門對應登陸侵略的裝備等規模可以縮小”，另一方面，“自衛隊僅僅因為其存在就達到抑止威脅的效果是不夠的，應該設想如何積極地運用自衛隊執行任務。”這就需要適應“運用的時代”的要求，更有效地建築自衛隊的體制。

就在小泉內閣發布《防衛白皮書》的前一天，防衛廳正式決定要導入被稱為“乘載直升飛機的護衛艦”的航空

母艦。這樣被列入2004年度預算，於08、09年服役。

此直升機母艦可以乘載四架全長33米、運載55名士兵的超大型直升飛機，基準排水量為13500噸，滿載排水量近兩萬噸，與英國參加伊拉克戰爭的航空母艦幾乎相當，比意大利海軍的航空母艦還多3000噸排水量。此艦與英國的航空母艦一樣，可搭乘垂直起降戰鬥機（特別是美軍正在開發的時速16馬赫的F戰鬥攻擊機），服役後可成為小型的進攻性航空母艦。

目前，海上自衛隊還沒有指揮大規模海上作戰的指揮艦，不能展開獨立的海上作戰，而聽從美軍的指揮。這種直升機母艦服役後，也可以具有指揮中樞機能，像美軍第三艦隊旗艦那樣成為指揮艦。

同時，已經服役的大型登陸艦（滿載排水量1300噸）可以運載18輛大型90型50噸級坦克和330名士兵，具有強行登陸的能力。這種登陸艦不久將有三艘服役。可以想像，幾年之後，配置了強大的登陸能力和航空母艦機動部隊的日本軍隊，在改變和平憲法之後，蛻變成帝國主義的侵略軍。

與此同時，防衛廳在04年度概算要求中，已經決定加入四架空中加油機的配置費用。今年三月，石破防衛廳長官在國會中聲稱“正在考慮自衛隊攻擊海外敵軍基地的能力”，這種海外攻擊能力是歷屆自民黨政權保證不導入的，但是，兩年以後，日本也將像1999年美軍從本土出發轟炸南斯拉夫那樣，由空中加油機加油的轟炸機可以實施跨洋遠程轟炸了。另外，在今年度的預算中，也加入高度二十公里的高性能無人偵察飛機的開發費。今年四月，日本已經違反1969年和平利用宇宙開發的國會決議，發射了軍事衛星。

日本正在向帝國主義、軍國主義的道路上突飛猛進。

〔趙京譯自《橋樑》周刊2003年8月25日第1793號〕



## 日本政治進一步 右傾、保守化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九日日本衆議院480席位全部改選，在300個小選區（即只選出一人的選區）中，社會民主黨只獲得一席，共產黨未獲一席。在比例選區的180個席位中，社會民主黨只獲得5席，共產黨獲得9席。這樣，自戰後以來領導反對黨政治的兩大政治勢力，在今日的日本衆議院中加起來也只有大約3%的席位。

社會民主黨的席位從18降為6席，其“黨魁”，原社會黨委員長土井連盤踞幾十年的選區也輸掉了。土井的政治生命已經接近尾聲，如果她辭去“黨魁”職務，社會民主黨就沒有全日本知名的人物了，作為政黨的生命也將宣告終結。曾經在一九五六年獲得166席位的社會黨演變到今日的社會民主黨小團體，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史上非常獨特的教訓。

日本共產黨的席位從20席降為9席，並沒有教育其上層集團反省其不斷右傾、保守、甚至反動化的路線錯誤，反而會加速其進一步融化入現行體制中，力圖靠巴結“在野黨”民主黨討一個政府大的位子。

在為數不多的十來名獨自參選人中，唯一的一名進歩市民派女士川田悦子也未能保住席位。在這個選舉中成為最大贏家的民主黨（177席位），由自民党的最左、最右派別分裂出來招納大部分社會黨議員組成，與自民黨並沒有多大差異。日本政治的結構在國會級別，已經確定成為美國式的兩大執政黨輪流坐莊的體制，為進一步修改和平憲法、邁向軍國主義提供了立法上的保證。

（趙京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九日 San Jose）

## 日本國民保險制度的崩潰

日本政府社會保險廳七月二十四日公布國民年金（保費）的狀況如下：

二〇〇二年度的保險金繳付率為62.8%，比上一年度減少8.1%，為歷史最低水平。所有年齡層，所有都道府縣都呈減少趨勢，而年輕人最為顯著：25—29歲的繳付率為49.4%，20—24歲繳付率為47.4%。

在社會保險廳對未繳付者的調查中，64.5%回答“保險金額太高，經濟上很難繳付”，15%回答“不對國民年金報希望”，4.5%回答“繳付多於所得”。未繳付者中有53%加入私營的人壽保險，11%加入私營的個人年金保險。

引起繳付率下降的另一個原因是金額免除基準的強化。〇二年度金額免除者是144萬人，為〇1年度的一半。這144萬不符合免除基準的人中，只有14.5%繳付保險金。這可以說經濟蕭條狀態下的實況吧！另外，從〇二年度開始，年金征收的業務由各市町村移管到社會保險廳，專職人員不足，也是繳付率下降的一個原因。

國民年金制度是為自營業主、農林水產業者、無職業者、學生等設立，〇三年三月底有2237萬人加入。保險繳付額是每月13300日元，加入25年後滿65歲開始領取年金。加入40年可以得到每月6萬6千日元，不到40年的領取額逐步減少。

在公司和政府部門工作的職員，由單位在發薪金時自動扣除“厚生年金”與“共濟年金”部分，沒辦法選擇。否則，許多人也會拒絕繳付的。（譯者在日本公司工作時，明知不可能領取年金，曾要求免除繳付厚生年金，未果。）目前，日本政府正在策動“強制征收”立法來提高國民年金的繳付率，以支撐崩潰的國民年金保險制度，真可謂本末倒置。

【趙京譯自《橋樑》周刊[2003年8月4日第1791號]

# 能建立巴勒斯坦國嗎？

## —以色列的方案是不現實的

埃米拉·哈斯

巴勒斯坦的領導層，現正忙於解決巴以兩國間存在的問題，即沿著以色列邊界建立一個獨立的、持久的巴勒斯坦國是否有落實的可能。

由阿部·馬曾（*Ahu Mazen*）率領的巴解代表團提出以下問題：以色列定居點建設的一般政策，特別是在耶路撒冷的政策，會否取消掉巴以兩國先前達成的和談框架，並迫使巴勒斯坦以新的框架來取代它呢？

這些天來，阿部·馬曾代表團正處於最後完成一個文件的過程中，這份文件要詳細報告以色列定居點的建設活動，特別是耶城周圍的西岸地區和耶城的東部地區，同時還要處理「隔離牆」的建設問題。所有的資料是以發表在以色列的報紙上以及《和平周刊》和以色列人權組織「*B'tselem*」的報道為基礎的。這份文件的標題是《以色列阻撓兩國問題的解決》，文件還附有獨立的一章，專談以色列在東耶路撒冷定居點建設政策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實質性問題。

同樣巴勒斯坦財政部長薩利·費亞德（*Salim Fayyad*），現正在華盛頓訪問，他警告與他一起開會的美國人說：以色列的定居點建設政策，很可能阻撓了沿以色列邊界建設巴勒斯坦國的解決方案。

### 名義上巴勒斯坦國，實際上類似印第安人保留地

巴勒斯坦文件警告說，「如果國際社會不去阻止以色列定居點的建設，不排除因此政策造成的種族隔離的現實，這將迫使巴勒斯坦的決策者重新考慮兩國間解決方案的實踐性。」

根據上述文件，以色列定居點建設政策帶來的後果是：未來的巴勒斯坦只是名義上的一個國家，而實際上泡製出來的實體恰似美國的印第安人保留地，其水陸交通都是十分有限的。文件起草人（包括法學家、院士、地理學家）的意見是：在過去兩年中，以色列已利用矛盾的衝突，旨在鞏固定居點建設政策的三個趨向：(1)封鎖東耶路撒冷與西岸其餘地區的來往；(2)切斷西岸南部和北部的聯繫；(3)破壞巴勒斯坦城市發展的遠景。

根據上述文件，中心大都市耶路撒冷的未來面積由內外公路、隔離牆、計劃中的輕軌路線以及不斷升級的建設工程（這項工程把以色列定居點彼此連接起來）所決定

的。中心大都市耶路撒冷將橫跨440平方公里，而西耶路撒冷僅佔這面積的25%。留在這塊領地內的其餘部份早在1967年已被以色列所佔據了。

以色列這項建設工程，將使以色列的定居點與耶路撒冷連起來，妨害了巴勒斯坦未來發展的可能性，切斷了巴勒斯坦各地區相互間的來往，也切斷了與東耶路撒冷的聯繫，卻使以色列通過公路控制，保證了它對西岸廣大地區的統治。

正在西耶路撒冷南部所進行的定居點建設，將把伯利恒及其鄰近的小城鎮、小村莊全面包圍起來。這將使這個地區得不到自然發展，並切斷了這地區與耶路撒冷及西岸南部的聯繫。

### 東耶路撒冷，馬阿勒—阿杜明集體

以色列泡製的E-1計劃，旨在擴大馬'阿勒—阿杜明集體，使定居點的連續性更加延長，一直延長到「法蘭西山系」地區，這使以色列沿公路的主要據點得以鞏固起來，所有這些公路是把西岸的南、北地區連接在一起。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水平狀橫向公路上，這些橫向公路可把東邊的約旦河谷和西部的以色列連接在一起，擴大了的E-1計劃奪去了巴勒斯坦鄉村及其周圍的廣大地區，使巴勒斯坦在這個地區的經濟和城市發展的可能機會受到遏制，這廣大地區是靠近被佔領的東耶路撒冷，仍然是一片未開發的地區，這將嚴重地破壞了巴勒斯坦提出的「大耶路撒冷」的實現。

### 新柏林牆

根據上述文件，一個單一的定居集體就是以切斷耶路撒冷東邊與其周圍的聯繫，如耶路撒冷的南大門和東大門。然而耶城的北大門就不是這種情況了。素法特與拉瑪拉之間，巴勒斯坦建築群的連續體，儘管是疏疏落落的，但以色列卻借機在耶城的北大門構築兩座外定居區以及比尼亞明定居區。

三條公路的新建和擴建工程幾乎都已完成了，使以色列兩個定居點相互連接起來，並連接到西岸、西耶路撒冷和特拉維夫的其他定居點。與此同時，這些公路突破了巴勒斯坦在這個地區建築群的連續體，切斷了它們彼此之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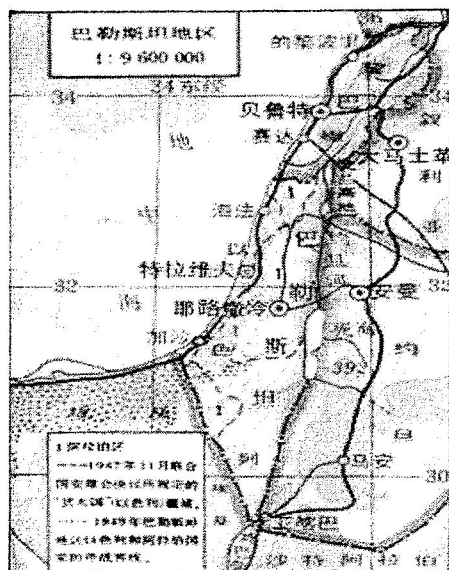
以及與拉瑪拉、耶路撒冷的聯繫，並遏制了它們的發展。這樣的實例很多，不再一一列舉。上述巴勒斯坦文件還著重強調，環繞著耶城的環城路，是與世界各國城市環城路的作用相反的，因為世界各國環城路的修建，是為了緩解人口密集地區的交通阻塞，但耶路撒冷環城路是為了加強以色列對耶路撒冷的控制，為了連接以色列的南部殖民區與北部殖民區，卻使巴勒斯坦與耶城市中心的交通隔絕。根據上述情況分析，這裡就是新的柏林牆了。

### 隔離牆

根據上述文件，隔離牆設計的長度要三倍於柏林牆，有些地方高度要兩倍於柏林牆，其後果是：第一階段的築牆工程，事實上把3%-5%西岸地段歸屬於以色列，當東耶路撒冷的隔離牆築成時，額外的3%西岸地段又歸屬於以色列，這樣總數為9萬巴勒斯坦人，由於他們不是以色列居民，勢必要在隔離牆與格林線（Green Line，快速公路的綠線）之間生活了。

上述文件帶總結性地說明了：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和西岸南、北兩地區的建設政策根本消滅了這樣一個遠景，即讓耶路撒冷成為以巴兩國人民和兩個國家的開放的和合作的城市。文件警告說：「如果這項建設政策不能使巴勒斯坦有連續性領土，則唯一的選擇只能是「一國、兩族」的解決方案了。然而文件的起草者估計，以色列不會接受這個選擇，因為這會威脅到猶太國家的基礎。文件在結束語中，提出這樣的希望：以色列由於擔心巴勒斯坦人口的增長，迫使它再次考慮定居點的政策，「並且有可能同意耶路撒冷的分而治之」，在最後時刻，以色列可能醒悟過來，同意了兩國問題的解決方案。

（蕭明譯自《在兩條路線之間》02年12月號）



## 代售書目

本地郵購請另付書價10%、  
海外20%作為郵費。

| 書名                            | 作者      | 價目     |
|-------------------------------|---------|--------|
| <b>馬克思主義理論</b>                |         |        |
| 過渡時期的社會經濟                     | 曼德爾     | 30.00  |
| 共產黨宣言                         | 馬克思 恩格斯 | 30.00  |
| 從斯大林主義到歐洲共產主義                 | 曼德爾     | 40.00  |
| 世界經濟和帝國主義                     | 布哈林     | 10.00  |
| 不斷革命論 ABC                     | 意因      | 10.00  |
| 資本主義社會的國家                     | 密里本德    | 25.00  |
| <b>中國革命問題</b>                 |         |        |
| 毛澤東思想與中蘇關係                    | 雙山      | 30.00  |
| 斯大林與中國革命                      | 托洛茨基    | 10.00  |
| 中國革命底總結與前瞻                    | 托洛茨基    | 10.00  |
| 托洛茨基給伊羅生的九封信                  | 托洛茨基    | 15.00  |
| 托洛茨基檔案中致中國同志的信                | 托洛茨基    | 10.00  |
| 彭述之選集第一至第三卷                   | 彭述之（平）  | 120.00 |
| 中國第二次革命的前因後果<br>——評張國燾的《我的回憶》 | 彭述之     | 10.00  |
| <b>托洛茨基著作及介紹</b>              |         |        |
| 托洛茨基自傳                        | 托洛茨基    | 60.00  |
| 流亡日記                          | 托洛茨基    | 20.00  |
| 蘇聯的歷史大冤獄                      | 托洛茨基    | 10.00  |
| 他們的道德與我們的道德                   | 托洛茨基    | 10.00  |
| 論學生與知識份子                      | 托洛茨基    | 10.00  |
| 熱月反動                          | 托洛茨基    | 10.00  |
| 論蘇聯國家性質                       | 托洛茨基    | 40.00  |
| 過渡綱領                          | 托洛茨基    | 20.00  |
| 十月教訓                          | 托洛茨基    | 15.00  |
| 先知三部曲——托洛茨基傳                  | 多伊徹     | 150.00 |
| <b>社會主義研究叢書</b>               |         |        |
| 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                    | 曼德爾     | 40.00  |
| 馬克思主義與第四國際                    | 曼德爾     | 30.00  |
| 托洛茨基文集                        |         | 40.00  |
| 托洛茨基及其思想研究（I）                 | 劉家良等    | 30.00  |
| 托洛茨基及其思想研究（II）                | 曼德爾等    | 30.00  |
| 第四國際文獻（I）                     |         | 40.00  |
| 第四國際文獻（II）                    |         | 40.00  |
| 第四國際文獻（III）                   |         | 40.00  |



# 英國：面對左派的挑戰

亞·索納特

重大的政治或職工運動會給一整代工人階級造成鬥爭形勢。事實正是這樣。在歐洲，1968年法國群眾大罷工，反對越南戰爭的群眾運動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在英國，這與工會的政治化提高了工人階級的戰鬥性同時發生。這些事件使一代活動分子激進化而提高了左派的形像。在整個80年代中期形成的政治輿論都有利於左派。

當然，事情的演變也會向相反的方向發展。英國煤礦工人的失敗，和80年代茅舍小農意識的抬頭使一整代人非政治化了，並使統治階級的思想意識佔了上風，結果是新自由主義盛行，工人階級則退入防守的時期。

這個防守時期由於1995年法國的群眾大罷工和1999年西雅圖反全球化運動而受到挑戰。這些決定性的重要的新群眾運動使左派、環保主義者、直接行動主義者和其他反對推進資本主義全球化、反對推行新自由主義的人，在「看世界，見行動」的口號下團結起來，開展了新的政治運動。

9/11事件使美國共和黨人獲得了他們一直想得到的恰當機會去回擊這一新的政治運動。這結果就是美國的所謂「反恐戰爭」，「一個新的美國世紀計劃」，侵佔阿富汗，再就是侵略伊拉克，使她再次殖民地化。

不管怎樣，這些屬於19世紀的殖民主義暴行卻造成了一個史無前例的國際性反戰運動的緊張局面。這樣的局面是從反對資本主義運動本身必然形成的。而反對資本主義運動正是在去年底圍繞著阿雷格里市世界社會論壇和地區性的如佛羅倫薩論壇組織起來的。

英國、西班牙和意大利三國的政府都極力支持美國發動戰爭。而三個國家都發生了歐洲最大規模和最為壯觀的反戰運動。在英國，反戰運動得到大多數人民的支持，出現了英國歷史上三次最大規模的政治示威：2002年9月28日40萬人，2003年2月15日有150萬人，2003年3月22日有50萬人參加示威遊行。

現在，戰爭已進入尾聲。但我們看到了這些反戰示威遊行的潛在能量正在改變著政治局勢。在下一階段還會決定工人運動的未來。這是一個好機會，一定要把握住。

雖然反戰運動未能阻止戰爭的進行，但它提高了反戰的政治籌碼。戰爭販子必須為此付出代價。而且隨著戰爭的進行還會影響到政治形勢。

在英國，由於美國赤裸裸的帝國主義行徑已經暴露無遺，新一代學校學生以國際主義的政治水平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不斷高漲的熱情湧上街頭進行抗議示威。左派領導這一戰鬥，而得到加強。左派工會領導人全都反對戰爭。他們構成了制止戰爭運動最重要的部分。

由於許多下議員的反叛，貝理雅和新工黨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機，這是過去從未有過的。特別是由於有少數老資格的工黨元老也反對貝理雅。貝理雅之登上權力寶座，部份是由於保守黨持續不斷的危機。而現在，保守黨也很少為貝理雅歡呼了。

新工黨同它的傳統基層之間一直存在著距離。大多數工黨成員都反對該黨簽署進行戰爭。

與此同時，作為工人階級政治代表的新工黨，自執政以來，它與工會之間的矛盾發展了。工會在政治基金問題上，即工會為工黨提供資金的問題上，爭論很尖銳。這個問題使新工黨與工會之間未來的關係成了問題。越來越多的工會會員討厭這個黨每次都向他們籌措資金來支持美國進行野蠻戰爭；而在歐洲，則同西班牙首相阿茲納、意大利總理貝魯斯科尼站在同一條線上。

現在，許多工會在今年的會議期間都要討論這個問題。新聞工會BECTU決定要它的成員投否決票。鐵路工會RMT建議修改它的章程，允許支持不是工黨的國會候選人。巨大的壓力還來自消防隊員工會FBU的普通會員，他們也採取了同樣的措施。

新政治局勢的激進化，還從5月1日蘇格蘭議會、威爾士議會和英格蘭、蘇格蘭、威爾士的一些地方權力機構的選舉結果反映出來。

最引人注目的是，蘇格蘭社會主義黨（SSP）取得的競選成就。在蘇格蘭議會，SSP的代表由1個增加到6個。而且6個之中有4個是女。這更增加了這一成就的意義。這是蘇格蘭社會主義黨經過長期的努力，使自己在反戰的鬥爭中成為蘇格蘭的核心力量才取得的結果。這一驚人的進步，為蘇格蘭社會主義黨成為蘇格蘭政治舞台上主要力量創造了機會。當然，蘇格蘭社會主義黨的成就對英格蘭和威爾士的左派會產生重大的影響，甚至對歐洲，也是一個榜樣。

在英格蘭，社會主義聯盟（Socialist Alliance）在西北地區的普雷斯頓得到38%的選票，第一次獲得地方議會

的席位。英格蘭的社會主義聯盟是在制止戰爭的戰鬥中取到支持進入選舉的，特別是得到多數穆斯林反戰活動分子的支持。雖然社會主義聯盟在地方選舉中的得票平均率還很低，但這已足以證明政治的激進化已經發生了。

蘇格蘭議會和威爾士議會的選舉制度是按各政黨候選人得票比例分配議席的制度，而全英國的地方選舉則實行得票多為勝（但不一定超過半數）的制度。這種選舉制度不利於小黨。例如，蘇格蘭社會主義黨就僅僅獲得一個地方政權機構的席位。

並非所有反戰的投票人都投社會主義者的票。自由民主黨人以反戰的姿態也獲得許多新席位。

結論是清楚的。反戰運動為今天結成一個最廣泛的左派統一團體創造了條件。制止戰爭聯盟不可能做到這一點。它祇是個單個戰役的聯盟。它會繼續反對佔領伊拉克，反對所謂「反恐戰爭」。結成最廣泛的左派統一集團是一個新的開端。英格蘭社會主義聯盟能擔當此任是最好不過了。因為它是至今為止最成功的左派聯盟。而組成一最廣泛的左派統一政治集團對英格蘭社會主義聯盟來說是一個尖銳的挑戰。英格蘭社會主義聯盟為此在5月1日召開了會議。

會議並不多討論如何使英格蘭社會主義聯盟轉變成一個政黨，如同蘇格蘭社會主義黨那樣。現在的問題是：社會主義聯盟是否把握住已經出現的機會，在新的政治形勢下使各左派組合成新的更廣泛、更強大的政治集團？政黨問題一直是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但，目前的任務是創立一個比現時的社會主義聯盟更廣泛的新的政治組合。

根據這一認識，會議通過決議，號召在有必要組成一個廣泛和最有戰鬥力的統一的左派政治集團的問題上，展開儘可能廣泛的討論。

社會主義聯盟的決議向反戰運動中所有積極分子，包括在鬥爭中轉向左派的穆斯林積極分子呼籲，向厭惡貝里雅主義和戰爭而離開了工黨的人們呼籲；向那些在過去幾年裡盡力提高工會鬥爭水平的各工會左派呼吁；向近年來許多工會選舉產生的激進領導人呼吁；他們對此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是有能力擔當這個責任的。

決議也向一般地未參加過社會主義聯盟的左派組織，特別是向英國共產黨（CPB），出版《啟明星日報》的前斯大林主義分子呼籲。對他們來說，參加這樣一個新的政治組合，會牽涉到戰略的轉變，因為他們現時並不支持在普選中向工黨挑戰。但，他們中對此的意見並不一致，隨時都會鬧分裂的。邀請英國共產黨參加

就是對工會內的左派敞開大門。在工會，他們一直是有影響的。對於邀請社會主義黨也一樣。它在2001年沿著教派的道路離開了社會主義聯盟，但仍可以吸收他們參加新的政治組合。

這就意味著左派在參加這些選舉的問題上開始了進行磋商的時期。雖然不能保證成功，但機會是明顯存在的。

當然，這不祇是因為戰爭。戰爭暴露了新工黨的本質，使它脫離了傳統的支持者。新工黨政府是這樣一個政府：它準備對消防員罷工提出訴訟。它挪用大專學校的經費，使我們的學校私有化。它出讓公共醫療衛生服務的專項收益。這個政府助長種族主義，不斷地駭人聽聞地打擊移民和政治避難者，它的社會和工業政策等等，都在加強極右勢力。

參加反戰運動的青年在轉向政治鬥爭，特別是轉向反對帝國主義的政治鬥爭。他們竟然參加了工黨，而這個黨卻在進行這個戰爭。一個新的政治組織提出不同於新工黨的原則性政策，支持反戰運動，又能練熟地掌握鬥爭，是能夠贏得許多新一代人站到它的旗幟之下來的。

但，不能認為局勢祇對左派有利。這裡也存在危險的一面。極右派英國國民黨（BNP）在地方選舉中，特別是在北方地區的工業城市，增加了他們的代表。去年在蘭開夏的帕因利，他們得到三個議席，今年則得到5個議席。

可見，議會選舉的大門也向英國國民黨敞開。這不只是由於蘭開夏工業衰退這個因素，在帕因利同樣是這一因素，而且也由於新工黨政府的種族歧視政策。

無論如何，極右派的勝利只不過是迫使左派對現時的機會和結成一個更強有力的政治集團作出答覆。左派必須懂得，我們既要進行街頭的鬥爭，也要進行投票箱的鬥爭——這裡一直提供社會主義的選擇，經過鬥爭，社會主義者能夠達到他們的目的，保衛政治避難者和推進工人階級的遠景。

（蔣靜譯自《國際觀點》2003年5月號）



# 厄瓜多爾局勢向古鐵雷斯新政權挑戰

F.L.羅梅羅

[譯者按：自從巴西工人黨的盧拉當選為總統以來，拉丁美洲的新局勢已引起了世界各地區人士的極大注意。現在厄瓜多爾革命左派古鐵雷斯又在總統選舉中取得了勝利，這就非同尋常了。巴西、厄瓜多爾、智利、阿根廷、烏拉圭、巴拉圭，正決定要建立南美經濟聯合體，這給美帝國主義在南美的利益以巨大打擊。因為，美國千方百計製造厄瓜多爾混亂局勢，向古鐵雷斯政權挑戰。古鐵雷斯是如何應對這一挑戰呢？以下這篇譯文說明的正是這個關鍵問題。]

譯文談論的看似是小小的問題，許多讀者可能並不留意。但巴西的盧拉加上厄瓜多爾的古鐵雷斯新政權，使得美帝國主義頭痛不已，因為這會沉重地打擊美帝在拉丁美洲的富人利益。也因為如此，《十月評論》過去曾刊登許多篇譯文，向讀者介紹拉丁美洲各國發生的事件和問題，希望能引起讀者的關注。]

## 古鐵雷斯的勝利與民間進步組織的作用

古鐵雷斯的勝利，已把民間運動的要求推到了前沿，我們必須按照過去 20 年來厄瓜多爾（下稱厄國）歷史的來龍去脈加以分析。上世紀 80 年代以來，繁榮的石油業與景氣的工業化宣告結束，因為從 70 年代以來，軍政府用進口貨來替代而強迫促成的。因此，厄國全面受到外債的敲詐勒索，不平等的對外交流深化了，並從 80 年代後期以來，由於美國提出一體化的綱領性指示，結構性調整的激進政策也深化了。其後果是毀滅性的打擊：厄國經濟在安第斯山區域被削弱了，在該國的所有地區，生態環境不斷地惡化；失業率增加，民工從鄉村流向城市，土地所有權集中在少數人手裡，服務行業如糧、油和電訊等部門出現了跨國公司。國家作為服務業的提供者和社會權利的保證者作用，縮減到最低點，受影響最嚴重的是教育和衛生部門。

90 年代那幾年，這種危機深化了。從 1995 年以來，厄國經濟並沒有從深化了的蕭條期中擺脫出來，蕭條是由於提高了貨幣價值和利率（有時高達 100%）的政策而引起的。這就為外國製造的產品打開了厄國的市場，從而摧毀了成千上萬的手工業和小型企業。有利於財政資本的超新自由化政策，為 90 年代後期金融業嚴重危機創造了條件，這就引起 2000 年 1 月 21 日的軍事和民間起義，推翻了賈爾·馬霍德（Jamil Mahuad）新自由化政府。金融業的詐騙行為摧毀

了成千上萬的中、小銀行存戶，引起 150 多萬人民大逃亡，特別是逃到西班牙去。這就進一步加深了大多數人民的不滿，甚至失望和憤慨異常。

多民族團結新國家黨的帕查庫蒂克（Pachakutik）運動以及 1 月 21 日愛國社，都得到民主人民運動的支持，它們過去是，現在仍然是沿著民間運動最主要的力量發展，其中包括有厄瓜多爾土著民族聯盟、厄瓜多爾自由工會組織聯盟等等。它們還支持一位候選人去阻止民間所拒絕的政治體制和新自由化政策。這就表明，在第一輪中，作為選舉實力的統一戰線已經建立起來了，並贏得工人、農民、土著各民族、小商人、前部隊人員、手工業者、失業人員、教師、大學生、公私部門的雇工以及城鄉小業主等等的支持。

選舉綱領有一個主要目標，那就是支持生產而不是支持腐朽的銀行，支持忠實的而不是不誠信的工業家，而且反對腐化和政黨體制，而不必公然去處理美國自由貿易區和外債等問題。這次投票選舉還反映出阿根廷危機和巴西、秘魯、玻利維亞的人民運動，以及關係到哥倫比亞計劃。

選舉結果顯示出民主鬥爭的連續性，過去曾有過公民表決私有化和政治改革（1995 年 11 日），帕查庫蒂克運動的發展（1996 年）以及推翻馬霍德政府（2000 年）等等。

投票選舉古鐵雷斯也反映了一批民間和土著領袖們的願望，他們不支持無限權力的軍事首腦的統治，而希望看到在轉折關頭政權的轉變。厄國社會裡仍然存在的軍人影響和權威，現在已由古鐵雷斯使其資本化了。民族主義是廣大人民群眾自覺性的重要組成部份，他們渴求強有力的領導。這是一次憤怒的選舉，一次反生活條件的選舉，也是抗議政治體制的選舉。這也反映出城鄉廣大青年的激進化，他們是第一次進入該國的政治生活的。在最重要城市的富有意義的投票選舉中，古鐵雷斯在周邊地區，特別是在西埃拉（Siesera）的幾個中央省份中取得了絕大多數人的支持，而亞馬遜河流域的土著農民是十分強大的，他們也同樣支持古鐵雷斯。這次勝利來自多次重要選舉勝利的框架之內，以及拉美國家的先進性，特別是玻利維亞的 MAS 運動和巴西的工人黨。

## 矛盾和衝突的說明

新政府將面臨複雜的困難的經濟、政治和社會條件，可以說有一整套內部相互關聯的問題。



財政部門和大型的進出口商人支持新自由化自由貿易項目。儘管古鐵雷斯發表的演說是克制的，但仍有右、中翼的經濟組織和政治團體（他們分佈在國會、地方政府、大企業，媒體和工會內）準備發動一次戰鬥來消磨他和孤立他。

此刻，外債的負擔是難以忍受的，要付清外債就必須花掉國家收入一半以上，這便妨阻了處理社會必需品的日益增長。美元在向民間各部門索取比以往任何時候更高的代價。一個國家的經濟為了國內產品生產和服務行業的開展，就必須不斷地購得多，售得少，這就缺乏國內外生產投資，象徵著通貨膨脹和財政困難的加深。美元化意味著貨幣主權的喪失，也意味著廣大的盈餘要用在消費品的進口部門。美元化作為一種機制的預期效益（即阻止通貨膨脹和降低銀行利率，吸引國外投資），卻並沒有如期實現。利率接近 20%，通脹達到 30% 左右，唯有厄瓜多爾的高價石油和外出移民工人的匯款支撐著美元化。未來幾個月中，出口部門帶來的壓力，將會終止美元化，如果這種情況繼續保持下去，會使進口商人受益。然而，除開資產階級經濟集團的實際利益之外，美元化經濟，如果不去提高出口和國外投資，最終是不能保持的。

由於今年 12 月財政赤字達到 7 億美元以上，因而財政危機是十分嚴重的，這表明是支付危機，有些部門希望提高國內使用的天然氣和汽油的價格來解決問題，但這樣一種措施會對厄瓜多爾的民間部門帶來最嚴重的打擊。

當前最大的反應，就是十萬多教師要舉行罷工的威脅，因為他們從 11 月以來就沒有領到工薪了。

哥倫比亞計劃的實際應用以及美國在曼塔（*Mania*）軍事基地的存在，都將危及厄瓜多爾的主權獨立，並威脅著有可能不斷地捲入到哥倫比亞衝突中、帝國主義國際化的武裝集團的勢力中去。儘管在選舉的第一輪和第二輪中出現的綱領之間存在著矛盾，儘管在建設民族團結政府中的階級組成成份有所變化，但民間組織仍然保持著對未來政府的支持。帕查庫蒂克運動，可望在 10 年內加入政府，並共同承擔責任，以使考慮建立過渡政府，並運用手段來排斥企業和政界以奪取有利地位。帕查庫蒂克的戰略是要同沒有明確思想理念的實業界保持一個聯合政府，但反對大型的壟斷集團，特別是沿海地區的大壟斷集團，並促進有利於農業、社會基層土著民族的各項政策，加強在他們自己控制下的地方政府，奪取國家內部的反抗空間。在為爭取到多個政府位置的戰略範圍內，他們大力支持古鐵雷斯與他的黨。帕查庫蒂克正是作為一種政治項目為自己的未來下賭注。

厄瓜多爾土著民族運動、工會、民間組織以及農民，正與選舉之前、之後靠近古鐵雷斯的經濟集團分享政權。我們可以指出：經濟學家莫裡西奧·波佐（*Mauricio Pozo*）作

為經濟顧問而出現，便是一個例子，他十分接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皮欽查（*Pichincha*）銀行和 *PROINCO* 集團，這個集團特別在西埃拉有其特殊利益，資本接近 30 億美元左右。更貼近古鐵雷斯的還有博里厄里亞諾（*Bolivariano*）銀行的銀行家馬里奧·卡內薩（*Mario Canessa*），他同香蕉出口部門有關，擁有資本 5 億美元。卡內薩可能成為經濟部長，並同奎洛拉（*Quirola*）家族有關，該家族擁有以出口蝦和香蕉為主的馬查拉（*Machala*）銀行，而且同王家族（*Wong Family*）也有關，該家族經營香蕉出口貿易，擁有資金 2 億 5 千萬美元。另一經濟顧問是 G. 拉索（*Guillermo Lasso*），他是馬霍德政府中的重要人物。此外，涉及到的還有厄瓜多爾最強大的經濟集團諾波亞（*Noboa*）公司，擁有資金近 20 億美元，這是由 A. 諾波亞所領導的，但他在上次選舉中失去了候選人資格。F. 科德羅（*F. Cordero*）集團，是由極右翼前總統 L. F. 科德羅家族所有，但保持著一定距離，這個集團擁有六億美元資金，對厄瓜多爾最大政黨基督教社會黨具有最大影響。

### 對民間運動的挑戰

未來幾週和幾個月，將是緊張期待和社會總動員的關鍵時刻。民間運動的主體已決定給予新政權以初步的支持和時間。

資產階級已經分裂了。有的準備共同組織政府，有的則希望通過接近古鐵雷斯來緩和局勢。古鐵雷斯呼籲要同所有有關國家對話。最大的始初的反對派將集中在國際代表大會裡。

在民間各階級中，我們的目標是要把廣大群眾的自發的覺悟性與有組織的各部門聯合起來。這裡的挑戰就是如何使爭取組成政府以及對政治、經濟危機的形勢加以深化、發展並使之具有連續性。人民已經形成了必要的自覺性和要求改變政治體制的可能性。這就是結束舊制度和排斥新自由主義。也就是反資本主義的。最基本的問題是：要把當前自覺性水平與推動其前進的要求結合起來，也就是把當前的迫切要求與基本上反對剝削、統治和壓迫的要求結合起來。

這一方案的中心因素就是：要容許把民主從民間各部門擴展開去，要正視 *FTAA* 和哥倫比亞計劃，要面對財政資本和新自由化政策的獨裁專制制度，要把終止結構性調整、不清償外債、關閉美國在曼塔的軍事基地作為主要要求，並且要為爭取水、陸、自然資源作鬥爭。所有這一切必將對民間部門的自我組織、自我表現和獨立願望起到制約作用，因此這就需要帶風險、下賭注。

（蕭明譯自《國際觀點》03 年 2 月號）

# 陳獨秀脫離托派、脫離第四國際了嗎？（來論）

劉秀

1938年8月，第四國際書記處接到中國支部的報告，說陳獨秀已離開托派，離開第四國際。於是1938年9月，在第四國際成立大會上，主席在報告中列舉了各國離開第四國際的名單中，就有陳獨秀的名字。

1937年8月，陳獨秀出獄後，由於陳獨秀在獄中與彭述之意見不合，就不去上海參加托派領導機關工作，不願意與彭述之共事。在武漢時期，陳獨秀對外界廣泛聲明過：「只是我個人的意見，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隸屬任何黨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張自負責任。」<sup><1></sup>「我已不隸屬任何黨派」，就是說，陳獨秀已脫離了托派。

陳獨秀果真脫離托派了嗎？又不見得。

1932年，陳獨秀、彭述之、羅漢的托派中央，曾去信中共中央，提出托派與中共合作抗日，中共沒有反應。1938年8月，羅漢在南京，對中共駐南京辦事處的葉劍英、博古提出，要中共幫助在國民黨釋放政治犯中，同時釋放托派的人。陳獨秀出獄後，在南京見到葉劍英，在武漢見到董必武，提出托派與中共合作抗日。董必武、葉劍英答應轉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以毛澤東、張聞天署名的電報答覆，陳獨秀回歸共產黨要接受三條件：一、擁護民族抗日統一陣線並有具體行動；二、要陳獨秀公開批評托派；三、公開發表聲明脫離托派。陳獨秀聞此大怒，罵道：「你們企圖捏造漢奸的罪名來壓迫我做這樣畫蛇添足的事，好跟著你們做啦啦隊，真是想入非非。你們向來不擇手段，不顧一切事實是非，只要跟著你們牽著鼻子走的便是戰士，反對你們的便是漢奸，做人的道德應該這樣嗎？」<sup><2></sup>可見，陳獨秀不肯批評托派，不願意公開聲明脫離托派。

1939年10月托派中央臨委陳其昌，從上海起程，經過香港轉入四川江津與陳獨秀會見，陳獨秀對陳其昌表示，托派應該改變策略，應該參加到群眾的實際鬥爭。陳獨秀於1938年11月3日以托派人員的身份寫信給托洛茨基，批評托派中央的關門主義、極左主義，反映了托派的情況。此信交給陳其昌回到上海時交由李福仁寄去托洛茨基。在上海的中央臨委看到陳獨秀給托洛茨基的信，立即寫信給托洛茨基，批評陳獨秀在武漢的言論，背離托派的主張。

托洛茨基看到了陳獨秀的信及看到了中央臨委的信。1939年3月11日，托洛茨基寫了給中國同志的信：「我讀了你們1月19日從上海寫來的信，以及收到從四川方面寄來的意見，心裡感到很大的興趣。我們終於獲得過去所缺乏的

那種消息了。我非常喜歡，我們的老朋友〔陳獨秀〕在政治上仍舊是我們的朋友，雖然含有若干可能的分歧，但現在我不能以必需的精確度來判斷這些可能的分歧。

「當然，我很困難形成一種確定的見解來判斷我們的同志們的政治意見，或判斷他們極左主義的程度，因之也不能判斷我們的老朋友方面對於他們的嚴斥是否正確。然而，他表示的意見，我以為在本質上是正確的，我希望在這基礎上能夠同他經常合作。」信末，托洛茨基希望陳獨秀去美國住一個時期。<sup><3></sup>

托洛茨基認為陳獨秀對中國托派中央的批評「在本質上是正確的」，希望在這個基礎上能夠「同他經常合作」，也就是完全否定了「陳獨秀已離開第四國際」。托洛茨基多次要陳獨秀去美國，擔任第四國際理事會理事。

中央臨委看到托洛茨基這樣看重陳獨秀，也不得不同意將陳獨秀留在第四國際之內。

經過1936年1937年蘇聯幾次莫斯科審判案，在斯大林指導之下所製造的假案，鎮壓了大批從事長期革命鬥爭的黨員幹部。1939年8月23日，蘇聯與德國簽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9月1日，德軍入侵波蘭，發動了世界第二次大戰。9月17日，蘇軍入侵波蘭東部，與德國共同瓜分波蘭。所有這些事件激發了陳獨秀對無產階級專政與民主主義思想的變化。

陳獨秀在30年代，認為馬克思和列寧沒有把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分裂開來，無產階級專政要實行廣泛的民主。只是「斯大林拋棄了民主主義，代之以官僚主義」<sup><4></sup>而1940年1941年陳獨秀對沒有民主的見解有重大改變，認為斯大林的罪惡是來源於無產階級獨裁（無產階級專政）。

「斯大林一切罪惡，乃是無產階級獨裁制之邏輯的發展。」，那就不是斯大林不要民主，而是無產階級專政就是沒有民主。「十月革命以來蘇聯制度就違反了民主制之基本內容」。「獨裁制產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才產生獨裁制」。<sup><5></sup>「所謂『無產階級獨裁』根本沒有這樣的東西，即黨的獨裁，結果只能是領袖的獨裁。」<sup><6></sup>這樣，陳獨秀的民主主義思想也就從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發展為否定無產階級專政。

於是，陳獨秀提出要重新估計布爾什維克的理論及其領袖（包括列寧、托洛茨基在內）之價值。<sup><8></sup>

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是在無產階級民主的基礎上實行的。沒有無產階級民主，就沒有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民主不僅僅是在民主的內容與資產階級民主相

同，而且民主施行的範圍比資產階級民主更廣闊得多，民主的質量比資產階級的更高；也就是說，從資產階級形式民主發展到更高度的社會主義實質的民主。

如果從陳獨秀特別強調的無產階級專政必須有無產階級民主；沒有無產階級民主，無產階級獨裁（無產階級專政）就必然成為黨的獨裁，領袖的獨裁，必然成為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權；斯大林獨裁是在缺乏無產階級民主之下產生出來的，這樣的見解是無可非議的。

但是，陳獨秀認為斯大林的獨裁罪惡是憑藉十月革命以來蘇聯違反民主制的基本內容（這些違反民主制度，都非創自斯大林），憑藉著十月革命以來的政治警察大權，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不容許思想、出版、罷工、選舉之自由。這一大串反民主的獨裁而產生的，並非是斯大林個人心術特別壞，「斯大林的一切罪惡乃是無產階級獨裁之邏輯發展」。陳獨秀這樣理解斯大林罪惡的根源，雖然在有些地方有些道理，但並不完全符合事實。

不應該說「斯大林一切罪惡乃是無產階級獨裁的邏輯發展」，而應該說斯大林獨裁是利用一些不夠民主的制度發展而成的。

十月革命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同時實行了無產階級民主。人民享有思想、言論、出版、信仰、罷工、選舉的自由。資產階級的政黨——立憲民主黨以及資產階級的報紙，都沒有禁止。只是到了資產階級勾結外國資產階級反對蘇維埃政權，才宣告資產階級不能享受民主與自由的權利，剝奪了資產階級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此外，還有左派社會革命黨、右派社會革命黨、孟什維克黨（社會民主黨）和無政府主義者參加了蘇維埃。左派社會革命黨還參加了政府工作，他們還出版了報紙。而布爾什維克黨內一直容許派系存在。1919年2月，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討論簽訂布列斯特和約的問題，以布哈林為首的左派共產主義者就反對列寧提出的簽訂和約的議案。那時黨內任何人都可以發表不同意見。在1919年3月召開全俄蘇維埃第四次緊急代表大會上，左派社會革命黨、右派社會革命黨、孟什維克、無政府主義者等代表發言，反對布爾什維克提出的簽訂布列斯特和約的議案。由此可見，並不是「蘇聯十月革命以來」就沒有民主，並非是「黨外無黨，黨內無派」。

1919年4、5月間，左派社會革命黨、右派社會革命黨、孟什維克和無政府主義者，反對蘇聯政府簽訂對德的布列斯特和約而舉行武裝暴動，要推翻蘇維埃政府，而受到政府軍隊的鎮壓，從而取締了各個黨派，於是也只剩一個布爾什維克黨的局面。以後也再沒有新的黨派出現。從此，就成為單獨一個布爾什維克黨（俄共（布）黨）執政了。「黨外無黨」是蘇聯特殊事件造成的，並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不容許反對黨存在，也不是布爾什維克的理論不容許反對黨存在。

蘇聯十月革命後，立即要對付國外戰爭及其後的國內戰爭；由於戰爭環境不得已，民主受到限制。最初，蘇維埃政府各級政府機關是通過自由選舉產生的，其後因戰爭環境自由選舉不易舉行，各級政府官員遂改用委派制。委派制遂盛行起來，從黨組織到企業、工廠、工會及群眾團體都採用委派制，只有少部份是選舉產生的。一直到國內戰爭結束，仍然採用委派制，這就等於取消了自由選舉。無疑的，取消自由選舉，就是取消民主的一項重要內容。委派制容易為人所利用來結黨營私、搞集團、建立官僚集團。列寧是主張實行集中制、委派制及一長制的人。1918年以後，普遍推行集中制、委派制和一長制。這些違反民主集中制、民主選舉、集體民主管理制度，使官僚現象加劇。

在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之前，俄共（布）黨內一直存在有無組織形式的各種派系，黨是容許黨內派系存在的。他們對黨的政策提出各種意見。比如，工人民主派和民主集中派，就提出反對集中制、反對一長制和委派制；提出恢復民主集中制，恢復民主選舉，批評自由。在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上，列寧提出根絕派別活動的提案（托洛茨基投了列寧提案的一票）。大會通過了列寧的「十人綱領」派「禁止黨內派別活動」的提案，開始黨內無派。禁止黨內無組織形式的派別，就必然窒息了黨內發表不同意見，扼殺了自由批評。

這些違反民主的制度，的確不是斯大林所創始的。斯大林正是借助於各種非民主的制度來培植官僚集團走上專制獨裁的寶座。不過，陳獨秀所說的「並非斯大林個人心術特別壞，斯大林一切罪惡，乃是無產階級獨裁之邏輯發展」，那就不對了。斯大林一切罪惡並不能排除斯大林個人的作用，其實，斯大林個人的作用是重要因素。斯大林有強烈的權力慾、排斥異己、奸詐、陰險、暴戾。列寧死後，斯大林借助黨總書記的職權，駕御書記處，操縱了黨的人事安排，培植了自己的親信，控制了黨。在幾次與反對派的爭論中打敗了反對派，把反對派排除出黨。隨後，就運用行政權力，把反對派放逐、判刑、處決。由於一黨專政，斯大林控制了黨，也就控制了蘇維埃，控制了工會，控制了所有權力機關（司法、內務部）。政治秘密警察（契卡）是在內戰時期對付國內外敵人的，斯大林掌權後，契卡——格別烏成為斯大林的工具，排斥異己，製造假案、濫殺無辜。

十月革命後，蘇維埃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規，一切案件要經過法院或軍事法庭審理，被告人可以申辯，不服判決可以上訴。斯大林卻破壞憲法、法律及法規。基洛夫遇害身亡，斯大林立即命令司法部門對刑法作重大修改，對「恐怖組織和恐怖案件」，不能上訴，不得赦免，死刑立即執行。（於是斯大林就捏造反對派進行恐怖活動，以便處決反對派）。內務部掌握大權，不受各級蘇維埃的領



導和監督。地方的肅反是由黨書記、檢察官和內務局長三人組成的「特別小組」，甚至不經過審訊，就宣判執行。這些違反憲法、違反蘇維埃原定的法律、法規的「斯大林制度」，是斯大林一手製造出來的，並非是十月革命以來就有的。斯大林掌權後，就徹底的破壞一切民主制度。

沒有民主制度，就會發展為個人獨裁專制；但是，並不是每個獨裁專制者都像斯大林那樣濫殺無辜，受迫害的人和受牽連的人達三千萬。所以，斯大林的罪惡絕不能排除斯大林個人的權力欲、排斥異己、欺詐、暴戾所起的作用。

陳獨秀於1941年1月19日，寫《給S和H的信》有說：「近作《根本意見》，亦未涉及何種主義，第七條主張重新估計布爾什維克的理論及其領袖（列寧和托洛茨基都包括在內）之價值，乃根據蘇俄廿年餘的教訓，非擬以馬克思主義為尺度也。倘蘇俄立國的道路不差（成敗不必計）即不合馬克思主義，又誰得而非之。……見得第三國際道理不對處，便反對它，對第四國際，第五國際，第……國際亦然。適之兄說弟是一個『終身反對派』，實是如此，然非弟故意如此，乃事實迫我不得不如此也。」<sup><9></sup>

1941年12月23日，陳獨秀《給鄭學稼的信》寫道：「我的根本意見」乃為托派（國內以至國外）先生們的荒謬見解而發。「列托之見解在本國不合，在俄國及西歐又何嘗正確。弟主張重新估計布爾什維克的理論及其人物（老托也在內）之價值……弟擬寫一冊《俄國革命的教訓》，將我輩以前的見解徹底推翻，惜精神不佳，一時尚不能動筆耳。」<sup><10></sup>

陳獨秀在上面兩封信所說的話是驚人的。他否定無產階級專政，否定他過去主張的一切。要知道，無產階級專政是馬克思提出的<sup><11></sup>，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核心問題。否定無產階級專政，也就是否定馬克思的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那麼，不僅要對布爾什維克理論重新估計，也要對馬克思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重新估計了；不僅要對列寧、托洛茨基重新估計其價值，對馬克思、恩格斯也要重新估計其價值了。

陳獨秀要做托派、第四國際的反對派，這就不單是脫離托派、脫離第四國際，而是反托派、反第四國際、反馬克思主義了。

陳獨秀要寫的《俄國革命的教訓》，始終沒有寫出來，是因為生病而不能動筆嗎？並不見得；是因為精神欠佳而不能寫嗎？也不見得。1942年在他去世之前寫過三篇論文，總字數近萬字。他仍在做「文字學」的研究工作，編著《小學》。我們從他1942年5月所寫的最後一篇文章《被壓迫民族的前途》來與1940年1941年所寫的文章相比較，就發現有很大的不同。顯然，是因為思想改變了而不能寫《俄國革命的教訓》。

陳獨秀在《被壓迫民族之前途》，肯定蘇俄前期「……俄國十月革命的實際經驗，十月革命是全俄絕大多數人民集合在共產黨『解放勞動者』、『解放農民』、『解放小民族』三大旗幟之下成功的；革命勝利後，三樣都一一實現了，並非俄國共產黨的空頭支票。並且把帝俄時代被壓迫的不平等條約自行廢除了。……有班人所詆毀我們所擁護的前期蘇聯，和有班人所吹拍我們所痛惜的後期蘇聯，大大不同。前期蘇聯是站在世界革命的立場，後期的蘇聯則站在俄國民族利益的立場。」<sup><12></sup>

擁護蘇聯前期，——列寧時期，也就是擁護蘇俄立國之初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時期；否定蘇聯後期——斯大林獨裁專制時期。

從而，陳獨秀最後又肯定了無產階級專政。

陳獨秀一直到死，仍然是托派。

2002年6月11日

### 註釋：

<1>陳獨秀《給陳其昌等人的信》有說：「關於老彭（彭述之）和長子（尹寬），即使意見相同，我也誓不與之共事，況且根本意見相差很遠。」《後期的陳獨秀及其文章選編》，第80頁。

<2>同<1>

<3>陳獨秀《給〈新華日報〉的信》，《後期的陳獨秀及其文章選編》，第113頁。

<4>雙山譯《托洛茨基檔案中致中國同志的信（1929-1939）》，第75頁。

<5>陳獨秀於1936年3月初在獄中寫的《無產階級與民主主義》。

<6>陳獨秀《給西流的信》，《後期的陳獨秀及其文章選編》，第198頁。

<7>陳獨秀《我的根本意見》，《後期的陳獨秀及其文章選編》，第204-205頁。

<8>陳獨秀《我的根本意見》第七條，《後期的陳獨秀及其文章選編》，第204頁。

<9>《給S和H的信》S是孫洪伊，H是胡秋原，《後期的陳獨秀及其文章選編》，第209頁。

<10>鄭學稼《陳獨秀傳》中陳獨秀《給鄭學稼的信》影印件，台灣版。

<11>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1頁。

<12>《後期的陳獨秀及其文章選編》，第231頁。

## 說英雄（來論）

林蔚

20世紀20年代左右出生的一批革命者，只要不依附權勢，不隨波逐流，而敢於探索真理，追求真理，那命運總是不濟的。他們經歷過許多歷史事變，如抗日、二戰、蔣介石垮台等等。在這些事變中，他們確實沒有發揮過應該發揮的作用，雖然不能說一事無成，但他們所做的畢竟是微不足道的。正因此，不只別人常常譏諷他們沒有幹出個“名堂”來，即便他們自己，也無奈何地深自愧疚，覺得他們未能做得更多，不能干預歷史事變的進程，總是個“不可否認的大缺陷”。對於他們這些垂垂老矣的人來說，有這種感覺是很自然的，也有普遍性。岳飛的《滿江紅》有道是：“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把岳飛的“三十功名”換成近一個世紀的社會主義事業，“空悲切”的感嘆與他們這一輩老年人今日的感受就很相似了。

人類的歷史是人類自己創造的。但這裏有個根本的問題，即人類如何創造歷史和創造甚麼樣的歷史的問題。這個問題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得講客觀條件，講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情況，講現實的階級關係和階級鬥爭的力量對比。撇開這些客觀的起決定性的因素，不難就會容易陷入英雄創造歷史的泥潭。

人們著意把蔣介石刻劃成抗日英雄。但我們知道，蔣介石是不情願地被迫走上抗日之路的。他的勝利是“慘勝”。在人民看來，他並不是甚麼英雄，而是殺人如麻的魔王。人們也曾把斯大林刻劃成反法西斯的英雄。但在戰爭中他卻是十足的孬種。人民也沒有把他視為英雄，祇認為他是個大獨裁者。毛澤東趕走了蔣介石，這無疑是英雄壯舉，但他卻把人民趕入“史無前例”的苦難深淵。你能說他是英雄還是梟雄？這些歷史上的兩面人物，使一般的歷史學家大傷腦筋，不好評說。其實，這些既是所謂“英雄”，又是魔王，是獨裁者，是梟雄的歷史人物，都是在特定的客觀歷史條件下塑造出來的。不管他們的業績如何，終歸他們都不是人民的英雄。

列寧和托洛茨基是公認的十月革命英雄。他們是真正的人民英雄。因為他們就是人民的一員。他們的一生都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他們最能體現人民的意志和希望，並堅決維護人民的利益。在十月的風暴中，他們同人民一起戰鬥，並帶領人民去取得革命的勝利。但，應該指出，如果沒有人民奮起鬥爭，自然就不會有這兩位十月英雄。

列寧早死。在隨後的歲月中，當蘇維埃官僚們已經擁有愈來愈多的國家權力時，當人民的革命熱情已經消退，革命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已經喪失殆盡，革命便陷於岌岌可危的境地。在這種情況下，另一位十月英雄除了大聲疾呼之外，他還能幹些甚麼呢？正如歷史已經昭示的，等待他的命運就只能是流放和驅逐出國的命運。列寧夫人在1927年曾說，如果列寧還活著，可能已被送進監獄去了。這話說到點子上了。完全有理由相信，在官僚主義已經像潮水般淹沒了蘇俄大地，人民已經被解除了武裝、喪失了鬥志的情況下，列寧也難得有回天之術。他的命運也會同托氏差不多。

托洛茨基被驅逐出國後，更缺少力量扭轉形勢。但他並不因此停止鬥爭。他義無反顧，堅決站在被剝削被壓迫人民一邊，維護人民的利益，維護馬克思主義的原則立場。他承擔了全世界反動勢力強加在人民身上的全部沉重壓力。在他一生最後的歲月中，他所做的，比他在十月革命時期所做的，更具有驚天地的英雄氣概。正因此，全世界反動勢力都把他視為最可怕的人，雖然他祇是一個困苦的老人。他被殺害了。但他的英名，他的思想言論一直在激勵鬥爭的人民前進。這就是人民英雄的力量所在。而那些“勝利的”僭權者卻祇獲得千古的臭名。

由此看來，一個正直的人民英雄，就在於他與人民息息相通，乳水交融，時時、處處、事事都以人民的利益作為自己言行的出發點，並盡最大的努力去爭取和維護人民的利益，而不管他是不是成功了，或失敗了。

現在有些人把蘇維埃的瓦解歸罪於列、托這兩位人民英雄，認為他們違背了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做了“超前的”、現在還不能實現的事，以致招來今天的悲劇結局。這種責備實在不新奇，不過是第二國際修正主義者和一切機會主義者過去藉口客觀條件不成熟、不能實行社會主義革命、極力反對布爾什維克領導人民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陳詞濫調的再版罷了。這些陳詞濫調早被列寧在《無產階級專政與叛徒考茨基》和《國家與革命》等著作中批駁得體無完膚了。祇要認真讀一讀這些精彩而有說服力的著作，就會明白今日的所謂“超前論”的觀點是根本站不住腳的、不正確的。

在過去的歷史劇變中，革命者未能起到應該起到的作用，這是因為力量太弱了。形勢比人強，客觀形勢使他們不可能起到更大更多的作用。他們所處的客觀環境給予他們的

壓力，比任何時期的進步人士所受到的壓力，不知要大多少倍。像陳獨秀那樣有豐富鬥爭經驗和廣博學識多才多藝的人，在客觀環境的壓力下，也無法施展自己的才能，可見形勢對他們是何等險惡了。在險惡的環境下，他們祇能盡力所能及的事，豈能奢望幹出轟轟烈烈的偉業呢！

在一片黑沉沉的長夜裏，在衆人已經疲憊不堪、沉睡不醒的時候，祇有那個孤零零的守更人還在驚惕地監視著時光的流逝，到時候便敲起梆梆的更鼓，催促濃睡的人趕快醒來，去趕路，去耕作，去做工，去鬥爭。這樣的守更人，這樣的工作，確實平凡而又渺小，但卻蘊含著非常豐富的生活內容和偉大的生活意義，顯示了一個人做人應有的高尚品格。

我們對自己的過去，固然不應自吹自擂，自誇自大；但也不應自視卑賤，妄自菲薄。我們固然不是時代的英雄；但也不是時代的侏儒。我們沒有做過驚天動地的偉業。我們祇是平平凡凡的守更人，敲響更鼓，如此而已。回顧過去，堪以自慰的是，我們這些守更人，並沒有逃離過職守，算得是堅守崗位。雖然也偶有打錯更鼓的時候，但在任何艱難困苦的情況下，我們都能守護在沉睡著的人民身邊，與他們共渡艱難歲月。我們沒有做對不起沉睡未醒的人們的事，也沒有趁人們熟睡時乘機去大撈一把。我們一直在說真心話，沒有欺騙人民。僅此一點，便足以使我們撫心無愧，引以自豪了。

我記得有位王姓學者，稱鄭超麟為英雄，稱陳獨秀為英雄，還說所有堅持真理、不向權勢屈服的人都是英雄。這話確實說到了人生的真諦所在。駱星華兄寫了《在默默中生存，在默默中泯沒——一個托派醫師的後半生》一文〈註一〉，敘述他為病人默默地奉獻自己全部力量，不為名，不圖利，只知認認真真、勤勤懇懇為病人解除痛苦，因而贏得了普遍的同聲讚譽。應該說，我們這位平平凡凡的醫生朋友，就是一個極不平凡的英雄，是新時代新社會的楷模。一個人為真理而生，為真理而死；為人民而生，為人民而死，人生的價值就在於此。

創建社會主義社會是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歷史性事業，是人類自覺改變私有制社會為公有制社會的最偉大的歷史性工程。這是一項群眾性的事業，而絕不是幾個革命家，或某個革命黨的事業。新社會的創建必定要經歷極其複雜曲折、艱難困苦的鬥爭過程，既包括革命人民反對階級敵人的經濟鬥爭、政治鬥爭和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也包括反對人民隊伍中的由於私有制的侵害造成的或沾染上的各種醜惡東西的鬥爭，諸如反對自私自利、貪婪、懶惰、賭博、偷盜、吸毒、嫖娼、賣淫、道德敗壞、裝神弄鬼、愚昧落後等等的鬥爭。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祇有通過這種鬥爭過程，

增長文化科學知識，提高革命素質，和社會主義覺悟，培養創建新社會、管理新社會的能力和才幹，才能擔負起這個偉大的歷史任務。沒有革命群眾的文化科學知識的增長和革命素質的提高，沒有群眾性的社會主義覺悟，新社會的創立簡直是不可以設想的。不難設想，在科學技術獲得巨大發展、專業性的社會分工和複雜的社會管理愈來愈細緻的今天，如果沒有文化素養和科學技術知識，就不可能管好現代化的大生產和複雜的社會機構，使其確保正常運轉。也不難設想，一個二流子，或者一個浪蕩漢，又或者任何一個通身都是私有制臭味的人，怎可以成為新社會的公民？又怎麼能夠管理和建設好社會主義的新社會呢？

恩格斯晚年總結1848年革命以來的經驗就曾指出，由少數幾個革命領袖領導被動的群眾進行革命的時代過時了。今後的革命是：參加革命的每一個人都必須具有革命的自覺性和主動性，“要懂得為甚麼要革命”。今天，我們可以補充說，不僅要知道為甚麼要革命，還要知道如何進行革命和推進革命。在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幾年之後，這個群眾性的革命自覺性和主動性的問題便更加明白地擺在我們面前，要求每一個革命者給予高度的重視。

十月革命後之所以退潮，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我們常說的革命處在低潮中。所謂“革命低潮”，就是指群眾由於種種原因（西歐幾個國家革命的失敗、俄國的落後性、多年戰爭和內戰的消耗使人民感到疲倦等等），革命的熱情冷落了，革命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沒有了，沒有了革命的信心和決心，再沒有力量投入到革命中去。在這種情況下，反動的勢力就會抬起頭來，猖狂起來，革命取得的成就可能會丟失。十月革命後，特別是內戰結束後出現的情況就是這樣。進一步深究來說，群眾對革命消極和冷淡的衆多原因中之一，則在於對革命和革命形勢沒有正確的深刻的認識。因此，群眾對革命就不會熱心，當然談不上為革命去進行鬥爭了。

我們姑且不說十月革命時期一般群眾對革命的認識問題。就以十月革命前入黨的二萬五千個布爾什維克黨員來說，他們對革命和形勢的認識也是很不一樣的，有深刻，有膚淺；有正確，有謬誤。這二萬五千個黨員（當然包括斯大林及以後追隨他的人在內）在反對沙皇專制主義和奪取十月勝利的鬥爭中，無疑都是英雄好漢。但在革命勝後的新形勢下，他們當中便開始出現了分化：一些人堅持革命，繼續前進。一些人看到前進路上處處荆棘叢生，險象四伏，便畏縮不前，害怕了，甚至後退了。他們寧可保住已經取得的成果，而不願為未可測知的革命前景去冒風險。於是保守主義抬頭了。革命意識慢慢淡薄了，革命的勇氣和幹勁也就逐漸喪失了。作為革命先鋒隊的布爾什維克在新的形勢下竟然出



現了這樣的思想意識和感情上的變化，一般群眾的情況就更不用說了。開始時，這種思想意識和感情上的變化還只是不自覺的，以後便漸漸地發展成為有意識的維護自己既得利益의思想和行動，而把革命的根本利益拋到九霄雲外去了。於是乎，斯大林主義對十月革命的反動便出現了。

這是一個非常深刻的歷史教訓。它使我們懂得，不僅要提高革命先鋒隊，而且要提高廣大革命群眾對革命和形勢的認識，提高他們的革命自覺性和主動性是何等重要了。

社會主義革命時代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英雄時代。在這個時代裏的英雄，絕不僅僅是幾個革命領袖，也不祇是某個革命先鋒隊，而是廣大的擁有千千萬萬人的革命群眾集體。社會主義革命不能祇是少數領袖人物和先鋒隊具有革命的自覺性、積極性和主動性，而且要使浩浩蕩蕩的革命群眾集體也具有同樣的革命自覺性、積極性和主動性。這樣，社會主義社會的建立才会有最可靠的保證。建立一支浩浩蕩蕩的具有革命自覺性、積極性和主動性的群眾英雄集體，正是當今最迫切的任務。

1999. 10. 14

註釋：

<註一>該文刊於《十月評論》總第196期。

## 雜談兩則

惠之

(一)

自從毛澤東提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以來，人們已經習慣於把某一社會矛盾現象用如下的理論來劃分：是屬於「敵我矛盾」，還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我們知道，人們曾經把1957年的所謂「右派」劃為「敵我矛盾」，以後又把彭德懷問題劃為「敵我矛盾」，把劉少奇等一大批人的問題劃為「敵我矛盾」，結果如何呢？歷史真會開玩笑。所有這些所謂「敵我矛盾」，後來都給一筆勾銷了。可見這種理論毫無價值，它的用處只在於用來排擠和打擊異己的力量而已。

由於思想的惰性使然，現在有些人想把陳獨秀問題從原來劃為「敵我矛盾」改劃為「人民內部矛盾」。這可是個了不起的改變。但這樣的改變既不符合人們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某條「標準」，也與陳獨秀這個客觀實際不符，只能說是一廂情願。

也常有人把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間的矛盾和鬥爭視為「政見不同」。這當中也包含有「人民內部矛盾」之意。一般地說「政見不同」還可以，但如果把斯托之間的矛盾和鬥爭視為「人民內部矛盾」，那就大錯特錯了。在進入「過渡

時期」的社會裡，如果仍然存在著官僚國家，這個「過渡時期」社會的根本矛盾就是官僚國家的統治集團同工人階級及廣大勞動人民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是不可調和的。它決定著「過渡時期」社會的發展方向，要就向社會主義的方向前進，要就退回資本主義的老路上去。這一點，已為十月革命以來的全部歷史所證實。正是在這一不可調和的矛盾中，斯大林代表著官僚國家統治集團的利益，而托洛茨基則代表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社會主義利益。我們祇有從這一階級鬥爭的觀點來考察問題，才能解開十月革命以來全部蘇聯歷史和國際共運史之謎。

(二)

《聖言堂》的問題。陳獨秀認為沒有萬世師表的聖人，沒有萬世皆準的制度，沒有包醫百病的學說。這是對的。但不能說根據前人的已被社會實踐證明為真理的理論來進行論證是不對的。很明顯，比如唯物主義、辯證法、剩餘價值學說、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等等。這些都已被證明為真理的，前人研究和創立的科學理論，我們難道可以不要嗎？有理由相信，陳獨秀絕不會把這些科學的理論成果當作《聖言堂》之類的東西來反對的。在自然科學上也一樣，我們難道可以不要原子論，不要牛頓定律，不要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了嗎？可見問題的關鍵只在於前人的理論是不是真理罷了。

毛澤東過去提倡反對本本主義，後來竟發展到連馬列主義的本本也不要了。筆者就遇到過這樣的大專院校校長，自然是位共產黨人了，竟連一套馬恩列選集也沒有，當然更談不上學習和研究馬列主義的理論了。今日的書坊能擺上書架的馬恩列的著作真是少而又少，甚至可以說沒有。現在的時尚是實用主義。不論是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應用科學，都以「實用」為主。凡能夠促進「發展經濟」、「發財致富」的就被認為是好的。難怪今天有些人看到資本主義制度下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便認為資本主義制度是很好的制度了。人們希望回到資本主義制度去也就順理成章，當然不願再談甚麼社會主義。

有朋友說，毋需在歷史的陳年爛芝麻的問題上多花筆墨。我們應當正視現實。現實的問題更為迫切。為甚麼資本主義有如此強大的生命力？為甚麼落後國家的勞動階級（經過共產黨）能夠先於歐美的勞動階級取得政權？蘇聯集團為甚麼會瓦解？其歷史意義如何？中國現在處在甚麼歷史階段？所謂「改革開放」的意義是甚麼？社會主義革命的前途如何？……。這些無疑都是當前極需解決的問題。凡關心國家和社會命運的人都應當深入去探討。這比糾纏在那些陳年爛芝麻的問題上不是更有意義嗎？

1999年11月7日

# 評普列漢諾夫的政治遺囑

田友

歷史是個奇怪的東西，老是纏住活人不放。大人教育孩子總是過去如何如何？老祖宗如何如何，還一再叮囑：不要忘記過去，忘記過去是背叛。

今天，突然間爆出「新聞」：公佈普列漢諾夫的政治遺囑，洋洋三萬言。普列漢諾夫臨終前便囑咐他的政治遺囑要在布爾什維克不再掌權才能公佈。去年是蘇聯瓦解後的第十年，公佈他的政治遺囑可以說是符合他的心願了。但人們弄錯了，蘇聯的瓦解並不是布爾什維克不再掌權。布爾什維克早在20世紀20年代末便不再掌權了，掌權的是斯大林主義，而不是布爾什維主義。

為什麼要公佈普列漢諾夫的遺囑呢？在歷史家看來，這自然是一份難得的歷史資料，讓人們能夠根據它來研究普列漢諾夫的思想。對於政治家來說，這也是一份難得的資料，說明早在1917年2月至10月的俄國革命期間，就有個頂頂大名的普列漢諾夫反對十月革命，反對建立工兵農蘇維埃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政權。人們把斯大林官僚政權等同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人們以普列漢諾夫的政治遺囑為根據，說明今天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社會主義是有歷史根據的。「不要忘記過去」嘛！

在20世紀30年代以後出生的人，大多數都不會知道普列漢諾夫是何等人物。早就有不少歷史學家寫過普列漢諾夫的傳記，介紹他一生的經歷，他的思想變化，對他這個人已有了蓋棺定論，既肯定他有過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功績，也指出他背馬克思主義、背叛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罪過。他的政治遺囑，祇不過表明他至死都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吧了。

下面就來看看他是怎樣反對的吧。

## （一）關於唯物史觀

普列漢諾夫在《遺囑》中說：「貫串整個《共產黨宣言》的主要思想是物質生產的水平決定社會的階級結構、人的思維方式、他們的世界觀、意識形態、他們的智力活動等等。階級鬥爭的激烈程度取決於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矛盾的大小」，普氏這話，一開始便說錯了。不是「物質的生產水平」，而是與生產力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即財產關係）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出現了私有財產制度，才造成社會

分裂為階級和階級鬥爭。後一句話更是離譜。「階級鬥爭的激烈程度」不是「取決」於，而是反映了「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矛盾」的嚴重程度。這是起碼的常識了。

普列漢諾夫曾經是一個出色的馬克思主義者，在1894年寫過《論一元歷史觀的發展》一書，闡釋了馬克思發現的唯物史觀的觀點，對俄國幾代革命者以及各國後來的革命者起到積極的馬克思主義教育作用。可是，24年後的普列漢諾夫，在他臨終之前竟然這樣來歪曲《共產黨宣言》的唯物史觀觀點，這不能不使人感到氣憤。

馬克思說過，也證明過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度造成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分化和階級鬥爭；說過，也證明過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為社會主義社會的實現創造了物質條件，馬克思說過，也證明過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現存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發生矛盾。」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發展的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便到來了。但馬克思從沒有說過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劇烈程度取決於與生產關係之間矛盾的大小。」在馬克思的著作中找不到這樣的論斷。

社會是一個有機體，是「人們交互作用的產物」（馬克思語）。經濟結構是社會的基礎，不是社會的上層建築。兩者是處在互相間「交互作用」之中。政治固然受到經濟基礎的制約，反過來，經濟也受到政治的影響。認為只有經濟決定政治，顯然就是純粹經濟主義機械唯物論的觀點，而不是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

社會發展的經濟過程和政治過程並不是平行的。有時經濟過程走在政治的前頭，有時政治過程走在經濟的前頭。這說明社會發展的經濟過程和政治過程各有其特殊性，各具有不同的發展規律，政治過程絕不是直接取決於經濟，但也不能說完全與經濟發展過程無關。這祇要看看歷史上曾經有過的革命起義，特別是俄國1917年2月至10月的革命便可以明白的。

## （二）關於資本主義

普列漢諾夫對資本主義的發展有著非常錯誤的認識。他說，他「從馬克思逝世後，尤其是在本世紀初起對資本主義所作的觀察表明，資本主義是一個靈活的社會結構，它對社會鬥爭作出反應，不斷變化，朝接受和適應社會主

義個別思想的方向運動。」他懷著喜不自勝的心情，對資本主義的未來表示了「欣羨」之情，他說：「資本主義的未來令人欣羨。有野蠻的民族資本主義，野蠻的國際資本主義，有民主因素的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自由民主主義的資本主義，有發達的社會保障體系的人道民主主義的資本主義——這是資本主義演進可能出現的幾個階段。」普列漢諾夫的想像力確實豐富，他作了上引的關於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虛構的美麗畫卷之後，還做了更加美麗的「預言」，說：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後階段，「資本主義因素和社會主義因素，可能長期並存，互相競爭，互相補充。在此後，資本主義可能自己會慢慢地、毫無痛苦地死亡。但為此至少需要一百年，也許幾百年」。這些向隅虛構的東西，完全是一個臨死的人在彌留之際說不清楚、道不明白的胡言亂語，可以置之不理，但為了弄清問題，仍應花唇舌說上幾句。

資本主義的發展果真如普列漢諾夫所想像的麼？假如普列漢諾夫活到今天，就請他看看今天的資本主義吧，是不是和他所想像的那個樣子呢？無論他在資本主義這個名詞前面加上多麼好聽的形容詞，什麼「自由民主主義的」、「人道民主主義的」等等，資本主義始終是剝削和壓迫勞動人民的「野蠻」制度。不僅在它形成的初期是這樣，今天的資本主義仍然是這樣，甚至可以說今天的資本主義，比剛剛新生的資本主義更野蠻，更不民主，更不自由，更不人道。普列漢諾夫經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但他卻不知道這次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火拼造成的嚴重災難，死亡人數達1千萬，傷殘者2千萬，耗費4千億金盧布。第二次世界大戰因為有蘇聯被迫參戰而被人描繪為保衛民主反對法西斯，而實質仍然是資本主義國家為分割勢力範圍的戰爭。這次戰爭造成3千萬人的死亡，損失的財產無法估計。二戰後的半個世紀，由資本集團支持的大或小地區性的局部戰爭從沒有間斷過。這些戰爭給人民帶來的災難罄竹難書。今日的美國是資本主義的領頭羊了，美國的資產階級一直以他們的富有誇耀於世，還自稱是最民主，最自由，最人道的國家。但在9/11事件，兩座高矗入雲的世貿中心大樓遭到恐怖份子襲擊後，那個「不是」（布殊）的總統竟然不顧人民的反對，在自稱「民主」的國會支持下，借口捉拿恐怖份子拉丹為由，悍然動用海陸空三軍，對弱小的阿富汗發動了戰爭，僅僅70天的功夫，就在這個多災多難的土地上投下了12000餘枚炸彈，其中有最新製技術裝置的導航炸彈6700枚，使這個小小國家成了一片焦土，數百萬人無家可歸。9/11事件是恐怖事件，應當受到嚴厲的譴責，捉拿元兇，嚴懲不貸。但直至於今沒有確鑿的證據，便以殘酷的戰爭手段加之一個被懷疑的國家，這難道不是

發動戰爭的統治階級肆意妄為的恐怖主義行為嗎？而且，幾乎所有資本主義強國的所謂「民主的」議會或國會，也都借口9/11事件不約而同地通過所謂「反恐怖主義法」，大大地限制了本國人民的自由和民主權利，加強了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鎮壓力量。直至今日，「不是」總統還在叫喊要把所謂反對恐怖主義的戰爭繼續下去，而且擴大到其他的國家。總統先生不經意說出了他發動戰爭的真正目的是為了「恢復」早在9/11事件以前便已陷於危機的美國經濟。選擇阿富汗為打擊的目標，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為了從陸上打開一條通向世界最富有的中東石油資料的通道。其他資本主義強國的「不來了」（布萊爾，港譯貝理雅）首相、「是撈得」（施羅德）先生等等也都跟在美國之後，派出軍隊趕到阿富汗去，要在這個早被帝國主義長期以來弄得貧窮不堪的國家去分享一口湯。這就充分暴露了今日的資本主義已經走到了這樣的地步，時時刻刻都要用戰爭的暴力來達到它的掠奪目的，那管那個地方是不毛之地。

普列漢諾夫能否在死後也會看到了美國富裕的資本主義？普列漢諾夫是否知道，美國富裕的資本主義是建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1千萬人、第二次世界大戰3千萬人死亡的屍骨之上的。不要以為任何一個單獨的孤立的資本主義國家都能發展到美國資本主義的水平。美國資本主義的繁榮是以全世界絕大多數人的貧困為前提的。離開了對整個世界的掠奪，絕不會有單獨「一國資本主義」的繁榮。或許普列漢諾夫看到了美國工人階級的工資待遇生活水平以及享有的文化教育和社會福利大大地提高了吧，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但這並不是因為美國資本主義變得更人道了，而是工人階級鬥爭的結果。同樣是無可否認的事實，美國工人階級今天仍然是被剝削的階級，被統治的階級，仍然是資本的奴隸。他們隨時隨地都受到列寧所說的「資本主義的飢餓紀律」的束縛。普列漢諾夫知不知道因最近美國經濟危機而被解僱的工人有成千上萬。更何況全世界60億人口中，有13億人日收入不足1美元，有30億人日收入不足2美元，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極端困難的狀態中；而且，全世界每日都有成千上萬的人因飢饉而死亡！馬克思、恩格斯都曾揭露過資產階級種種卑鄙的收買工人階級，為的是「安撫」工人階級，使他們認不清資本主義制度奴役和剝削工人階級的本質。怎麼能夠因為某些工人階級的社會經濟地位有所改善而抹煞資本主義的本質呢？

在這裡，無需再提與普列漢諾夫關係密切的當今社會民主黨執政的資本主義的所謂「福利國家」吧。這已是自有目共睹的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那能有什麼「有保障的福利設施」呢。

今天的資本主義制度已經發展到威脅全人類生存的地



步。且不說資本主義制度造成的生態環境的破壞等等的危害，資本主義愈來愈依靠戰爭這個破壞社會生產力、極嚴重摧殘人民生命財產的恐怖工具來維持這一事實，便足以說明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已經發展到不能再忍受的地步。美國擁有的各種各式的核武器這一事實就把全人類推到了死亡的邊緣。試想一想，既然那個「不是」總統能夠不顧一切在阿富汗投下 12000 餘枚炸彈，誰又能保證他有朝一日不按下他所掌握的核按鈕呢？到那時候，就不是什麼民主、自由、人道的問題，而是全人類的毀滅！

### （三）關於無產階級專政

普列漢諾夫要「批評一下」馬克思，說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主張「無論現在還是未來，永遠不能實現」。普列漢諾夫提出的根據是：「生產力的巨大發展，知識份子的增長，將從根本上改變了社會環境」，「知識份子在生產過程中作用的提高，必然導致階級矛盾的緩和」。知識份子的「歷史、社會、哲學範疇是：道德、公正、人道、文化、法律」，具有「全人類的性質」，而且，「工人就其教育程度、文化程度、世界觀來說已經提高到知識份子的水平，在這種形勢下，專政將是荒謬的。」

普列漢諾夫的「階級矛盾緩和」論並不是什麼新鮮的東西。一切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家都極力否認階級矛盾是不可能調和的這一歷史事實。他們根本不懂得或者不願意懂得造成階級分裂和階級鬥爭的原因。社會之分裂為階級是因為有了生產資料的私有制，社會的生產資料和社會創造的財富為小部份人所佔有，而絕大多數人卻不能佔有，或只佔有很小部份。由於私有制的佔有方式的不同，便劃分為奴隸制度、封建制度、資本主義制度等社會形態發展的幾個歷史階段。在社會分裂為階級和階級鬥爭的情況下，絕對沒有什麼全人類「共同」的道德、公正、人道等等。只有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裡，全人類共有的道德、公正、人道等等才有其現實性。因此，在階級社會裡，以所謂全人類的道德、公正、人道來規範階級的行為，就是對被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欺騙。普列漢諾夫至死還鼓吹這種階級調和的論調，證明他是在欺騙被壓迫被剝削的無產階級。

馬克思窮畢生的努力證明了資本主義社會是階級分裂和對抗的最後一個社會形態。在資本主義社會裡，社會被分裂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它們之間的矛盾和鬥爭是不可能調和的。有時雖有緩和的時候，但最終只有趨於激化而導至最後的決戰。這是資本主義社會階級鬥爭的客觀規律決定的。馬克思經過長期的對資本主義社會階級鬥爭客

觀規律的觀察，才得出「階級鬥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的科學結論。

普列漢諾夫根本不懂得什麼是無產階級專政，卻起勁地反對無產階級專政，把無產階級專政同歷史上有過的反動階級的獨裁政權相提併論，是對馬克思提出的無產階級專政觀點最惡毒的歪曲。馬克思、恩格斯根據巴黎公社的經驗，深刻地指出「巴黎公社實質上就是工人階級的政府」，「巴黎公社就是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恩格斯一再要求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者認真學習和研究巴黎公社的經驗，認識巴黎公社的偉大歷史意義。巴黎公社所以不同於以往一切舊的國家政權，就在於組成政府的人員是由巴黎人民直接選舉產生的，並且可以隨時撤換，不享受任何政治的經濟的特權，其工資待遇同一般工人的工資相等。毫無疑問。能夠被選充當管理國家政權事務的人都只能是革命群眾中最有聲望、最有能力、最富於革命犧牲精神、忠於人民的先進人物。他們祇有貫徹執行人民意志的義務，他們的一舉一動只能以人民的革命利益為依據。而所有過去的舊的國家政權，不管它是民主的還是獨裁的，其組成人員（所謂官員）都是剝削階級、統治階級豢養的鷹犬，他們的本領就是欺壓老百姓，並以此得到升官發財。巴黎公社時期，普列漢諾夫還祇是個六、七歲的娃娃，當然不會知道什麼天下大事。長大後雖然信奉過馬克思主義，卻不曾認真研究過巴黎公社。他把無產階級專政看成是雅各賓主義、布朗基主義、巴枯寧主義，這只能證明他的無知。因自己的無知而對無產階級專政進行誹謗和攻擊，這就是反動。

在 1903 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黨綱之後，普列漢諾夫在解釋黨綱中關於沙皇專制統治後建立什麼政權的問題上，就抱有革命階段論的思想，他認為俄國革命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無產階級只應幫助資產階級推翻專制統治，完成土地革命，為俄國的資本主義開闢道路。革命勝利後只應建立資產階級的政權，無產階級不能奪取政權，無產階級只能充當反對派，爭取較多的政治權利和較好的經濟地位。這是明顯的右傾機會主義的觀點，已為革命實踐證明是錯誤的。

由於普列漢諾夫抱有這種右傾機會主義的觀點，使他在 1917 年 2 月至十月的俄國革命中，採取社會沙文主義的立場，支持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繼續進行戰爭的政策，另一方面又號召階級妥協，反對工農兵群眾推進革命、建立工農兵蘇維埃政權。在 1917 年 8 月間，他竟然參加了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的國務會議，表示對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的支持，這就充份證明他已徹底背叛了馬克思主義，背叛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而成為資本家、地主和反動軍官政客的應聲

蟲，因此，他為革命人民所唾棄就是理所當然的了。

#### （四）普列漢諾夫臨終前的其他「囈語」

普列漢諾夫在1917年2月至10月的俄國革命期間，曾經攻擊列寧提出的號召工兵農革命群眾把革命進行到底的《四月提綱》，說是「瘋子的囈語」。十月革命的成功徹底揭穿了普列漢諾夫的爛言。而他臨死前留下的「政治遺囑」才是真正地道的臨死的人的囈語呢。這裡再舉幾則如下：

（1）普列漢諾夫說：列寧有「關於社會主義革命能在單獨一個像俄國那樣落後的國家裡取得勝利的論斷」。這種說法毫無根據。十月革命時列寧主張工農兵要奪取政權建立自己的革命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十月革命的勝利就是工農兵實現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勝利。而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並不等於就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無產階級專政祇是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必不可少的政治條件。正如列寧所說：「沒有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便無從設想」。普列漢諾夫既不理解列寧的思想，也歪曲了列寧的思想。

（2）普列漢諾夫說：「勞動是一切財富的源泉」，錯了。這證明普列漢諾夫沒有讀過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一書。在這本馬克思主義的名著中，馬克思說：「勞動不是一切財富的源泉」。「自然界和勞動一樣也是使用價值（即物質財富——引者）的源泉。」這大約不需要多加說明了吧。普列漢諾夫又說：「只要勞動是自由的，結合個人利益的，俄國人就會迅速消滅國家的落後」。在任何私有制社會中，勞動從來就不是「自由」的。一個除勞動力之外一無所有的人，祇能為佔有勞動的物質條件的人去勞動，去積累財富。即使是在公有制社會中，勞動也不是「自由的」，而是自願的。

（3）普列漢諾夫說：「俄國需要按照憲法明確規定的權限行事的強有力的中央政權和地方政權」。試問：「按照」誰的「憲法」？是資產階級、地主的憲法還是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憲法？又，這個「強有力」的政權是資產階級的政權，還是無產階級的政權？這個革命的根本問題不解決，一切都是空話。而在普列漢諾夫的心目中，他所說的「強有力」的政權正是資產階級地主的政權。因為他主張俄國革命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應當由資產階級來掌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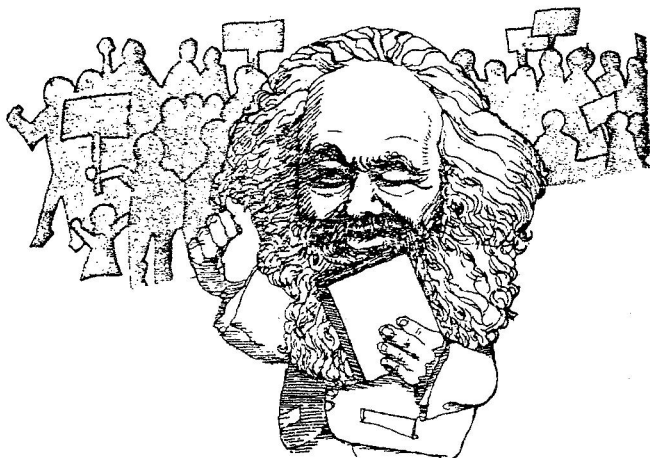
（4）普列漢諾夫質問說：「誰說過社會主義改造只有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進行？」普列漢諾夫竟然不知道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馬克思總結以往的革命經驗提出的主張！早在19世紀中，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

爭》一書中就指出：「社會主義就是宣佈不斷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這種專政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差別，達到消滅這些差別所由產生的一切生產關係，達到消滅和這些生產關係相適應的一切社會關係，達到改變由這些社會關係產生出來的一切觀念的過渡階段」。馬克思在1875年寫的《哥達綱領批判》中，對那些熱中於所謂「自由人民國家」的人進行了嚴厲的批判，他說：「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請記住這些話吧。這些話是馬克思總結無產階級反對資本主義的階級鬥爭經驗的結晶。而普列漢諾夫竟然不知道無產階級專政的主張是馬克思提出來的！普列漢諾夫至死都自以為是個社會主義者，但他卻不知道社會主義為何物！請牢牢記住馬克思所說的三個「達到消滅」、一個「達到改變」的話吧！沒有完成這三個「消滅」一個「改變」的任務，就不會有社會主義。而要完成這些革命任務，只有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做到，絕對不是任何別的「強有力的中央政權和地方政權」能夠做到的。

\*\*\*\*\*

至於普列漢諾夫關於布爾什維克、俄國前途等等的臨終「囈語」，這裡就不必多說了，說清楚上面所說的問題也就夠了。歷史是無情的。普列漢諾夫曾經對俄國革命，對推動馬克思主義運動作出過值得贊許的貢獻。但從1905年以後，他卻一步一步地走上了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這既令人惋惜，也令人痛恨！

2002年1月5日



# 歧途與正道

——讀書雜記之四（下）

林子



## 六、中國大革命中的階段論 和不斷革命論

斯大林於1927年7月間俄共（布）中央與監察委員聯席會議上為他的中國革命路線辯護，把中國革命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全民族聯合戰線的革命，即廣州時期，革鋒鉞主要是指向帝國主義，而民族資產階級是支持革命的”。“第二階段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即“武漢時期”，“民族資產階級離開了革命，土地運動則發展成為數千萬農民的強大革命”，“現在中國革命正處在自己發展的第二階段”。“第三階段是蘇維埃革命”，“現在還沒有到來”，“但它是會到來的”（《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14、15頁）。斯大林這個三階段論早已成了歷史的笑柄，實在不值得一提了。歷史的實踐證明這個三階段論是絕頂荒謬的，也是事後主觀主義的歷史機械論的絕好樣板。在這裡無需多花篇幅論證斯大林在中國大革命時期推行的階級妥協政策在實踐中所遭遇的破產，只指出下面這一點就足夠說明問題了。正好與斯大林在莫斯科大談中國革命的三階段論之時，被斯大林捧為“第二階段”武漢時期革命左派領袖汪精衛卻在武漢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正如同被斯大林捧為“第一階

段”的“革命領袖”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流血事件一樣。這兩位被捧為“革命領袖”的人，（後者還被斯大林的聯共（布）中央提名榮任共產國際主席團的“名譽委員”之一呢！）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裡，先後都給了斯大林一摑響亮的耳光。

十餘年來，我國學術界對斯大林的荒謬的階段論也已給了嚴肅的批判。1985年4月20日至29日，中共黨史研究室和全國中共黨史研究會在華東師範大學召開全國第三次“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問題”學術討論會。會上60多位與會者指出，在中國革命問題上，共產國際、斯大林對中國的“階級關係和革命階段的分析上，犯了公式化定型化的錯誤”。著名的歷史學家廖蓋隆指出：“共產國際、斯大林輕視中國無產階級、中國共產黨和中國農民的力量，而重視中國資產階級、國民黨和蔣介石、汪精衛、馮玉祥的力量，這就是他們在中國問題上的根本錯誤”。共產國際、斯大林把國民黨視為中國“唯一民族革命集團”，是各革命階級的“聯盟”，是“工農黨”或“人民黨”。因此，他們“把希望寄託於國民黨”，“用一切力量幫助國民黨去取得領導權”，處處對國民黨實行“妥協讓步”。共產國際1926年12月的決議反對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內“做領導工作”，“限制中共的活動範圍”。共產國際、斯大林要求“共產黨放棄對軍隊的領導權”，而要“全力幫助國民黨建設國民革命軍”。斯大林根本沒有提出過“要組織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對於農民運動，共產國際、斯大林口頭上說要發展農民運動，而實際上的指示卻是“互相矛盾”的。廖蓋隆還指出，斯大林的革命三階段的說法是“主觀武斷從俄國革命經驗搬來的”（實際上也不是俄國革命的經驗——引者），“遠遠不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以上引文均見《黨史通訊》1985年增刊第一期第9、10、13、14頁）。

我國學術界對斯大林關於中國革命的階段論及採取的政策批判是十分中肯的，不足之處是沒有



同當時俄共（布）以托洛茨基為首的左派反對派就中國革命問題對斯大林提出的批評及應採取的政策結合起來進行探討。托洛茨基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論著很多，但目前在國內能看到的卻不多，這大概還是禁區吧。但我們從國外學者的著作中也可以窺見一二，現簡單介紹如下：

原西班牙共產黨中央執委之一的費爾南多·克勞丁在他的兩卷集《共產主義運動》一書中，對托洛茨基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觀點有如下的介紹，他說：托洛茨基非常嚴厲批評了斯大林三階段論的觀點，認為斯大林的“第一階段”是“十足的孟什維克主義”，是“把中國共產黨變成資產階級國民黨領導的附庸，因而注定要失敗的政策理論根源”。對於斯大林的“第二階段”，“托洛茨基指責斯大林忘記了1917年的經驗教訓”，在資產階級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之間，是不會有“工農民主專政”存在的餘地的，“斯大林犯了漠視列寧《四月提綱》的錯誤”。“在托洛茨基看來，中國革命只有作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社會主義革命才可能成功。中國革命主要和直接的敵人是帝國主義，不推翻帝國主義，革命就不能勝利”。“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同帝國主義有共同的利益，儘管它受到後者的壓迫”。“買辦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並不存在鴻溝”。由於“中國經濟不發達，中國資產階級同現存的土地制度又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因此，中國資產階級比起俄國資產階級來要軟弱得多”。所以，中國革命非得要中國的無產階級作為“革命的主要動力和領導者不可”。這就使中國革命不能不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建立起無產階級專政之下才有可能獲得成功。克勞丁認為“歷史將證明托洛茨基關於中國革命只有作為社會主義革命才能成功的論述是正確的”。（以上引文均見費爾多·克勞丁著《共產主義運動》中譯本上冊255頁）。在這裡有必要指出，克勞丁所說的托洛茨基關於“中國革命只有作為社會主義革命才能成功”這句話，不能理解為中國革命“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革命，而只能理解為，中國革命只有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才能獲得成功，這才符合托洛茨基的觀點。而無產階級專政毫無疑問會開闢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的。

失敗了的中國大革命，正如同成功的十月革命一樣，都證明了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的觀點是正確的。

## 七、關於《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

斯大林的《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是他在1924年同托洛茨基論爭時提出來的。他堅決反對托洛茨基提出的不斷革命論要把俄國當時的對外對內政策建立在世界革命的戰略之上；而要求建立在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戰略之上。斯大林在他的《列寧主義基礎》（1924年4-5月）、《十月革命和俄國共產黨人的策略》（1924年12月）、《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1926年1月）等著作中都論述了他的《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觀點。在《論列寧主義基礎》一文中，斯大林說：“革命獲得勝利的國家的無產階級已經鞏固自己的政權，並領導著農民，就能夠而且應當建成社會主義”（《斯大林全集》第六卷95頁）。1925年5月，斯大林在《俄共（布）十四次代表大會的工作總結》中，進一步闡述他的觀點說：“我國有兩種矛盾”，一種是內部矛盾，即無產階級與農民間的矛盾，另一種是外部矛盾，“即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國家和其他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斯大林認為前一種矛盾是可以“用一個國家的努力來克服的”，“在無產階級專政下，我們有克服所有一切困難而建成完全社會主義的一切必要條件”。這也就是“在資本主義包圍的條件下建成社會主義的可能性”。而“第二種矛盾卻需要幾個國家無產者的努力才能解決”，“因為只要有資本主義包圍存在，就一定會有資本主義國家進行武裝干涉的危險，只要這種危險存在，就一定會有復辟的危險，即資本主義制度在我國恢復的危險”。他還警告說：“誰把這兩種矛盾混為一談，誰就犯了最粗暴的反列寧主義的錯誤，誰就是糊塗蟲，或者是不可救藥的機會主義者”（《斯大林全集》第七卷91、101頁）。1926年1月，斯大林在《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中談到他提出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理論的經過，並認為把這個問題分成兩個部份，即一國單獨建成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國家武裝干涉造成資本主義復辟的可能性的論證是合理的（參看《斯大林全集》第八卷59至63頁）。

斯大林的這些關於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觀點，實在算不上甚麼理論，因為它既沒有構成理論的客觀前提，也沒有邏輯的論證，更沒有邏輯的必然結論。與其說是理論、倒不如說這些觀點只表達了蘇

維埃國家的統治集團一種願望和一種害怕心理：既希望一個孤立的四面受到資本主義圍困的民族國家裡能保住已經獲得的政治的經濟的和社會的地位，同時又害怕失去這些地位。而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則成了掩蓋這種願望和害怕心理的一塊遮羞布。

顯然，斯大林的觀點同現代世界經濟關係和階級關係及階級鬥爭的客觀實際是不相符的。

資本主義創造的生產力早已超出民族國家的範圍，把整個世界的經濟緊密地聯結在一起，形成為不可分割的世界市場和世界分工。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都論證了資本主義經濟的這種不可分割的世界性聯繫。因此，由資本主義制度形成的階級關係和階級鬥爭，就不僅僅是一個國家的問題，而且是世界性的問題了。任何一國的無產階級反對資本統治的鬥爭，都與全世界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息息相關，都會引起整個世界資本主義制度的極大震動，這已經不是甚麼理論問題，而是近代史上世界階級鬥爭實踐常見的現象。正是基於這個理由，所以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的社會主義學說的出發點是國際性的，而不是民族國家的。因此，他們從事的無產階級解放的鬥爭從一開始便是在國際的舞台上展開的。他們積極地獻身於第一國際、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的活動就是最好的說明。斯大林把一個民族國家的無產階級的鬥爭同全世界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鬥爭機械地分割開來，既不符合客觀實際，當然也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觀點。

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是以資本主義制度創造的最先進的生產力為基礎的，既然資本主義經濟已發展成不可分割的世界體系，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也就只能是一個不可分割的世界體系，它同單獨一個民族國家的自給自足的經濟是絕對不相容的，就是說，它不能建立在自給自足的經濟基礎之上。離開了高度發展的生產力創造的世界分工和世界經濟聯繫，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是不可想像的。正如列寧為斯切潘諾夫——斯克沃爾佐夫的《電氣化》一書寫的序言所說的：“俄國無產階級從不想建立一個孤立的社會主義國家。獨立自在的「社會主義」國家是小資產階級的理想”。這也就是說，這個“小資產階級理想”的、被列寧放在括號裡的「社會主義」國家是不會實現的空想。

斯大林既然把一國的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同作為一個整體的世界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分割開來，它的理論便不能不陷入自相矛盾之中而不能自圓其說。一方面他肯定俄國無產階級既然能奪得政權，就能依靠國內的力量克服國內的種種矛盾，獨自領導農民“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而無需依靠其他國家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顯然，斯大林把奪取政權和建成社會主義混為一談了，其實二者所依據的條件是全然不同的。而另一方面，他又認為無產階級已經取得政權的國家同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只有幾個國家的無產階級的共同努力才能解決”，不然的話，資本主義包圍的存在，就會有武裝干涉的危險，就有“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因而也就存在不能建成社會主義的危險。把這樣自相矛盾的觀點揉雜在一起充作“理論”，正如他自己所說的，“只有糊塗蟲或者不可救藥的機會主義者才提得出來。”

其次，斯大林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觀點，從根本上說是同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的基本定義相違背的。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高於資本主義制度、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在這個社會裡，人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非常豐富充足多彩高尚，人人都處於完全自由、平等、和諧、友愛、關係融洽的社會集體之中，沒有階級區別、沒有剝削、沒有壓迫、沒有國家至高無上的權威，因而也就沒有國界的劃分。通常所講的社會主義革命就是要將資本主義社會改造成這樣和諧的社會主義社會的革命。只有無產階級才能完成這個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的第一步就是要使無產階級奪得政權，取得對國家的統治地位，才能開始對資本主義社會實行社會主義改造。所以，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建立專政只是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始，而不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完成。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指出：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要經歷一個“過渡時期”，在這個時期裡，無產階級要憑藉自己掌握的國家政權，進行一系列的社會改革，消滅私有制，消滅階級剝削，消滅階級，消滅工農差別、城鄉差別、智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極大地提高生產力，發展豐富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從而創造條件使自己建立起來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也逐漸趨於“消亡”，這樣才能使真正自由平等和諧友愛的社會主義社會得以建立起來。列寧曾經解釋過蘇聯的國名所以叫做“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這僅僅是表

明“蘇維埃政權有決心實現向社會主義過渡，而決不是表明承認現在的經濟制度是社會主義的制度”（《列寧選集》第4卷504頁《論糧食稅》一文）。列寧還指出：“社會主義就是消滅階級”，“階級一消滅，專政也就不需要了”。但，“沒有無產階級專政，階級是不會消失的”（《列寧選集》第4卷91頁《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經濟與政治》一文）。所以，當還存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時候，社會還在進行改造中，就是說，還沒有達到社會主義。

斯大林在1939年3月18日聯共（布）十八大的《總結報告》中宣稱蘇聯已經建成社會主義，但為了掩蓋國家權力的存在同社會主義制度相矛盾這個漏洞，他竟狂妄地對恩格斯提出的關於“國家自行消亡”的理論進行修正，他無恥地歪曲恩格斯的觀點，說“國家自行消亡”的公式只有在“下面兩個條件中的一個條件才是正確的：（一）如果僅僅從一國內的發展來研究社會主義國家……把它看作是一個離開國際環境而孤立存在的國家；或者（二）如果假定社會主義已經在一切國家或大多數國家獲得了勝利，社會主義的包圍已經代替資本主義的包圍，外來的侵犯已經不再存在，軍隊和國家已經沒有必要加強”。但是，“在社會主義在單獨一個國家中獲得勝利的這種個別具體情形下”，在存在著“外來武裝侵犯的威脅情況下”，“這個社會主義國家”“就應當擁有訓練得很好的軍隊，組織得很好的懲罰機關和堅強的偵察機關。因而應當擁有自己十分強有力的國家，以便保護社會主義成果免受外來的侵犯”。（《斯大林文集》1934-1952，第278、279頁）斯大林真不愧是個善於歪曲別人觀點的能手，“如果……”；“如果……”；“應當……”，“應當……”，兩個“如果”，加上兩個“應當”，就把恩格斯關於“國家消亡”的馬克思主義觀點歪曲得面目全非。“如果”只有魯濱遜一個人，而沒有“禮拜五”，那就不會有甚麼剝削，也就無須考慮“應當”建立甚麼樣的平等的社會制度了。因為“單獨”一個人根本不需要甚麼社會制度的。可是自古以來就沒有這樣單獨存在的個人。斯大林憑空提出這樣的問題來責問恩格斯，“假如社會主義僅僅在一個單獨國家獲得了勝利”，作為階級壓迫工具的國家是不是也“自行消亡”呢？這個問題提得多麼可笑，因為事實上，客觀上並不存在這樣一個獨立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個“假如”的獨立社會主義國家只存在於斯大林的腦

子裡，而不是客觀存在的東西。而恩格斯的論證是從資本主義的世界性這個客觀事實出發，而不是從腦子裡的“假如”出發。在恩格斯看來，根本就沒有單獨一個國家能夠實現社會主義制度這個事實。更其荒唐的是斯大林竟然設想到，即使到了共產主義，“如果”（仍舊是斯大林這個萬能的“如果”）仍然處在孤立的被資本主義國家包圍的話，那“國家”還是不能“消亡”的，而且還得要加強！這就是斯大林的思維邏輯。世界上再沒有比這種冒充的理論更荒唐了。

歷史上有過許許多多單獨存在的原始部落。它們很少甚至完全不同世界上其他社會集團發生關係。這些部落是由好幾個建立在被歷史學家稱為原始共產主義制度之上的氏族組成的。摩爾根的《古代社會》一書曾詳盡地介紹過這種遠古時代的，至今仍存在於某些仍處在野蠻時代的部落中的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的種種情況。恩格斯也在《家庭、私有財產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對這個氏族制社會曾大加贊賞說：“這種十分單純質樸的氏族制度是一種多麼美妙的制度啊！沒有軍隊、憲兵和警察，沒有貴族、國王、總督、地方官和法官，沒有監獄，沒有訴訟，而一切都是條條有理的。……一切問題都是由當事人自己解決的，在大多數情況下，歷來的習俗就把一切調整好了。不會有貧窮困苦的人，因為共產制的家庭經濟和氏族都知道它們對於老年人、病人和戰爭殘疾者所負的義務。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包括婦女在內”。（《馬恩全集》第21卷111頁）但，正如恩格斯所說的，這種原始共產主義制度雖然“值得贊嘆”，卻“還沒有脫掉自然發生的共同體的臍帶”。因為它是建立在非常低下落後的生產力的基礎之上的，還需要血緣關係來維持，而隨著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這種“還沒有脫掉自然發生的共同體臍帶”的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制度是“一定要被打破的”。如果今天世界上確實還存在有孤立的實行共產主義制度的社會集團的話，那肯定就是如同摩爾根所寫的易洛魁人部落那樣的社會集團。而今天美洲的土著印第安人早已不能不受到資本主義制度的禁錮了。可今天無產階級要建立的卻是在高度發展的世界經濟基礎上的社會主義制度，它當然不能和原始共產主義制度那樣可以在一個孤立的社會集團中存在的。這難道還不明白嗎？

世界革命是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的一個根本的戰略原則。無產階級政黨即使在最孤立的



情況之下，一刻也不能放棄這個原則。放棄這個原則就是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無產階級的利益。從最好的情況來說至少也是機會主義。正如恩格斯對1891年的《愛爾福特綱領草案》提出批評時指出的：“為了眼前暫時的利益而忘記根本大計，只圖一時的成就而不顧後果，為了運動的現在而犧牲運動的未來，這種做法可能也是出於「真誠的」動機。但這是機會主義，始終是機會主義。而且「真誠的」機會主義也許比其他一切機會主義更危險”。（《馬恩全集》第22卷第274頁）。在20年代，當斯大林剛提出一國社會主義理論之時，或許還可以稱之為「真誠的」機會主義。半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踐證明，斯大林的“真誠的”機會主義對於工人階級的解放事業來說，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比其他的一切機會主義更危險”，其所帶來的危害更嚴重。

實際上，斯大林的這些自相矛盾的所謂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觀點，只反映了在十月革命後取得了統治地位的蘇維埃官僚集團的自私自利的願望，它既不代表俄國無產階級及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也不代表國際無產階級的利益；而只代表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蘇維埃官僚集團為了保住自己已經取得的政治的經濟的和社會的利益。為了這些既得的利益，他們可以犧牲俄國無產階級和勞動農民的利益，也可以犧牲國際無產階級的利益；既犧牲無產階級的長遠的歷史的利益，也犧牲無產階級的眼前利益。對此，人們只要翻開蘇聯現代史中有關對內對外政策所造成的嚴重後果便可一目了然的。

斯大林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所搞的超工業化政策和強迫農業集體化的政策所造成的嚴重後果，這是連斯大林本人也承認的，只是他把責任推給下級幹部和群眾吧了。在對外政策方面，他放棄了世界革命的戰略，一意謀求同資本主義世界取得勢力均衡，推行一系列同國際資產階級妥協的政策，以致葬送了30年代法國、西班牙等國的大好革命形勢；二次大戰前，斯大林還同法西斯頭子希特勒締結友好條約，犧牲了波蘭、波羅的海沿岸各國的獨立。為爭取羅斯福、邱吉爾的支援，還解散了共產國際。二次大戰後期以後，還犧牲了法國、意大利、希臘等國的革命利益；甚至還同臭名昭著的反共頭子邱吉爾商議劃分東歐地區的勢力範圍。這些就是眾所周知的反動的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理論在實踐中造成嚴重後果的最顯著例子。至於戰後那些相

繼擺脫了資本主義鏈條的東歐各國，在蘇聯的直接控制之下，也和蘇聯一樣，推行了官僚軍事警察的統治。蘇、波、捷、保、匈、羅、阿、南和東德，這些號稱“社會主義”的國家，本應能夠形成一個和諧的、平等的、互助友愛的真正的“社會主義陣營”，或“社會主義的世界體系”了。但十分令人痛心，東歐各國人民卻要為蘇聯的“一國社會主義”作出巨大的犧牲，造成了東歐各國同蘇聯之間的深刻的裂痕。至於說到斯大林一國社會主義的對外政策給中國革命造成的損害，如所謂“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李立三左傾機會主義”、“瞿秋白左傾盲動主義”、“王明左傾機會主義、右傾機會主義”等等，都是斯大林一手泡製的產物，早已是人們所熟知的了。即使是在解放戰爭中，斯大林還要中共同蔣介石隔江而治呢。以上這些例子充份說明了一國社會主義的理論不但使蘇聯人民更加遠離社會主義，而且也使世界人民的革命利益遭到了慘痛的損失。

今天，正是斯大林官僚統治集團的利益同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革命利益之間的深刻矛盾的進一步激化，使得蘇聯和東歐各國陷於總崩潰的危機之中。

當初，在斯大林同托洛茨基爭辯時，他曾針對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提出的俄國無產階級政權面臨的矛盾只有在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舞台上才能解決的論點提出責問；如果世界革命來遲了呢？俄國無產階級政權是不是在等待世界革命中“連根腐爛”呢？對於這個問題，列寧生前曾毫不含糊地說：如果沒有世界革命的支援，我們一定會失敗。托洛茨基同列寧一樣持有相同的觀點。而今天，社會的實踐無情地對斯大林提出的責難作出了回答，不是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也不是資本主義國家製造的顛覆活動，而是斯大林建立起來的蘇聯的官僚專制統治自身無法擺脫的重重矛盾使得這個國家“連根腐爛”了，歷史證明了這一點。當前蘇聯和東歐各國的私有化改革說明了：官僚統治集團除了尋求同資本主義私有制一體化的道路之外，再也沒有別的出路了。這正是他們背叛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根本原則的必然結果。

現在我們可以回到本文的題目：《歧途與正道》上來了。20年代這場斯大林的一國社會主義和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的爭論終於在社會實踐中得到了不容置疑的回答：斯大林的一國社會主義的理

論是錯誤的，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才是正確的。在歷史的事實面前，誰還能夠懷疑這個答案的絕對正確性呢？20年代中，陳獨秀曾是兢兢業業遵循斯大林的教導，執行了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導致中國大革命的失敗。20年代的後期，陳獨秀接受了大革命失敗的教訓，在研究托洛茨基的理論之後，終於勇敢地轉到托洛茨基的立場上來，這正表明了他是一個忠誠於無產階級解放事業的無私無畏的革命家，而不是趨炎附勢、只知道為自己個人或一己小集團利益打小算盤的投機小人。對比之下，那些莫洛托夫們、卡岡諾維奇們、貝利亞們、多列士們、陶里亞蒂們、季米特洛夫們……等等的依附斯大林權勢的人，不是更顯得渺小麼？至於我國的王明們、康生們當然更是不值一提的無恥走卒了。

## 八、值得思考的問題

20年代這場關於一國社會主義同不斷革命論的爭論已經過去約70個春秋，爭論的兩個主角早已不在人世；曾參加過這次爭論的衆多共產黨人，不論是當權的斯大林份子，還是受迫害的托洛茨基份子，現在剩下的恐怕也是絕無僅有了。但這次爭論的重大歷史意義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當今世界階級鬥爭的深入開展，卻愈來愈明顯地呈現在人們的眼前，使任何一個獻身於無產階級解放事業的共產主義者都不能不予以嚴肅的關注，並從中獲得應有的教益。

由於歷史的、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種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使得當今無產階級革命還只能在一個民族國家範圍內開始，即所謂革命首先在資本主義鏈條的最薄弱環節開始爆發，即指此。一般來說，無產階級革命還不可能同時同步地在幾個國家發生，特別是不可能幾個先進國家同時發生。這就發生了無產階級革命在單獨一國範圍內奪取政權獲得成功後，如何鞏固已取得的革命成果的問題，同時也發生了如何使一國成功的革命發展為世界革命的問題，亦即如何正確處理一國成功的革命同世界革命關係的問題。這兩個問題自然是緊密相關不可分割的。而這正是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已經提出來並應當加以解決的問題。

十月革命是無產階級在一個落後的民族國家裡奪得政權的成功典範。在十月革命後，布爾什維克

的革命家們都把希望寄託在世界革命對俄國革命的支援上面，特別希望於德國革命會很快到來。但不幸的是十月革命之後，各國革命運動由於客觀的和主觀的原因，並未能跟上十月革命的步伐。相反，卻相繼遭到了挫折，特別是1919年德國革命的失敗，使俄國無產階級很快便陷入孤軍作戰的險惡境地，使俄國無產階級對世界革命的支援大失所望，並直接影響到戰鬥意志和熱情的加強。1918年尚在獄中的國際主義戰士盧森堡就曾因為德國革命未能及時支援俄國無產階級的鬥爭而深感不安和內疚，並認為俄國革命所以陷入孤立的困境，並由此必然要遇到種種困難，德國無產階級應負有不可推卸的、未能及時支援的責任。正是由於俄國革命處在孤立的困境中，而更由於俄國又是一個落後貧窮、小資產階級成份佔優勢的國家，這就決定了布爾什維克的革命家們在採取社會主義改革的步驟時不能走得太快太遠；亦即是說，不能在一個貧窮落後而小資產階級成份佔優勢的國家裡馬上採取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政策。這就是布爾什維克所以從戰時軍事共產主義退回到新經濟政策的主要原因。新經濟政策實質上就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向資本主義作出讓步，容許私人貿易的存在，即恢復國內貿易，也恢復國際貿易，甚至容許外國資本在國內投資。布爾什維克在經濟上的退守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功，國民經濟得到了迅速的恢復和發展。但新經濟政策也帶來了劇烈的社會分化，新的資本主義勢力大大發展了，如果蘇維埃政權不加以控制而讓其自由發展下去，這將是一個嚴重的威脅，就會有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這就是一個孤立的無產階級國家處於防禦地位必然面臨的最急迫的問題：既要對資本主義成份作出必要的讓步，又要確保無產階級國家不會發生資本主義復辟。這個兩難問題確實曾經使布爾什維克的革命家們大傷腦筋；以布哈林為代表的右派布爾什維克提出“發財吧”的口號，鼓勵廣大小資產階級農民群眾走個人發財致富的道路，這實際上就是發展資本主義，而不是過渡到社會主義；以托洛茨基為首的左派布爾什維克則提出蘇維埃國家實現工業化和發展農業合作化的道路，以豐富的工業產品來換取農產品，進行城鄉的正常交換，確保工農聯盟，並藉此實現社會主義的原始積累，以增加社會主義工業建設的資金。而當時的斯大林對左派布爾什維克提出的工業化計劃卻認為要農民丟掉耕牛而去買留聲機。而幾年之後，斯大

林卻採取了超工業化和強迫農民集體化的政策，使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農民作出了巨大的犧牲，使國內各種社會矛盾陷於極度緊張的狀態中。

列寧在世時，非常重視無產階級政黨的建設和無產階級政權的建設。他特別痛恨官僚主義對無產階級政黨和蘇維埃政權的腐蝕。他曾把反對官僚主義列為布爾什維克黨的“三大任務”之一。而且，他還同托洛茨基商議反對官僚主義，特別是反對斯大林控制的組織局的官僚主義。但是，在革命浪潮日趨消退的形勢底下，群眾直接的革命行動的主動性日漸消失，因而也就不可能通過群眾的革命主動性來對黨和國家機關實行群眾性的民主管理和監督。單純的組織手段和措施，乃至於法律手段，已經不能阻止黨和國家機關的官僚化了。列寧為此甚至把蘇維埃式的工人國家叫做“官僚國家”。在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歷史時期裡，沒有真正的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政權即工人政府，就根本不可能實現向社會主義過渡。

斯大林統治時期的蘇維埃政權已經不是列寧領導時期的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政權了，而實實在在是列寧所說的真正的“官僚政權”。組成這個“官僚政權”的人員是地道的官僚主義者，他們不是由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直接選舉所產生，而是按一般形式的程序所產生，不受人民群眾的監督，卻高踞於人民群眾之上，高踞於全社會之上；他們構成了一個龐大的官僚隊伍，使蘇維埃政權喪失了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性質，變成了如同私有制度下舊的國家機器一樣，是統治人民、壓迫人民的工具。

布爾什維克黨和蘇維埃政權的官僚化經歷了一個不自覺到自覺的過程，直至公然承襲了私有制度國家政權的官僚主義的種種程式和做法，這包括黨和國家幹部的培養、選用、委派、任免、獎懲和提升等等，使黨和國家組織形成一種自上而下的一套官僚等級制度。在這套官僚制度中，下級完全處在被動的地位，而沒有了自己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上級則高高在上發號施令，而最終的決定則取決於總書記一個人。這就是斯大林建立起來的蘇維埃官僚制度。龐大的官僚隊伍，加上總書記控制的掌握有無限權力的特務警察組織和脫離人民的武裝力量，這些就像吸血的水蛭一樣牢牢地吸附在蘇維埃國家的軀體上，成了蘇聯人民不堪忍受的沉重負荷。

斯大林聲稱他的政權就是無產階級專政，這是欺騙。他的政權只有蘇維埃的名稱，而無蘇維埃之實。我們知道，列寧把蘇維埃稱做“巴黎公社式”的工人階級的政權，列寧還說：無產階級專政等於無產階級民主，等於蘇維埃。可見，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民主、蘇維埃、巴黎公社式的工人政府，都是同一事物的不同稱謂，都是指的無產階級的政權。無產階級的政權只能是民主的政權，而不能是任何專制的政權。這是因為無產階級民主或無產階級專政是直接建立在廣大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直接革命行動的主動性上面的。沒有群眾直接的革命行動，就不會有無產階級民主，就沒有無產階級專政，就沒有蘇維埃，就沒有“巴黎公社式”的工人政府。所以，無產階級在奪得國家政權之後，必定要堅持無產階級的民主原則。托洛茨基反對斯大林官僚專制的鬥爭，就是為了要堅持無產階級的民主原則。

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一書中總結了巴黎公社的經驗，提出“巴黎公社的原則永存”的觀點。巴黎公社的原則歸納起來就是：一、國家官吏的普遍和直接的選舉原則；可以隨時罷免的原則。二、國家官吏的工資待遇不得超過熟練工人的最高工資的原則。三、實行普遍民兵制，以代替常備軍的原則。這幾條原則是無產階級民主原則的具體化，是無產階級國家同過去私有制的國家根本區別的所在。貫徹執行這幾條原則，就可以防止無產階級政權的官僚化變質。而這幾條原則的貫徹，沒有群眾的革命主動性是根本不可能的。

無產階級必須保持和鞏固在一個民族國家已經取得的勝利成果。但這絕不是無產階級的最終目的，即使對那個奪取政權勝利了的國家的無產階級來說也是如此。俄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個組成部份。這是列寧一貫堅持的思想。部份與整體是辯證的統一。沒有部份就不能構成為整體；反之，沒有整體，也不會有單獨存在的部份。如果有單獨存在的部份，這個部份就不會具有作為整體的性質，而是其他性質的東西了。列寧非常了解部份與整體的辯證關係，所以，他在十月革命後的第二年，便立即著手組織共產國際。這不僅僅是為了俄國革命獲得世界各國無產階級的支援，而且是為了更好更快地組織和推動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發展。在布哈林為共產國際起草的《綱領》，和托洛茨基起草的《宣言》中都體現了這一戰略思想。



不幸的是在列寧死後，當權的斯大林集團卻放棄了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戰略思想，逐步地把作為無產階級世界革命司令部的共產國際變成為蘇聯一國的簡單的外交工具，把共產國際的各國支部變成斯大林集團謀求同國際資產階級取得均勢的討價還價的籌碼。列寧死後的蘇聯外交史和共產國際史，一篇篇一頁頁都充滿了斯大林如何犧牲各國無產階級革命利益的可恥記錄，使人讀了不由得氣憤萬分。

斯大林的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甚至一國建設共產主義的大話，已經為半個世紀的歷史實踐批駁得體無完膚了。但在革命隊伍中要徹底肅清斯大林一國社會主義理論的思想流毒，還需要一個思想鬥爭的過程。在這個鬥爭中，無產階級戰士必須時刻要堅持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戰略思想。

今天，國際資產階級為了對抗無產階級反對資本統治的鬥爭而結成的反動的國際資本聯盟，比過去任何歷史時期都更加牢固和有力。這在近年來在中東戰爭的問題上，在當前的波黑戰爭問題上，乃至於在對待蘇聯解體後的改革和所謂支援東歐各國改革的問題上，各國資產階級的步調都是一致的。由此使我們更加明白無產階級革命的國際性原則是多麼重要，沒有無產階級的堅強的國際組織，就不能同反動的國際的資本聯盟相對抗，無產階級的世界革命就是一句空話。

1995年12月

(全文完)

## 更正啟事

本刊上期(總第213期)內有兩文存在錯漏及誤譯，現更正如下：

(一) 第11頁《菲律賓左派的發展》一文：(1) 左欄第7至行，應為：1972年頒布的「戒嚴令」，結束了極左派內原先的多元局面〔即各派別同時存在的局面〕：(親蘇的)菲共投降了。

(2) 同頁左欄倒數第3行和右欄倒數第6行兩處的「社會民主黨」，應該是「民主社會主義黨」。

(二) 第22頁《斯大林下令殺害托洛茨基及其同志》一文：

(1) 同頁右欄第6行第16字起應為：「生活無著落」；

(2) 同頁右欄最末一字起與次頁之間，少印出以下一行字：「托洛茨基的部下，他來到島上退見謝多夫，於是得以秘密拜」(訪托洛茨基)；

(3) 第23頁左欄第4行的「布哈林」，應為「哈林」；

(4) 同頁左欄倒數第20行第7字的「瓦解」，應為「了解」；

(5) 同頁左欄倒數第4行第11字後漏了「民」字；

(6) 第24頁右欄倒數第20行第3字的「頭」字應為「關」字。

發生以上許多錯漏，敬請讀者、作者原諒。



# 以托洛茨基作為可供選擇的道路（十一）

曼德爾著 兆立譯

## 第八章 作為軍事領導人的托洛茨基



### 舊的與新的神話

蘇聯及各官方共產黨的傳播媒介對托洛茨基的態度，曾經十分顯著地反映了蘇聯、在較小程度上反映了東歐和所謂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政治發展。

在列寧去世之前，托洛茨基曾被視為十月暴動的組織者、紅軍的創建人、領導人和黨及國家中列寧身旁的第二把手。很多書本、小冊子、期刊和報章提到了“列寧和托洛茨基的政權（國家、政府等等）”。<1>在1924年到1929年間，托洛茨基的形象逐漸被改變為政治上反對列寧和布爾什維主義的主要人物。1929年之後，他被宣佈為一個孟什維克反革命份子，而在1935年之後就成為第一號公敵、間諜、納粹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希特勒的信徒（法國共產黨人杜撰了“希特勒—托洛茨基份子”這個名稱）、在蘇聯復辟資本主義的支持者和恐怖行動的組織者。

在赫魯曉夫所主持的非斯大林化開始之後，特別是在Glasnost〔開放〕的初期，一個有意義的轉變發生了：托洛茨基現在被描述為真正啟示斯大林的人；斯大林實行了他的綱領；如果他在權力鬥爭中取勝的話，他就會是“第二個斯大林”。為了支持這個觀點，新的歷史神話創造出來，1920年代後半期的舊神話復活了。例如，在1980年代後期，伏爾科戈諾夫（Volkogonov）將軍在他所

寫的斯大林傳中宣稱，在格魯吉亞的問題上，列寧並沒有建議與托洛茨基結盟來反對斯大林，雖然關於此事的文件證據是絕對不含糊的。伏爾科戈諾夫也聲稱，列寧並沒有認為托洛茨基是他的繼承人，雖然現在已經出版的文件都證明這的確是如此。伏爾科戈諾夫之聲稱托洛茨基要用軍隊來反對斯大林，在以經驗為依據的證據中，是沒有任何基礎的。<2>

可是，最近幾年來，伏爾科戈諾夫將軍對檔案材料進行了透徹的研究之後，寫了一本關於托洛茨基在俄國革命中角色的書，幾乎完全修改了先前包括在他的斯大林傳中的負面判斷。<3>

然而，他仍然認為托洛茨基在內戰中的措施促進了無產階級中的恐怖部份。

這些神話和指控終於經歷了180度的轉變。在舊蘇共和其他共產黨的“自由派”（其實是自由—保守派）和社會民主派的圈子中，托洛茨基被說成為不是激勵斯大林、而是激勵列寧的人。把列寧從資產階級民主的小徑拉開、使他沿著社會主義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的大道前進，是托洛茨基的功勞。應對“烏托邦的”、“暴力的”十月革命負主要責任的是他。他應對造成斯大林這樣的人物負責，因為斯大林主義是十月革命的必然結果。在這同時，他被洗雪了一切犯有罪行的誹謗，他對蘇聯建設的貢獻也被承認了。

對托洛茨基角色的這種反反覆覆的評價，大體上反映了對革命的態度、對革命本身的反覆評價。

今天在俄國，對托洛茨基的這種含糊不定的態度，是由於群眾仍然有限度的參與和政治混亂，也是由於知識份子的思想倒退。這並不是偶然的。因為托洛茨基和列寧及盧森堡一起把無產階級革命的兩個主要趨向合起來——無產階級的自我活動和國際主義。就是由於托洛茨基的前後一致的、有原則的行為，我們才在他之作為軍事領袖的活動中再次找到這兩個主要趨向。

### 紅軍的締造者

沒有人對托洛茨基是紅軍的締造者提出質疑。我們現

在知道，被錯誤地包括在《列寧全集》中的那篇著名的1918年2月21日的敕令“祖國在危險中”（《列寧全集》〔英文版〕，第27卷，第30—33頁），事實上是托洛茨基寫的。夏皮羅（Leonard Shapiro）曾經說過，“創造紅軍的功勞，托洛茨基比任何人都大”〈4〉這也是列寧的觀點，他是在那篇有名的與高爾基的談話中表達這個觀點的。〈5〉許多同代人，包括盧那恰爾斯基，都說過同樣的話。美國最重要的俄國史專家之一，布魯斯·林肯（W. Bruce Lincoln），稱紅軍為“托洛茨基的紅軍”。他寫道：

托洛茨基以其卓越的組織才華和天才的領導能力瞭解到：沒有一大批受過近代戰爭方法訓練的軍官，俄國的初生紅軍是不能夠發展的。〈6〉

那是一個動人的組織成就。他從幾乎一無所有創立了一支擁有五百五十萬人的軍隊，其中大多數人是農民。他如此成功地團結了這支軍隊，使它遵守紀律，以致能夠不需要任何大的壓制措施來保持這支軍隊的內聚力和士氣。他所用的措施，其壓制性當然比資產階級軍隊在戰時所用的要小得多了。更動人的是，他在徵募、運用前沙皇軍官方面的成就。在這些軍官當中，約有一千個將官。這些軍官佔紅軍司令員相當大的比數。列寧支持這種做法，但是，這是托洛茨基的主意。這是獲得足夠數量有訓練、有經驗的“紅色司令員”之前必要的一個方法。他一定要創立一支有效的、集中的軍隊來抵抗反革命的白軍，阻止它們消滅新生的蘇維埃國家。許多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包括斯大林在內，主要地要以分散的游擊戰來對抗白軍。在當時的國際力量關係之下，這種游擊戰術會招致蘇維埃快速的失敗。

托洛茨基在組織上的成功，表達在極大多數前沙皇軍官和極大多數農民士兵一直對紅軍忠誠這個事實上，雖然這兩組人在政治上並不接近布爾什維主義。這種組織成就，與托洛茨基建立紅軍的政治作風有密切關係。紀律主要是靠鼓動與道德勸喻的方法達到的。逃兵事件是用寬大的態度來處理，其目的是使他們重新融合。在十分之九的情況中，這種做法起了作用。

托洛茨基在《My Life》〔《自傳》〕中描述了他梁贊區和數千個逃兵的邂逅，引用了他在1919年2月24日對聚集在莫斯科的圓柱大廳中的年青紅軍指揮官的演說：

給我三千個逃兵，就說是一團人吧；我就會給他們一個勇於戰鬥的團長、一個良好的政委、合適的營長、連長及排長——這三千個逃兵在我們這個革命國家中就會在四個星期中形成一個光輝的團。〈7〉

## 作為階級戰爭的內戰

他在建立紅軍上的動人成就，是與他在內戰中、在取得反對反革命白軍、反對外國干涉的勝利中之作為總司令的角色相稱的。瑞士專家萊德雷司令曾寫過：“說內戰的勝利主要是托洛茨基的功勞，一點也不過份”。〈8〉在內戰中，托洛茨基的戰略，是建基在對於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內戰的一種特別的政治——道德概念上，也是建基在敵對力量所包圍的實際局勢中對於新建立的蘇維埃政權所特別需要的事物的了解上。

托洛茨基對無產階級領導的內戰的特殊性質，有一個獨特的、勇敢的概念。它可以被總結為以下的公式：以有系統地提醒敵軍士兵注意他們自己的基本階級利益來瓦解敵軍。新生蘇維埃政權的第一批政令——和平的政令與立即分配土地給農村中農民的政令——就有這種效果。兵士集體逃離沙皇軍隊，為的是能夠參加土地的分配。〈9〉後來，允諾在白軍佔領區域的農民可收回被地主奪去的土地，起了相似的作用。就城市工人而言，有系統地著重紅軍的無產階級性、國際性〈10〉，有系統地著重它之保衛工人政權、保衛十月革命的成果，也起了相似的作用。

托洛茨基把每個內戰看成為階級戰爭。他在俄國內戰和被外國干涉所支持、反對法國革命的旺代〔德國西部一地區——譯者〕之戰之間看出相似之處。他時常指白軍為俄國的旺代。他也看出與美國內戰的相似處。美國內戰的決定關頭，是當林肯宣佈解放奴隸、准許組成黑人軍團的時候發生的。托洛茨基後來在對西班牙內戰的分析中，系統化了他的階級戰爭概念。〈11〉

蘇聯在這次內戰中的特殊地理地位，也有它自己的軍事邏輯。托洛茨基的軍事經驗雖然有限，但他不久就認識到這點。白軍在職業性與機動性上好過紅軍。他們又有外國軍團的支持，可以得到金錢、武器與軍需品的供應。可是，他們的弱點，除了社會基礎狹窄以外，就是從來沒有辦法有效地團結他們的力量。他們是在地理上互相隔離的陣線上作戰。白軍將領之間缺乏團結是與領頭進行反對蘇維埃俄國的干涉戰爭的帝國主義列強不同的經濟、政治利益有關：德國（與芬蘭聯盟）、法國（與波蘭聯盟）、日



本、英國與美國。〈12〉

為了利用這些弱點，紅軍利用它的“內圈”的種種優點，在一支中央後備軍的支持下，時而在東面，時而在北面，時而在南面，時而在北面出擊，以致敵人只能集合小部份力量來對付他們。在這種戰略中，托洛茨基的著名K車扮演重要角色。〈13〉執行這個戰略的主要問題是蘇維埃控制區運輸系統的貧乏。因此托洛茨基才認為修復運輸系統是非常重要的。成功地應用這個戰略原則也需要所在紅軍力量的集結。這就受到了支持分散的游擊策略的人們的反對。但是，托洛茨基在列寧的充分支持下，隨心所欲。〈14〉

托洛茨基拒絕接受任何特別“無產階級軍事科學”的觀念。〈15〉這個觀念被相當多共產黨員等同為“進攻的原則”。為了這個問題，他就與一群接近弗朗澤、（受圖哈切夫斯基支持）的共產主義軍事專家們，展開了一場劇烈的爭論。在1923—24年時期，這個團體支持斯大林、齊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二頭執政，反對左派反對派，因此對斯大林派的勝利作出不小貢獻。〈16〉

托氏之拒絕接受“無產階級軍事科學”的概念，正如他之拒絕接受“無產階級文化”的觀念那樣有力。他也對像法國的福煦元帥那樣的資產階級軍事領袖持批判態度，因為後者把幾個陳詞濫調當做軍事科學的“基本原則”。托洛茨基比其他一切更著重的，是成功的軍事戰略在歷史上、社會政治上的相對特性，因為在每個例子中，成功的軍事戰略都是符合特殊利益、特殊情況的。對托氏來說，起決定作用的，是實施調動的能力。他的規則是，根據特定情況及對力量關係的現實估計來行動，依據情況的需要來進行攻勢或守勢。主要的原則是，在企圖取得敵人的主要陣地的時候，不要以失去自己的最重要陣地為代價。對他來說，保衛彼得格勒對抗尤傑尼奇的進攻是關鍵性的，因為彼得格勒是俄國革命的堡壘，因此是蘇維埃俄羅斯的堡壘。正如布魯斯·林肯在他的內戰史中描寫的，托氏確實挽救了紅色無產階級的彼得格勒：

托洛茨基派遣了男人、女人們去保衛彼得勒，這些人的心被他的革命熱情所燒熾，被他對布爾什維克在建立的新世界的始終不渝信仰所安慰。當尤傑尼奇在普爾科沃的軍隊準備最後攻擊時，這支工人軍團把彼得格勒轉變為托洛茨基軍人在從莫斯科來的夜間火車上所設想出來的迷宮式堡壘。（《紅軍的勝利：俄國的戰史》，第298頁）

托氏贊成將波蘭軍隊趕出烏克蘭的攻勢，但是，在下一階段裏，他卻非常擔憂紅軍對華沙的攻勢。由於同樣的理由，他傾向於完全拒絕接受“軍事科學”的概念，寧可把它描述為一個與良好軍事技術有關連的軍事藝術。〈17〉

有些作者含沙射影地指托洛茨基在內戰中擔任軍事司令時，犯過極壞的錯誤。他當然像每個人一樣犯過錯誤。但是這些錯誤的具體情況怎樣、它們的嚴重後果到底是甚麼，仍然是一個謎。羅伊·麥德維傑夫（Roy Medvedev）也作過同樣暗示，但是沒有提出具體的證據。〈18〉沃爾特·拉克爾（Walter Laqueur）雖然是托洛茨基的批評者，但是對他之作為軍事領袖作出了非常正面的評價〈19〉，與列寧格勒的歷史學家比立克（Vladimir Billik）一樣。

### “勞動軍事化”的神話

內戰終結的時候，俄國面臨大量紅軍復員的問題。要防止大量失業會減弱工人階級在蘇維埃社會中的地位，托洛茨基建議將相當多的武裝部隊轉變為“勞動軍隊”。這支軍隊應該主要地被用來修復破壞了的鐵路、公路交通運輸系統。這個建議，在以後的爭論中被描述為“勞動軍事化”，在當時被第九次大會所通過，而且得到了日後是圍繞著什利亞普尼科夫和科隆泰的工人反對派的成員及列寧的支持。〈20〉

托洛茨基更走前一步。不但紅色兵士應該變成紅色工人，而且飢餓的、失業的工人應該送到工廠去，促進工業生產，使之正常化。由於工人階級廣泛的粗魯、愚昧、破落化，工作場所中就需要嚴格的紀律。導致內戰勝利的那個方法，現在可以導致生產戰線上的勝利。這就是托氏的公式“勞動軍事化”的起源。列寧完全支持這個建議，雖然它在黨的某些圈子中遇到反對。〈21〉

托洛茨基在以後的爭論中被指控為要引進對工人、工會敵視的政策。他在工會爭論中所犯的錯誤當然助長了這個神話的建立。〈22〉可是，今天，俄國的“自由派”圈子卻聲稱托洛茨基在“勞動軍事化”方面的建議替斯大林派和官僚層壓制工人的專制政策鋪了道路。斯大林只是更有力量更野蠻地將托氏所建議的東西付之實施而已。

但是這與歷史上可查明的事實一點也不相符。在所謂勞動軍事化的時期中，工廠裏沒有對工人採取壓制行動的例子。不但是新神話的製造人，就連伊薩克·多伊徹、湯

尼·克利夫 (Tony Giff) 這樣的友好批評者都忽略了這樣的事實，即托洛茨基在工會爭論中之所以採取他的那個立場的動機之一，是他對普通工人與行政機構之間日益擴大的鴻溝的關切，以及他要準備工人在工廠管理部門中取得主要位置的願望。托洛茨基的建議，不管它們的表面跡象是怎樣，不管這在當時並沒有被對方瞭解，事實上是比列寧的建議更接近工人反對派的立場。這就是布哈林在工會爭論中支持托氏的原因，因為他在當時敏銳地覺悟到官僚化的危險。

托洛茨基在關於“勞動軍事化”和工會問題的爭論中，在心理上、政治上所犯的種種錯誤，減弱了他在1922年和23年的黨內決定性衝突中的地位。這些錯誤對列寧的態度也有負面的影響。列寧以一位新的總書記斯大林來替代接近托洛茨基的以普列奧勃拉仁斯基和克列斯京斯基為中心的黨第一書記處，產生了列寧本人只在1922—23年才意識到的悲慘結果。這些錯誤在開頭也使黨和黨外工人不相信托洛茨基和左派反對派的建議。在這個意義上，這些錯誤是導致斯大林派和蘇聯官僚層勝利的一連串重大原因中一個次要的環節。

1921年和22年的所有這些討論，發生在以下的更廣闊經濟問題的大環境中：黨應該保留戰時共產主義嗎？或者，在農業和商業中局部恢復市場關係、在農村中結束徵用制，是在農村和城市中刺激生產力發展的先決條件嗎？多依徹指出了這個大環境的重要性，是十分確切的。正如已經在許多場合被指出的，托洛茨基提出以新經濟政策代替戰時共產主義的時間，至少比包括列寧在內的其他黨領導人早了整整一年。

## 民兵和選舉軍官

說這個專制的托洛茨基是殘暴的斯大林的先行者這個神話，也是與另一個歷史事實矛盾的。1922—23年以後，托洛茨基要紅軍在地域民兵制度的基礎上重組。正如馬金托什 (J.M. Mackintosh) 正確地指出的，這是因為托氏“要以在工業中心徵召民兵、將此民兵隊伍駐紮在該地區的方法，來增加城市無產階級在軍隊中的比重”。  
<23>

這個建議把他帶進與從沙皇軍隊投靠過來的軍事專家們的衝突，這些專家們在當時的發言人是一本講戰略的標準書本的作者、軍事學院的教授斯偉欽將軍。<24>但是在這時候，這個爭論中的對陣已經變更位置。在內戰期

間，主張建立一支集中的由前沙皇軍官指揮的軍隊的，是托洛茨基。現在他是無產階級民兵制的主要辯護人。這個爭論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涉及選舉原則。在紅軍中，指揮人員本是指派的，不是選舉的；但是現在，托氏建議回到民兵的選舉原則。他在1924年寫道：

我們必須在我們眼前永遠有兩種情況：如果轉變到民兵制度的可能性在開頭因蘇維埃結構的建立而被創立的話，那末轉變的速度仍然是由這個國家的一般文化條件所決定：技術、通訊方法、讀寫能力等等。<25>

他在《被背叛的革命》中進一步說：“正規軍與民兵之間的相互關係可以作為真正朝向社會主義前進的公正指標。”<26>根據戈斯托尼的記述，在1925年，紅軍由36個地方師和26個正規師所組成。在1930年，58%的步兵師是地方師，而在1934年，這個比數達到74%。<27>到了1935年，情況徹底改變了。在那一年，只有34%的步兵師是地方師，而在下一年，這個比數更下跌到23%。托洛茨基把軍隊在1935年所發生的事件描述為“國家革命”。<28>

當然，這個政策轉變，部份地是由於日增的戰爭威脅、客觀地需要機動化和建立一支職業性的坦克師。<29>托洛茨基評論說：

可是，從74%下滑到23%似乎是過多了。我們可以假定，沒有法國參謀部門“友好的”壓力，它是不會下滑到這個程度的。<30>更可能的是，官僚層抓住一個有利的口實來這樣做，因為它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因政治考慮而強制規定的。

由於民兵制的特性，民兵師是直接依靠人民的。從社會主義的觀點來看，這是這個制度的主要優點。但是從克里姆林宮的觀點，這也是它的危險之處。……

軍隊是社會的副本，而且受著社會一切疾病的損害，特別是在較高體溫下。戰爭這個行業太嚴峻了，所以與虛構和模仿都合不來。軍隊需要新鮮的批評氣氛。指揮人員需要民主控制。紅軍的組織者們從開始就瞭解這一點，認為準備像指揮人員的選舉這樣的措施是必需的。<31>

但是蘇聯官僚層並沒有在1935年引進選舉制度。它反而在解散地方師的同時，引進了舊的軍官階層及其“古典的”等級制度、軍士軍階、勳章和日益增大的物質

特權。這是蘇維埃熱月反動在紅軍中取得勝利的表現。托洛茨基爭取民兵制度、爭取指揮官選舉的鬥爭，是他的反對蘇維埃熱月反動的一般鬥爭一部份。令人感到興趣的是，1990年，一位名叫波齊魯克（Podziruk）的蘇聯陸軍司令、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公開主張軍隊的民主化，要求軍隊回復到原來的結構，即托洛茨基當初所堅決主張的結構。〈32〉

### 註釋：

<1>我在很多可能得到的例子中僅僅選出三個來。羅莎·盧森堡在收集於1970年紐約出版的《Rosa Luxemburg Speaks》一書中的《The Russian Revolution》〔《俄國革命》〕（1918年）一文中經常提到布爾什維克領導層和“列寧、托洛茨基的”政府。約翰·里德（John Reed）所著的、被列寧高度讚揚的《震撼世界的十日》一書中也是如此提及。同樣地，很多發給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的賀電是給列寧和托洛茨基的。

<2>伏爾科戈諾夫（Dmitri Volkogonov），《Stalin》〔《斯大林傳》〕，1989年Dusseldorf版，第145頁。

<3>伏爾科戈諾夫《Trotsky, the Janus Face of the Revolution》〔《托洛茨基，革命的守護神》〕，1992年。

<4>該引句來自B.H. Liddell Hart 著的《The Red Army》〔《紅軍》〕，1956年紐約版，第27頁。

<5>我們可以在1924年莫斯科版的高爾基小冊子《V.I. Lenin》〔《列寧》〕第一版中找到以下句子：“列寧把他的拳頭放到桌子上後，說：‘給我看看另外一個能夠在一年之中組織一支幾乎是模範的軍隊，贏得軍事專家們尊敬的人。我們就有這樣一個人。’”（第37頁）。

<6>布魯斯·林肯，《Red Victory. A History of the Russian Civil War》〔《紅軍的勝利，俄國內戰史》〕，1989年紐約版，第173頁。

<7>托洛茨基，《My Life》〔《自傳》〕，1960年紐約版，第413頁。

<8>引自Liddell Hart 寫的《紅軍》第43頁。

<9>托洛茨基，《Comment la révolution s'est armée》〔《革命是怎樣武裝它自己的》〕，1967年巴黎版，第45—6頁；R.P. Browder 和 Alexander Kerensky 合編的《The Russ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1917. Documents》〔《1917年的俄國臨時政府的文件》〕，1961年史丹福版，第3卷，從1614頁開始。

<10>紅軍的士兵宣誓要實現世界革命。紅色艦隊的二隻巡洋艦被改名為“無產階級革命”和“巴黎公社”。

<11>見1973年紐約版的《The Spanish Revolution (1931—1939)》〔《西班牙革命（1931年—1939年）》〕一書中第320至322頁的《西班牙的教訓：最後的警告》一文。

<12>當時的曼徹斯特衛報記者M. Frip Prie對這些矛盾提供了極好的分析。見他的《The Russian Revolution》〔《俄國革命》〕，1921年倫敦版。

<13>Larissa Reissner，《Sviask》（托洛茨基的活頁筆記簿，第12本）。

<14>“有一次，列寧以給了托洛茨基一張上面印有人民委員會主席的信箋抬頭的空白信紙，來著重他對托洛茨基的信任。他在那張信紙的底部親筆寫了：‘同志們：由於知道托洛茨基同志下命令時的嚴謹，我如此相信、如此絕對相信托洛茨基同志所下命令的正確、合宜和對事情成功的必要性，以致我毫無保留地簽署這張命令。V. 烏利亞諾夫／列寧’。托洛茨基當然一輩子保留了這個文件。”（Roy Medvedev，《Let History Judge》〔《讓歷史來判斷》〕，1989年牛津版，第105頁）

<15>引自Liddell Hart 寫的《紅軍》，第30頁。

<16>托洛茨基，《L'Art de la guerre et le marxisme》〔《馬克思主義與戰爭的藝術》〕，1973年巴黎版，從第88頁開始。

<17>“戰爭建基在許多科學的基礎上，但是戰爭本身不是科學——它是一個實用的藝術、一個技能‘……一個野蠻、血腥的藝術。……’”（引自伊薩克·多伊徹的《The Prophet Armed》）〔《武裝的先知》〕，1970年牛津版，第482頁）。

<18>Medvedev，《讓歷史來判斷》，第103—8頁。

<19>Walter Laqueur，《Stalin》〔《斯大林傳》〕，1990年慕尼黑版，第73頁。

<20>多伊徹，《The Prophet Armed》，第494、496頁。

<21>同上，第491—3頁。

<22>見本書第三章。

<23>Liddell Hart 寫的《紅軍》，第33頁。

<24>同上書，從第53頁開始；亦見《The Revolution Betrayed》〔《被背叛的革命》〕，第220—25頁；多伊徹，《武裝的先知》，從第477頁開始。

<25>《被背叛的革命》，第217頁。

<26>同上書，第219頁。

<27>戈斯托尼（Peter Gostony），《Die Rote Armee》〔《紅軍》〕，1980年維也納版，第124頁。

<28>《被背叛的革命》，第215頁。

<29>圖哈切夫斯基（Tukhachevsky）是1930年代歐洲最傑出軍事戰略家之一。他比哈特（Liddell Hart）、曼斯泰因（Manstein）、古德里安（Guderian）及戴高樂（de Gaulle）等人更懂得機動獨立坦克師的重要性。他開始沿著這些路線來改組紅軍。斯大林停止了這個做法，解散了坦克師——造成1941年6月以後的悲慘後果。這就是1937年有這麼多紅軍司令員、包括圖哈切夫斯基在內被謀殺的背景。

<30>1935年，法國與蘇聯結成了被稱為賴伐爾公約的、牽涉著兩國參謀部之間合作的聯盟。

<31>《被背叛的革命》，第220、222頁。

<32>在1990年8月20日的墨西哥日報Cinco días的一篇訪談錄上。



## The CPC Decision embarks on perfecting capitalist restoration

*Zhang Kai*

The "Decision on issues regarding the perfection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was adopted by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6<sup>th</sup> CPC Central Committee. Almost a decade ago, during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4<sup>th</sup> CPC Central Committee, a similar Decision was adopted, with the only difference that at that time, the word used was "establishment" instead of the word "perfection".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on the way to capitalist restoration, is now basically "established" and requiring "perfection" only.

Today's Decision states that "with the preliminary establishment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the basic economic structure of having public ownership as the main pillar and various forms of ownership in joint development has been confirmed". The Decision further explains that what is meant by public ownership as the main pillar is to "commit to developing a mixed ownership economy of state-owned capital, collective capital and non-public owned capital, to realizing a diversity of investment agents, in order that the shareholding system become the main form of practice of public ownership system".

To define the shareholding system as public ownership system is to theoretically transform the CPC's previous definition of its nature being non-public ownership. Only earlier this year, Qiu Xiaohua, Deputy Director of the State Statistics Bureau, still openly declared that the shareholding system is one of the three non-public ownership systems. The Concise Dictionary on Political Economy published in the PRC<sup>i</sup> also states that the shareholding enterprise is based on the capitalists' private ownership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hence its nature is capitalist; the dividends and profits of the enterprises are derived from exploitation of the workers' surplus value. With the Decision boasting of this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dvancement of the reform of the economic system", the traditional Marxist theory has been put to a major revision.

The Decision provides that apart from maintaining the control of state capital over enterprises that pertain sanitation and cultural expenses will be mainly used in the countryside. Thirdly, tariffs levied on peasants will be gradually reduced, and special agricultural product tax is cancelled. Fourthly, the flow of labour between the rural and urban is facilitated, and restrictions on peasants finding jobs in the cities removed.

The slogan of reducing the burden on peasants has

to state security and the main arteries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for other enterprises and area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ill go through a process of elimination of the weak and retention of the strong through assets restructuring and structural readjustment. This is another way of saying that such enterprises will be helplessly left to elimination by the market.

According to economist Zhang Zhuoyuan, who had participated in drafting the official documents for this plenary session,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remains the central link for the perfection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He expects the weight of the state owned economy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to drop from the current one-third to about one-fifth.<sup>ii</sup>

As for the other pillar of monopoly over foreign trade, the Decision is also urging development towards the goal of "generally enhancing the level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compromising more to the market economy and the rules of the WTO. Enterprises now enjoy greater autonomy in foreign economic and trade activities. The two major gains of the 1949 revolution – public ownership and foreign trade monopoly – are being further eroded, and if this continues, the CPC will be completing capitalist restoration in China, despite all the claims about the market economy being of socialist nature. The proposal of the Decision to set up a healthy "modern property rights system" is to remove obstacles to the flow of assets.

In response to the worsening situation of the peasants and their abandonment of farming, the Decision makes certain concessions to the peasants. Firstly, it guarantees stability of the household contractual system by allowing peasants the right of voluntary and compensated transfer of contractual right; requisition of farmland by the government is to be put under more monitoring. Secondly, the grain requisition market is opened up, and indirect subsidies to peasants are turned into direct subsidies. It is also stipulated that the state's increased education,

been raised for many years, and its repetition here may not mean much. The vested interests of local officials is one factor for many policies to fail to achieve outcomes. According to Han Jun, head of the Rural Economy Bureau of the State Counci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8.4% of agricultural tax is levied on the average total output of the land and not on the income after deducting production costs. He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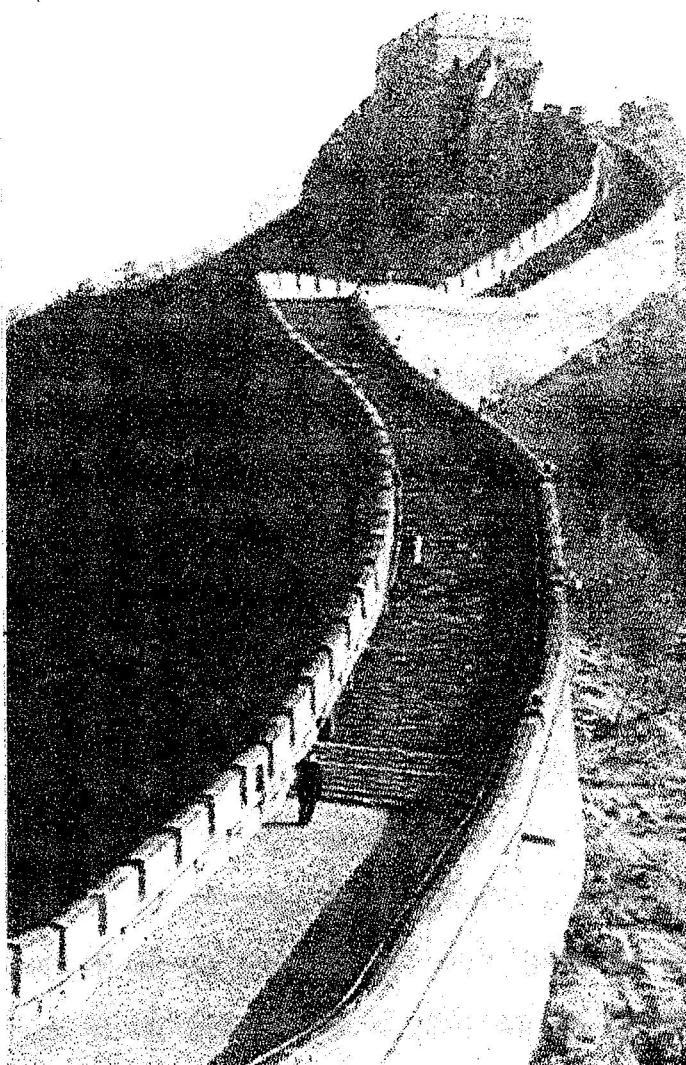
peasants suffering a loss in farming still have to pay the tax. A 19% added value tax is levied on agricultural products, whereas the added value tax for industrial products is 17%. He states that from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almost all surplus from crop farming is absorbed by the agricultural tax. He recommends t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gradually reduce the taxes and eventually abolish all agricultural taxes within five years.<sup>iii</sup> However, the Decision promises only a gradually reduction of the tariff rates.

As for the workers, the Decision only vaguely mentions that there should be exploration of effective ways of democratic management by the staff under the modern enterprise system, and that there should be a further reform of the personnel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 There is no special provision for unemployed workers or their welfare. The trend is to develop an insurance scheme with contribution by individuals and their work units. As for the rural households, guarantee for a minimum living is still lacking.

The market economy has brought China rapid growth in some areas, but social polarization is serious. The Decision vaguely states that there should be attention to the huge gaps in income in society, and the goal should be common wealth. Yet there is nothing concrete to improve the livelihood of the poor.

The Chinese realities under the current CPC policies are pushing China to the blind alley of a total restoration of capitalism. If there is no strong and powerful intervention by the working class, China will go further away from its socialist goals. The Decision ends with a slogan for "advancement of political system reform, expansion of socialist democracy, and perfection of the socialist legal system", but these are only empty words, far from the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al reform that is necessary for China to get rid of the one-Party dictatorship.

12 November 2003



## 十月評論

October Review

第30卷第3/4期合刊 (總第214期)

2003年12月31日出版

出版/編輯/承印: 〈十月評論〉編輯委員會

通訊處: 香港郵政總局信箱10144號

電話: 9846 3428 傳真: 3494 1762

Address: G.P.O. BOX 10144 HONG KONG

Tel.No: (852) 9846 3428 Fax: (852) 3494 1762

E-mail Address: october\_review@yahoo.com

Web Site: <http://www.octreview.org/>

【十月評論內一切具名文章，不一定代表編輯部立場】

<sup>i</sup> Edited by the famous CPC theorist Xu Dixin, and published by the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1983.

<sup>ii</sup> Wen Hui Bao, 27 October 2003.

<sup>iii</sup> Wen Hui Bao, 29 October 2003

|      |    |                                                                 |           |
|------|----|-----------------------------------------------------------------|-----------|
| 香港   | 2  | 民建聯慘敗與民主派大勝.....                                                | 本刊評論員     |
|      | 3  | 競選連任宣言（轉載）.....                                                 | 陳 昌       |
|      | 4  | 競選政綱承諾（轉載）.....                                                 | 陳 昌       |
|      | 5  | 爭民主普選、反失業貧窮、踢爆保皇黨（轉載）.....                                      | 梁國雄       |
|      | 6  | 十大理由支持長毛（轉載）.....                                               | 梁國雄       |
|      | 7  | 政綱略要（轉載）.....                                                   | 梁國雄       |
|      | 8  | 含血噴人 自暴其醜（轉載）.....                                              | 梁國雄       |
|      | 9  | 執政無能証明必須政改和普選.....                                              | 振 言       |
|      | 10 | 給董建華的公開信（轉載）.....                                               | 民主倒董力量    |
| 中國   | 11 | 中國人民的怨憤和抗爭呼聲.....                                               | 軍 行       |
|      | 15 | 中共《決定》要完善資本主義復辟.....                                            | 張 開       |
|      | 18 | 中國的動力：一黨統治支持下向資本主義日漸開放.....                                     | 第四國際      |
|      | 19 | 關於資本主義復辟的聲明.....                                                | 第四國際      |
|      | 20 | 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確立資本主義法律體制.....                                        | 高島義一      |
| 國際   | 21 | 第四國際關於國際政治形勢的意見.....                                            | 奧利維埃      |
|      | 24 | 在反資本主義戰鬥的中心區：<br>讓我們再發動、再組合、再定位.....                            | 維爾卡曼      |
|      | 27 | 評日本2003年度《防衛白皮書》.....                                           | 松本龍雄      |
|      | 28 | 日本政治進一步右傾、保守化.....                                              | 趙 京       |
|      |    | 日本國民保險制度的崩潰.....                                                | 趙京譯       |
|      | 29 | 能建立巴勒斯坦國嗎？.....                                                 | 埃·哈斯      |
|      | 31 | 英國：面對左派的挑戰.....                                                 | 亞·索納特     |
|      | 33 | 厄瓜多爾局勢向新政權挑戰.....                                               | 羅梅羅       |
| 歷史   | 35 | 陳獨秀脫離托派、脫離第四國際了嗎？（來論）.....                                      | 劉 秀       |
|      | 38 | 說英雄（來論）.....                                                    | 林 蔚       |
|      | 40 | 雜談兩則（來論）.....                                                   | 惠 之       |
| 理論   | 41 | 評普列漢諾夫的政治遺囑.....                                                | 田 友       |
| 讀書雜記 | 45 | 歧途與正道（下）.....                                                   | 林 子       |
| 特譯   | 53 | 以托洛茨基作為可供選擇的道路（十一）.....                                         | 曼德爾       |
| 英譯   | 58 | CPC Decision embarks on perfecting capitalist restoration ..... | Zhang Kai |

## OCTOBER REVIEW VOL.30 ISSUES 3/4 2003.12.31

### Hong Kong

- 2 District Board Elections and defeat of the pro-government party ..... October Review commentator
- 3 Election Manifesto and Programme (reprint) ..... Chan Cheong
- 5 Election campaign documents (reprint) ..... Leung Kwok Hung
- 9 For political reform and general election ..... Zhen Yan
- 10 Open letter to Tung Chee Wah (reprint) ..... Democratic Alliance to Remove Tung

### China

- 11 The grievances and resistances of the Chinese people ..... Jun Xing
- 15 The CPC Decision embarks on perfecting capitalist restoration ..... Zhang Kai
- 18 The Chinese dynamic: growing openings to capitalism behind the holding of the single party.....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 19 Statement on capitalist restoration .....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 20 3<sup>rd</sup> session of 16<sup>th</sup> CPC affirms legal system for capitalism ... Takashima Yoshikazu

### International

- 21 Introductory Report on World Political Situation, 15<sup>th</sup> Congress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 Francois Ollivier
- 24 At the heart of the capitalist combat  
Relaunch, opening, regroupment and repositioning ..... F. Vercammen
- 27 A critique of the Japanese 2003 Defence White Paper ..... Matsumoto Takio
- 28 Japanese politics going further to the right ..... Zhao Jing

- 28 The bankruptcy of the Japanese national insurance scheme..... (tr) Zhao Jing
- 29 Can the Palestine state be set up? ..... E. Hass
- 31 Britain: challenge for the left ..... A. Thornett
- 33 Challenges for the new government in Ecuador ..... F.L. Romero

### History

- 35 Did Chen Duxiu leave the Trotskyists and the FI? ..... Liu Xiu
- 38 On heroes ..... Lin Wei
- 40 Two essays ..... Hui Zhi

### Theory

- 41 A critique of Plekhanov's political will ..... Tian You

### Study Notes

- 45 The right path and the wrong path (part 2) ..... Lin Zi

### Special Article

- 53 Trotsky as Alternative (part 11) ..... E. Mandel

### Article in English

- 58 CPC Decision embarks on perfecting capitalist restoration ..... Zhang Kai